

顾问委员会

总顾问 曾培炎
顾问 董建华 蒋正华 唐家璇 徐匡迪

资深专家委员会

中国专家（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春正	王伟光	王洛林	厉以宁	宁吉喆	冯国经	卢中原
许宪春	刘遵义	刘世锦	刘克崮	刘伟	朱之鑫	朱民
李扬	李毅中	李德水	李若谷	吴敬琏	张大卫	张国宝
张晓强	张祥	张卓元	陈元	林兆木	林毅夫	杨伟民
周文重	赵进军	高尚全	海闻	钱颖一	郭树清	黄奇帆
辜胜阻	韩永文	聂振邦	楼继伟	蔡昉	樊纲	薛澜
魏建国	戴相龙					

国际专家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康睿哲/Richard Constant
傅强恩/John Frisbie	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
欧伦斯/Stephen A. Orlins	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
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	马克·乌赞/Marc Uzan
郑永年	

编委会

主任 魏礼群
副主任 郑新立 王晓红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一鸣	王战	王昌林	王晓红	马晓河	吕政	谷源洋
朱晓明	陈文玲	陈宗胜	李平	李晓西	李向阳	迟福林
张宇燕	张燕生	张蕴岭	杨圣明	冼国明	施子海	高培勇
贾康	隆国强	常修泽	曹文炼	裴长洪	霍建国	

主编 郑新立
副主编 王晓红
编辑部主任 沈家文
编辑部副主任 李蕊

• 本刊专论 •

- 新中国 70 年对外经济贸易的转型发展 张燕生 (005)
- 关于世贸组织改革面临的严峻形势及中国的对策 霍建国 (022)

• 国际经济 •

- 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的国际经验 宋 群 杨 坤 陈 啸 (030)
- 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的路径选择与政策建议
——以津巴布韦为例 郭建民 孙安琪 (046)
- 全球软件市场发展新动向：产业、贸易和发展趋势 谢兰兰 王颖婕 (058)
- 全球高技术产业发展趋势与经验启示 赵春哲 李 丹 (071)
- 中国数字贸易发展现状及策略选择 夏友仁 (084)

• 宏观经济 •

-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的制度障碍与政策建议
王佳元 (096)

• 名人观察 •

- 怎样认识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回落 李德水 (106)

抓住“一带一路”建设新机遇 打造内陆改革开放新高地	韩永文（108）
走好制造强国“三步棋”	魏建国（112）

• 智库言论 •

《新中国 70 年经济社会发展回顾与思考》重大课题研究成果发布	李 娣（115）
---------------------------------	----------

• 权威观点 •

国际权威机构观点综述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119）
------------	--------------------

• 国际统计数据 •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125）
----------	--------------------



CONTENTS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Foreign Economic Trade in the past 70 years of China	<i>Zhang Yansheng</i> (005)
The Severe Prospects Faced by WTO Reform and China’ s Countermeasures	<i>Huo Jianguo</i> (022)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lderly Care Service Industry	<i>Song Qun , Yang Kun , Chen Xiao</i> (030)
Path Selection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Expanding Cross-Border Use of RMB ——A Case Study of Zimbabwe	<i>Guo Jianmin , Sun Anqi</i> (046)
New Developments in the Global Software Market: Industry, Trade and Development Trends	<i>Xie Lanlan , Wang Yingjie</i> (058)
The Development Trend and Experience Enlightenment of Global High-tech Industry	<i>Zhao Chunzhe , Li Dan</i> (071)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Strategy Choice of digital trade in China	<i>Xia Youren</i> (084)
Research on Institutional Barriers and Policy Suggestions for Deep Integration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i>Wang Jiayuan</i> (096)
How to Recognize the Slowdown of China’ s Economic Growth Rate	<i>Li Deshui</i> (106)
Grasping the New Opportunity of “The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to Build a New Highland of Inland Reform and Opening	<i>Han Yongwen</i> (108)
“Three moves” for Manufacturing Power of China	<i>Wei Jianguo</i> (112)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Major Issues of “Review and Reflection o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70 Years of New China”	<i>Li Di</i> (115)
Opinions of International Authoritative Institutes	(119)
Main Indicators of World Economy	(125)

新中国 70 年对外经济贸易的转型发展

张燕生

摘要：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18 年我国 GDP 比 1952 年增长了 175 倍，年均增长 8.1%；其中，1979—2018 年年均增长 9.4%，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 2.9% 的年均增速。这 70 年，我们经历了“一个世界、两个体系”的时期，经历了“大引进”推动“洋跃进”的时期，经历了代工贴牌起步的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时期，也正在经历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和发展的时期。这 70 年，正反经验教训的总结回顾和反思有重要意义。一是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二是对外开放的本质是全面深化改革。三是对外开放最重要的意义是推动科学、技术和创新发展。四是对外开放是一个渐进的生态系统。五是危机、挑战和压力是扩大对外开放冲破体制障碍的前进动力。六是扩大对外开放意味着开放国际竞争与合作。七是扩大对外开放带来“干中学”的内生发展效应。八是扩大对外开放造就了相互依存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构建了全球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在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条件下，成为抵制贸易战、继续推动全球化前行的重要力量。这 70 年，中国从世界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大国快速复兴，即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并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

关键词：对外经济贸易 对外开放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作者简介：张燕生，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国家发展改革委学术委员会委员、博士生导师。

新中国成立 70 年了。习近平主席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① 从历史的

^①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8 年 12 月 18 日。

视野、国际的视野和中国发展的视野入手，研究探索新中国成立 70 年之变迁，尤其是对对外开放和经济贸易发展在新中国变迁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一、新中国 70 年对外经济贸易发展

（一）新中国 70 年对外经济贸易发展取得突出成绩

70 年来，我国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52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只有 679 亿元，人均 GDP 仅 119 元。到 1978 年，我国 GDP 增至 3679 亿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到 1.8%，居世界第 11 位。到 2018 年，我国 GDP 超过 90 万亿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接近 16%，居世界第 2 位。按不变价计算，2018 年我国 GDP 比 1952 年增长了 175 倍，年均增长 8.1%；其中，1979—2018 年年均增长 9.4%，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 2.9% 的年均增速。

我国对外贸易也取得快速发展。1950 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只有 11.35 亿美元。1978 年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 206 亿美元。2018 年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 4.6 万亿美元，比 1978 年增长 223 倍，连续两年居世界首位；服务进出口总额 7919 亿美元，比 1982 年增长 168 倍，居世界第 2 位。1952 年末我国外汇储备只有 1.08 亿美元，1978 年末为 1.67 亿美元，居世界第 38 位。2018 年末外汇储备余额为 30727 亿美元，连续 13 年稳居世界第一。

2018 年，我国实际使用非金融类外商直接投资 1350 亿美元，比 1983 年增长 146 倍，年均增长 15.3%；1979—2018 年累计吸引非金融类外商直接投资 20343 亿美元。2018 年服务业吸收外资占比达 68.1%。2018 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 1205 亿美元，比 2003 年增长 41.3 倍，年均增长 28.4%。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 56 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2018 年为 156 亿美元，占非金融类对外投资总额的 13%。^①

（二）新中国 70 年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经历了艰难探索

在历史上，对外开放和经济贸易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在国内外历来存在着争论。新中国成立之初，国际发展经济学界盛行着初级产品长期贸易条件恶化论、出口悲观论等发展理论，^② 鼓励发展中国家选择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在苏联等社会主义

^①国家统计局：《沧桑巨变七十载 民族复兴铸辉煌》，中国政府网，2019 年 7 月 1 日。

^②阿根廷经济学家普雷维什和德国经济学家辛格在 1950 年分别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在几十年来一直呈现商品贸易条件恶化的趋势，即“长期贸易条件恶化论”，或称“普雷维什—辛格假说”。如普雷维什认为传统的国际分工与贸易理论只适用于中心国家之间，而不适用于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之间，外围国家只有实行保护贸易政策独立自主地发展民族经济，实现工业化，才能摆脱在国际分工与贸易中的不利地位。

工业化实践和计划经济影响下，中国、印度等新兴发展中大国在初始发展阶段普遍选择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依靠外援的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后来的事实证明，采取这种战略的发展业绩总体不理想。如 1953 年至 1978 年，我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额的比重从 1.23% 下降到 0.75%，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位次从第 17 位后移到第 32 位。^①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坚持对外开放成为我国的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从“三来一补”到大力发展对外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从积极招商引资到协调推动“引进来”和“走出去”，从创建第一家经济特区到全面构建高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开放型经济新体系，扩大对外开放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深化，促进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健康持续向前发展。1978 至 2017 年间，我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额的比重从 0.75% 上升到 13.6%，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位次从第 32 位前移到世界首位（见表 1）。

表 1 中国占世界出口贸易的比重及位次 单位：%

年份	比重	位次	年份	比重	位次
1978	0.75	32	1998	3.3	9
1980	0.9	26	2000	3.9	7
1981	1.1	19	2001	4.3	6
1982	1.2	17	2002	5	5
1986	1.4	16	2006	8	3
1988	1.7	16	2008	8.9	2
1989	1.7	14	2009	9.6	1
1992	2.3	11	2012	11.1	1
1997	3.3	10	2017	13.6	1

数据来源：孙玉琴，《中国对外贸易通史》，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三）辩证看待对外经济贸易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

无论是中华民族近现代历史，还是新中国 70 年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实践，都证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其中有三条重要的发展经验值得强调：一是对外开放的内涵是通过积极参与国际交换、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引入外来竞争压力（即主动引狼入室、与狼共舞、激发活力），调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积极因素，取得内生型动态增长效应和竞争活力。二是对外开放的本质是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由商品

^①孙玉琴：《中国对外贸易通史》，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实现规则、规制和法治的现代化，是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制度变迁的内在要求。三是扩大对外开放的动力机制是危机、压力和挑战，在国际国内各种变局中都是危和机共生并存，要善于在开放中化危为机、转危为安、稳中求进。

在扩大对外开放进程中也有三个基本关系需要在实践中妥善处理：一是在推动规则等制度型开放、与国际高标准规则衔接对接的同时，要辩证处理好全方位开放环境下如何保持“中国特色”的问题。二是在引入外来竞争压力、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人才的同时，要辩证处理好全方位开放环境中如何做到关键技术设备和人力资源自主可控的问题。三是在不断扩大金融、能源、粮食、科技、信息、生物系统等重要领域对外开放的同时，要辩证处理好全方位开放环境中的国家和其他安全保障和风险防范的问题。在新中国成立的 70 年里，我国经历过从内向发展到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转变，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第一外汇储备资产大国、新兴经济体中的第一双向投资大国。下一步仍将通过新一轮高水平开放和高标准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

二、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的历史回顾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人均国民收入不足印度的 50%。到 2018 年，印度人均国民收入大致仅相当于中国人均的 1/5 左右。我们在钉子都叫洋钉的一穷二白的工业基础上，建立起能够生产联合国工业目录大类所有产品的现代工业体系，并且在 2019 年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跃至第 14 位，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构成的经济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超过 1/3。中国仅用全球不到 10% 的耕地解决了 14 亿人口的吃饭问题，2018 年中国的恩格尔系数降至 28.5%，消费结构进入了富裕发展阶段。美国商业周刊最新一期封面文章比较发现，中国 1996 年以后出生的 Z 世代是世界上同龄人中最乐观也对未来最有信心的一代人。^①

（一）问题的提出

在历史上中华民族曾经历过长期艰难曲折的复兴奋斗之路。从表 2 的数据可以看到，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而不是市场汇率来计算，1820 年，中国的经济总规模占世界经济总规模的比重高达 32.9%，远高于同期欧洲经济所占比重 26.6%、印度的 16%、日本的 3%、美国的 1.8%。^② 然而，由于清王朝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造成了综合国力的大幅度

^①佚名：《“Z 世代”》，《美国商业评论（中文版）》2019 年 7 月 10 日。

^②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衰落。到了 1952 年，中国经济的总规模虽然还高于印度和日本，但已经被欧洲、美国所远远超过。到了 1978 年，中国经济的总规模也被日本所超过。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从根本上解放并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到 2003 年，中国的经济总规模再次超越了日本，^① 继续领先于印度，逐步趋近于欧美。到 2014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几家权威的国际组织预测，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这一年中国经济的总规模超过了美国，中美关系进入一个需要重新认识和调整的大国博弈新阶段。

表 2 1700—2003 年世界 GDP 分布 单位：%

	1700 年	1820 年	1952 年	1978 年	2003 年
中国	22.3	32.9	5.2	4.9	15.1
印度	24.4	16.0	4.0	3.3	5.5
日本	4.1	3.0	3.4	7.6	6.6
欧洲	24.9	26.6	29.3	27.8	21.1
美国	0.1	1.8	27.5	21.6	20.6

资料来源：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二）旧中国综合实力的长期衰落

在 1820—1950 年短短的 130 年间，中国经济从世界首屈一指的地位迅速地衰落下来，美国则从一个三流国家快速崛起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和活动？

1840 年西方列强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了中国市场的大门。问题是鼎盛时期的清王朝在外敌入侵时为什么如此不堪一击？如果把时间从 1840 年向前推 100 年，则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著名的“康乾盛世”。康熙 1661 年即位时正值西方大航海时代后，世界出现了一批海洋强国，而康熙却采取了海禁政策，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爆发时期，遏制了科学、技术和创新的引进、学习和传播。1736 年乾隆登基并实际执政了近 64 年，在鼎盛时期同样继续实施闭关锁国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维护高度集权、固步自封的封建统治，一直延续到嘉庆、道光年间。同时期，划时代的英国工业革命、美国建国、法国大革命等重大事件，改变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轨迹，形成了英法称霸世界的新格局。工业革命开启了机器工业替代手工业的工业经济时代，闭关锁国和重农抑商使中国错过了搭上世界现代化这趟车的机遇由盛而衰，最终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困境。

1870—1913 年世界经济进入兴盛期。这个时期发生了人类社会第一次基于规则的经

^①按照市场汇率计算，2010 年中国经济总规模超越日本，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

济全球化和以内燃机、电动机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形成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兴盛期。英国作为当时的世界霸权国家推动了自由贸易，但由于忙于海外扩张，构建日不落大英帝国，而忽视了对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和产业投资，导致了英国综合国力由盛而衰，英国工业占世界工业的比重从 1870 年的 32% 下降到 1913 年的 14%。当时工业化进程比英国落后近 100 年的德国和独立仅 100 年的美国把握住了这个发展的机遇期，迅速实现了由弱而强的大国崛起。美国工业占世界工业的比重从 1870 年的 23% 上升为 1913 年的 36%。同期的日本也发生了明治维新，搭上了世界开放、工业化和新科技革命这班车。而中国再次错失了这个世界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面对接连的外敌入侵和国内动乱，陷入落后就会被动挨打的困境。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中华民族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进行了英勇斗争，然而最终都失败了。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1949 年推翻了旧政权取得了革命成功。在旧中国，即使是 20 世纪 30 年代经济最好时，国家的财政、海关、银行、铁路、煤炭等经济命脉都被西方列强所垄断。^① 到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的人均 GDP 仍停留在 1890 年的水平。^② 如今，新中国成立 70 年，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第一制造大国和出口大国。“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不懈努力的方向和信念。

（三）新中国的复兴之路

新中国成立短短 70 年间，中国从世界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大国快速复兴，即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并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而同期的美国经济，在经历了 2007 年的次贷危机、2008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后，综合国力和全球领导力下降。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进入一个历史性的关键阶段。奥巴马说，美国要再领导世界 100 年。^③ 特朗普说，美国第一，美国主义，而非全球主义；美国再次伟大，

^①截至 1936 年，外国资本在华企业投资额约为 43 亿美元，其中工业资本约占中国整个工业资本的 40%。外资在华企业的产品份额分别占到中国生铁产量的 80%、原煤产量的 80%、发电量的 76%、棉布产量的 69%、卷烟产量的 57%、航运吨位的 69.5%、铁路里程的 90%。外资在华银行约 32 家，分支银行 141 所，在华资产 19 亿美元，在金融业务中占垄断地位，并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和财政。参阅赵穗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66）》，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67～68 页。

^②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③2014 年 5 月 30 日奥巴马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的讲话指出，美国必须一如既往地世界舞台上发挥领导作用，美国在全球的不可或缺作用既是上一个世纪的现实，也将是下一个世纪的现实。军事实力、经济活力、价值观及公民社会、秩序和规则等四大因素将成为美国继续领导全球的核心因素。

让美国继续伟大。其隐含的潜台词是美国要永远当老大，不能容忍任何国家的崛起或复兴会危及其全球霸权地位和领导地位。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综合实力较量难以避免。这种较量会采取哪种方式？是和平合作的方式，还是对抗冲突的方式？中国希望采取和平合作的方式，然而，美国希望采取冲突对抗的方式。从中国角度看，中国不想打贸易战，和平发展、中华复兴是中国重中之重的历史使命；中国不怕打贸易战，中国经济发展有足够韧性、巨大潜力、回旋空间大足够抵挡任何大国挑战；如果打贸易战，过程比结果重要，在两个大国博弈的过程中向对手学习，做强自己。从美国角度看，再也不能够给中国时间和机会了，会采用贸易战、科技战、汇率战、金融战、能源战、规则战、舆论战等方式延迟中华复兴进程。两个大国之间冲突对抗的受害者不仅仅是中美两国，还包括第三方，即整个世界经济都会承受中美贸易战所产生的负的外溢效应，尤其是中小经济体，他们别无选择。

在中美综合实力差距仍十分巨大的条件下，中华复兴进程是否会受到延迟、中断甚至倒退，关键还取决于中国如何应对。笔者认为，如果中国能够像当年申请加入世贸组织 15 年所做出的努力那样，从上到下全面动员起来，全面扩大对外开放，全面深化体制改革，全面提升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中国就有足够的信心和能力应对中美大国博弈带来的各种挑战。在这个假定下，我们将可能经历中美从非理性对抗到理性合作的转变；将可能经历中美综合实力位势交换的转变；将可能经历东西方文明交融碰撞中国向全球负责任大国的转变。要完成这三个转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做好三件重要的工作：一是坚持不懈地推动科学、技术、人才和创新为基础的现代化；二是坚持不懈地推动规则、规制和法治为基础的法治化；三是坚持不懈地推动以责任担当、文化交融、开放包容为基础的国际化，为中华民族复兴作出应有的重要贡献。

三、新中国成立后前 30 年对外经济贸易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 30 年，是在外部封锁和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的。1950 年 12 月，美国宣布管制中国在美全部公私财产，并禁止一切在美注册船只开往中国。1951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中国的禁运案，直到 1957 年英、日等国才先后取消了对华禁运，美国对中国的资产冻结和全面禁运一直持续到 1971 年。在经济脱钩和封锁面前，当时国内形成了一个共识，即坚持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独立自主地发展本国工业体系。对外贸易则作为互通有无、调剂余缺、增强自力更生能力的一种重要手段，服务于当时的发展大局。1949 年 3 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中国工业化的实现必须以“节制资本”和“统制对外贸易”为前提。1956 年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

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然而，这个方针当时并没有真正获得贯彻执行。新中国前 30 年的扩大对外开放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至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当时的世界经济形成了“一个世界、两个体系”的对立局面，即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并行并相互竞争的分隔的世界经济体系。当时正值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 年）建设时期，在苏联全力帮助下，156 个对华援助项目奠定了新中国工业化的发展基础。其中包括 25 个煤炭项目、25 个电力项目、7 个钢铁项目、2 个炼油项目、7 个化工项目、11 个有色金属项目、24 个机械项目、1 个轻工项目、2 个医药项目，其余为军工项目。到 1957 年，中国的工业总产值比 1952 年增长了 128.6%，年均增长率达到 19%。其中钢产量达到 535 万吨，比 1953 年的 135 万吨几乎增长了 4 倍。煤炭产量为 1.31 亿吨，比 1952 年增加了 98%。^① 然而，由于意识形态分歧，60 年代后期中苏两党关系中断、两国关系恶化，导致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方向和战略支点发生了重大变化。

第二个阶段是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至改革开放前，中美关系缓和并形成了“三个世界”理论。经毛泽东同志批准，1968 年中国同意恢复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1969 年 2 月毛泽东同志请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师研究当时的国际问题，提出打开中美关系的建议。1969 年 12 月中美在华沙恢复接触，1971 年 7 月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秘密访华，1971 年 10 月 25 日联合国恢复中国一切合法权利。1972 年 2 月尼克松总统访华，发表了上海联合公报。至此，中美两个大国启动了关系正常化的进程。1972 年 9 月田中角荣首相访华，中日建交。1974 年 2 月 22 日毛泽东同志提出三个世界理论。^② 在中美关系、东西方关系出现缓和的国际大背景下，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形成了两次从西方发达国家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计划。一次是 1973 年 1 月国家计委建议在 3 至 5 年内引进价值 43 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后来项目追加到计划总额 51.4 亿美元。兴建了 26 个大型工业项目，总投资约 200 亿元人民币，至 1982 年全部投产，为推动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技术基础，^③ 也促进了外贸的突破性发展。1973 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是 1970 年的 2.4 倍，1974 年是 1970 年的 3.2 倍。另一次技术引进发生在 1978 年。当时的国际环境有利于我国较大规模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设备，国内条件变化也形成了大干快上、尽快缩小差距的急于求成情绪。^④ 为此，1978 年共签署了 78 亿美元引进合同，其中 31 亿美元是

①资料来源：《当年苏联援建中国的 156 个工业项目》，<https://tieba.baidu.com/p/6119126902?pn=1>。

②官力：《从中美缓和到实行“一条线”的战略》，《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2 年 5 月第 6 卷第 2 期。

③陈东林：《中国改革开放前的三次经济引进》，《中国投资》2007 年第 10 期。。

④李正华：《1978 年国务院务虚会研究》，中国网，culture.china.com.cn。

当年最后 10 天抢签的。所签项目大部分以现汇支付，而 1977 年中国出口外汇收入仅 76 亿美元。这些引进项目还需要国内配套投资 1300 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上年全国财政收入（874 亿元人民币）的 1.5 倍。^① 1978 年 12 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指出，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渐进，不要一拥而上，看起来好像快，实际上欲速则不达。^② 第一次把比例失调问题摆出来。1979 年 6 月，国家正式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决定用三年时间完成国民经济调整，严格控制引进规模，重点引进投资少、见效快、换汇率高的单项。^③ 22 个重点引进项目中，仪征化纤厂等停止引进，向日本借贷 200 余亿元的宝山钢铁厂则继续引进全套技术设备进行建设。

四、新中国成立后第二个 30 年对外经济贸易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个 30 年推动了改革开放并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实绩。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当时百废待兴，形成的高度共识是打开国门，睁眼看世界，寻求现代化经验，推动经济社会变革。从 1978 年初起，中国陆续派出了谷牧、林乎加、李一氓等同志率团到欧洲、日本、港澳等地访问。这一年有 12 名国家领导人 20 多次出访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74 岁的邓小平同志先后 4 次出访了 7 个国家，这是他一生中出国最多的一年。邓小平同志访日时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

（一）主动参与国际分工和交换

万事开头难，1978—1992 年是改革开放探索最困难的时期。是港澳台企业和海外华人企业用“三来一补”的方式，^④ 给国家发展送来了市场经济方式参与国际分工的第一桶金。当时，经济全球化形成了开放驱动、市场化驱动和创新驱动世界经济融合发展的新格局。同时 IT 革命也带来综合物流革命和全球供应链管理的发展新契机。中国把握住这个历史性机遇，通过承接制造业外包迅速参与或嵌入跨国公司全球生产体系，形成了全球资本与低成本劳动力、土地和环境容量相结合的产品内分工或国际工序分工方式。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有 2.88 亿农民进入非农产业，1.88 亿农民工进入城市。创造了市场驱

^①陈东林：《20 世纪 50—70 年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引进》，《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4 年第 6 期。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29 页。

^③李先念：《关于国民经济调整问题报告》（1979 年 4 月 5 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2011 年版，第 126、127 页。

^④“三来一补”，即“来料加工”“来料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最早出现在广东东莞、佛山等地。1978 年 7 月，东莞县第二轻工业局设在虎门境内的太平服装厂与港商合作创办了当地第一家来料加工企业——太平手袋厂。1978 年 8 月，佛山的顺德大进制衣厂成立。

动本地优势通过各种途径参与全球分工、交换和竞争的中国模式。

贸易方式转变是一个影响对外经济贸易结构变化的重要因素。1981 年外资为主、代工贴牌为主、低端为主的加工贸易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仅 5%，一般贸易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为 94.5%。但到 1990 年，加工贸易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达到 40.9%，1993 年加工贸易出口占比达到 48.2%，超过一般贸易出口比重，1998 年加工贸易出口占比进一步提高到 56.9%。随着 2005 年人民币进入升值通道，2007 年新劳动合同法出台，2008 年的金融危机是一个拐点，加工贸易出口占比开始持续下降。到 2019 年前 8 个月，一般贸易进出口占比 59.8%，加工贸易进出口占比下降到 24.9%左右。^①

表 3 中国外汇储备变化情况 单位：亿美元

年度	外汇储备	年度	外汇储备	年度	外汇储备
1978	1. 67	1992	194. 43	2006	10663. 44
1979	8. 40	1993	211. 99	2007	15282. 49
1980	- 12. 96	1994	516. 20	2008	19460. 30
1981	27. 08	1995	735. 97	2009	23991. 52
1982	69. 86	1996	1050. 49	2010	28473. 38
1983	89. 01	1997	1398. 90	2011	31811. 48
1984	82. 20	1998	1449. 59	2012	33115. 89
1985	26. 44	1999	1546. 75	2013	38213. 15
1986	20. 72	2000	1655. 74	2014	38430. 18
1987	29. 23	2001	2121. 65	2015	33303. 62
1988	33. 72	2002	2864. 07	2016	30105. 17
1989	55. 50	2003	4032. 51	2017	31399. 49
1990	110. 93	2004	6099. 32	2018	30727. 12
1991	217. 12	2005	8188. 72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二）深化改革释放了对外经济贸易增长的巨大潜力

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是一个世界性的伟大创举。从 1993 年 11 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到 2013 年 11 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挥市场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体制变革的一个历

^①根据海关总署 2019 年 9 月 8 日公布的数据。

史性飞跃。1994年，按照市场经济的体制要求推动了对外贸易管理体制、外汇管理体制、利用外资管理体制、对外经济管理体制等涉外体制改革。1992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突破了百亿美元大关（110.08亿美元）；1993年以外资为主、国际工序分工为主、全球价值链低端为主的加工贸易出口额首次超过以本地企业为主、发挥比较优势为主、低成本为主的一般贸易出口额；1994年人民币汇率从官方汇率、调剂汇率和黑市汇率并轨成有管理的单一汇率制；对外贸易开始从长期逆差转为长期顺差新格局。

1978—1992年的15年中有10年的贸易逆差，外汇短缺是新中国成立前30年和改革开放前15年最重要的发展瓶颈之一。从表3的外汇储备数据也证明，1978年我国外汇储备余额只有1.67亿美元，到1990年也只有111亿美元。与当时国内严重短缺经济和对国外先进技术、设备、人才、原材料的巨大需求相比，提升创汇能力和出口购买力是重中之重的大事。这种瓶颈约束在1994年以后发生根本性化解。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1993年11月召开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推动了汇率改革、外贸改革等市场化改革举措。从1994年起，货物贸易长期保持顺差，外汇储备资产额在1996年突破1000亿美元，2006年突破1万亿美元，2011年突破3万亿美元。

（三）特殊区域发挥了促进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的重要作用

以创新思维推动经济特区、新区、高新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等特殊区域改革。1979年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同志代表广东省委向中央正式提出创办贸易合作区的建议：“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邓小平提出：“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作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①同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的两个报告，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出口特区”，后改为“经济特区”，即实行特殊经济政策和经济体制的地区。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并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至此，中国有法律保障的经济特区正式诞生。从兴办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到全面开放沿边内陆地区，从兴办经济开发区、高新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再到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贸区（港）、上海临港新片区、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等，先试点后推广、从点到面，逐步形成了多层次、宽领域、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

^①邓小平：《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7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17页。

（四）加入世贸组织推动改革开放上台阶

2001 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改革开放取得实质性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它标志着我国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把握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能力上了一个大的台阶；它标志着我国经济体制机制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上了一个大的台阶；它标志着我国提升综合国力和产业国际竞争力、在扩大对外开放质量方面上了一个大的台阶。从 2003—2012 年，也就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 10 年里，按汇率计算，我国 GDP 增量是美国 GDP 增量的 1.4 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是美国 GDP 增量的 1.9 倍。其中一条重要的发展经验是，“过程比结果重要”。在 1986 至 2001 年申请加入 GATT/WTO 的 15 年，我们对市场经济、国际规则、开放条件的国际竞争力有了入木三分的认识。

申请加入世贸组织的 15 年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1986—2001 年申请加入世贸组织的 15 年，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15 年，是推动市场经济规则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的 15 年，也是在开放条件下提升国际竞争力的 15 年。1980 年，我国出口商品中初级产品占到 50.3%，1986 年下降到 36.4%，2001 年下降到 9.9%，2012 年下降到 5% 左右。随着我国出口购买力持续上升，我国重要大宗商品和原材料的保障能力得到显著增强。初级产品进口比重从 1993 年的 13.7% 上升到 2018 年的 32.9%。

（五）双向投资促进了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经济国际化程度显著提高。1992 年我国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首次突破百亿美元大关，2010 年突破千亿美元大关。2005 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首次突破百亿美元大关，2013 年突破千亿美元大关。然而，在加入世贸组织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效应基本释放出来后，如何推动新一轮更高水平的开放、更高标准的改革、更高质量的发展是一个新课题。2018 年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对外直接投资（ODI）的规模分别为 1350 亿美元和 1430 亿美元，双向投资进入低速增长阶段。我国经济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实际利用 FDI 和扩大对外投资要取得新的突破，就必须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标准体制改革和高质量经济发展。包括在 2020 年元月推出外商投资法及相关行政法规配套措施；落实竞争中性原则，凡是与外商投资法不一致的，都要坚决予以废止或修改；进一步放宽外资市场准入，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银行、证券和保险业对外资全面放开市场准入；对各类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以公正监管保障中外企业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然而，中美大国博弈在这个问题上在举行拔河比赛。美方要求美国企业从中国撤资，美国商会明确回答“不”。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 2019

年会员调查显示，97%的受访美国企业在华盈利，87%的受访美国企业表示，他们没有也不打算将业务迁出中国；83%的受访美国企业表示，过去一年他们没有削减或停止对华投资。

（六）中美贸易战推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高质量发展

中美贸易战爆发以来，已经扩展到科技、汇率、金融、产业和能源等各个层面，对我国和平发展及民族复兴大业产生巨大影响。从2019年上半年我国对外贸易形势看，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11%，占比41.7%；外资企业进出口下降1%，占比40.4%；国有企业进出口增长0.3%，占比17.5%，民营企业进出口贸易有更强的适应能力和调整的灵活性。国有出口企业所占比重已经从1980年的99.8%下降到2017年的10.2%。机电产品出口增长5.3%，占比58.2%；7大类劳动密集型产品增长7%，占比18.8%。在2005年人民币汇率升值，2007年新劳动合同法出台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环保新政加大了生态成本以及美国加征关税税率15%至30%等一系列因素作用下，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仍保持了强劲的出口增长。我国对欧盟、东盟以及“一带一路”进出口的增长基本上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然而，对美国进出口下降了9%，其中对美国出口同比下降2.6%，自美进口同比下降25.7%，贸易顺差9548亿元，扩大12%。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长5.5%，占比59.9%，加工贸易出口与一般贸易出口之间的比例，^①从2008年的102%，即加工贸易出口规模略大于一般贸易出口规模，持续下降。这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一是从代工贴牌嵌入国际工序分工发展加工贸易，进入发展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自主营销渠道为主的新型贸易方式，一些中国的跨国企业开始构建自己的全球供应链体系。二是从积极利用成本驱动为主、市场驱动为主的外资，进入到利用进一步改善投资和营商环境的机遇，引进效率驱动为主的高技术服务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的新时代。三是从长期依赖扩大出口和“引进来”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时代，转向出口与进口并重、“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一二三产协同“走出去”，用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一轮科技革命成果改变传统农业、工业和服务业，构建全球综合运作体系的新时代。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加工贸易货物监管办法》以及《加工贸易审批管理暂行办法》中将加工贸易界定为：指经营企业进口全部或部分原辅材料、零部件、元器件、包装物料，经加工或装配后，将制成品复出口的经营行为，包括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前者是指进口料件由境外企业提供，经营企业不需要付汇进口，按照境外企业的要求进行加工或装配，只收取加工费，制成品由境外企业进行销售；后者是指进口料件由经营企业付汇进口，制成品由经营企业出口外销的经营行为。

五、新中国第三个 30 年对外经济贸易发展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折期。在这个关键时期，国际环境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全球系统性风险持续上升，大国政治经济冲突明显加剧，将在一个较长时期影响中华民族复兴进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 2019 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测从 3.9% 的乐观预测值连续 4 次下调，最后给出了较为悲观的 3.2%。从 2019 年 6 月底 7 月初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大阪峰会可以看到，当前 G20 领导人中间弥漫着一种普遍的焦虑情绪。其来源是全球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在显著增加，大国领导人们在发问，世界经济向何处去？习近平主席发表讲话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 10 年后，世界经济再次来到十字路口。要避免因一时短视而犯下不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要避免落入冲突对抗的陷阱。大国领导人们的焦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世界焦虑之一：世界经济缺增长动力。当前世界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时期，依靠金融、房地产、军工和要素投入增长支撑的模式已达增长极限，而依靠创新、技术进步和结构性改革促进生产率增长的模式又举步维艰。在这个形势下，世界头号大国采取的策略是发动贸易战，搞世界技术保护主义。如把华为、中科曙光、中广核等中国优秀企业放入了实体清单，制定了 14 个新兴和基础技术出口管制改革法案，出台了外商投资风险评估法案等。中美贸易战延伸到方方面面并变成持久战，其结果必然是最坏的双输选择。同样，日本对韩国三种不可或缺的重要半导体材料实施断供，双方都把对方移出了贸易便利的白名单，也是一个双输的选择。英国和欧盟脱欧谈判的最后结局，同样可能是双输的选项。大国之间关系的非理性选择必然导致不同强度的冲突对抗，一种可能性是趋近于局面失控。

表 4 2019—2020 年世界经济增速预测 单位：%

	预测 2019 年经济增速					预测 2020 年经济增速		
	2018. 7	2018. 10	2019. 1	2019. 4	2019. 7	2020. 1	2020. 4	2020. 7
世界	3. 9	3. 7	3. 5	3. 3	3. 2	3. 6	3. 6	3. 5
中国	6. 4	6. 2	6. 2	6. 3	6. 2	6. 2	6. 1	6. 0
美国	2. 7	2. 5	2. 5	2. 3	2. 6	1. 8	1. 9	1. 9
欧盟	1. 9	1. 9	1. 6	1. 3	1. 3	1. 7	1. 5	1. 6
日本	0. 9	0. 9	1. 1	1. 0	0. 9	0. 5	0. 5	0. 4
英国	1. 5	1. 5	1. 5	1. 2	1. 3	1. 6	1. 4	1. 4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报告》，2019 年 7 月。

世界焦虑之二：世界经济缺有效治理。经济全球化造就了相互依存的地球村，却没有建立起与时俱进的全球化有效治理体系。当前，美国在频频退群。可以设想，如果美国要求按照其意愿和利益诉求推动世贸组织现代化改革的方案没有获得足够支持，采取退出多边贸易规则体系的行动，其影响可能会大于目前的中美贸易战。美国的诉求包括改变世贸组织上诉机构越权干预美国法律的争端解决机制、“特殊与差别待遇”如 90 天不改将不再承认、非市场经济导向、透明度要求等。事实上，这些诉求很难得到多数世贸组织成员的支持，同时世贸组织多数成员又不希望美国带领其盟国退出。如果最终的结果是向美国妥协，其最大的受害者有可能是中国。世界上极少数极右势力要颠覆基于规则的自由贸易体系，推动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建立基于本国优先的所谓“三零”（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模式，从规则上边缘化中国。中国再次面临复杂和充满风险的国际环境，处于大国博弈和交锋的中心位置。

世界焦虑之三：世界经济缺内在平衡。现代经济全球化的前行有三个推动力，创新、开放和市场化。然而，近现代历史上的全球化浪潮都走不远，几十年内就会陷入停滞、衰退或倒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全球化的三个推动力都指向效率增进，却没有指向平衡协调的作用力。当全球化发展出现系统失衡时，所积累的各种矛盾就会引发危机、冲突和动荡。引发失衡的主角往往是当时的霸权国家，而为失衡付出代价的往往是其他国家。如 1870 至 1913 年的英国，1990 至 2008 年的美国。当国际矛盾积累到相当程度时，就会引发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冲突对抗，^① 进而引发战争、汇率和石油危机、金融危机，最终导致世界经济格局的大调整和大变动。

世界焦虑之四：世界经济缺包容合作。当前，涉及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合作机制，如联合国 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全球气候变化巴黎协议等，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分歧。世界各国利益差异大，分歧多并不怕，但世界霸权国家不承担全球责任，搞以邻为壑、零和博弈，会最终导致世界分裂。如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手段，强硬分解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长期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合作基础，搞断链、断供、断交，直接导致全球产业链出现本地化、区域化、碎片化的趋势。1990 年的 IT 革命造就了综合物流革命和全球供应链管理体系，形成了当前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全球格局。当前刚刚兴起的 AI 革命正在造就全球工业互联网、物流网和需求导向生产服务体系，加速形成全球产业链为基础的“三链”本地化、区域化和分散化的全球新格局。

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历史看，大国政治经济冲突明显增加曾直接导致全球经济失序、混乱和对抗。如 1870—1913 年的经济全球化，当时的新兴国家美国、

^①19 世纪后期的英国与美国和德国、21 世纪初期的美国与中国就是这种场景。

德国把握住开放期和兴盛期重合的机遇，借助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和产业快速崛起，当时的霸权国家英国、法国推动了全球化和开放，忙于扩张海外殖民地，忽视了新工业革命的机遇，综合实力由盛而衰。新兴国家要求改变世界格局，20 世纪 20、30 年代的冲突对抗直接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贸易战、大萧条和世界失序及混乱。从现实看，中华民族复兴是改变世界现有格局的大事件，历史正在重演。如何避免因一时短视而犯历史性错误，如何避免落入冲突对抗的陷阱，如何避免中美非理性对抗把世界拖入冲突的深渊，是大国领导人必须面对、思考和应对的大问题。这是 G20 领导人普遍焦虑的根源。

要重新认识战略机遇期的新内涵。习近平主席曾经说过，在历史上，兴盛期往往与开放期是重合的。把握住开放期的重大机遇，进入发展的快车道，是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全球化也是双刃剑。历史上，风险期也往往与开放期重合，当前，全球化到了下半场，系统性风险可能大于显性机遇。怎么办？2018 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辩证看待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变化。国内条件变化主要指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要推动完成新旧动能转换、新旧结构转换、新旧模式转换；推动质量、效率和动力三大变革；推动有利于一流科学、技术和人才发展的科研管理体系改革和生态系统建设；推动支撑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一流工业服务、产业基础能力和创新环境建设；推动全球开放层次最高的特殊区域，如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自由贸易园区（自由港）和特殊经济功能区建设。

应对中美战略博弈的重点是保持平常心。首先要尊重经济常识、规律和基本逻辑。始终坚持尊重经济规律实现高质量发展，尊重自然规律实现可持续发展，尊重社会规律实现包容性发展。其次要保持历史耐心、战略定力、底线思维。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发展史上曾经遭遇过更困难的时期都挺过来了，要始终保持历史耐心。不要浪费大变局带来大变革的历史性机遇，要始终保持战略定力把自己的事情做好。金融、科技和能源领域的较量意味着外部风险增大，要始终保持底线思维居安思危，要做打持久战的准备。

新中国成立的 70 年，我们经历了“一个世界、两个体系”的时期，经历了“大引进”推动“洋跃进”的时期，经历了代工贴牌起步的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时期，也正在经历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和发展的时期。70 年对外开放的经验值得总结。一是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既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刻骨铭心的集体记忆，也是 70 年革命和建设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更是 40 年对外开放理论和实践的不断求索。二是开放的本质是改革。从创办特区、到加入世贸组织，再到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一条主线是推动体制创新。经验证明，没有体制变革和社会进步的开放最终会被动挨打。三是开放的意义是推动科学、技术、人才和创新的动态进步。开放与人类社会的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

相衔接，开了 14 亿中国人的现代化、市场化、国际化发展的“窍”。四是开放是一个渐进动态演化的生态系统。京津冀从各自为战到协同发展；长三角从高速增长到推动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广东从“三来一补”到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四川、重庆从“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到打造国际化综合交通枢纽；海南从边陲海岛到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都证明只要坚持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条条大道通向成功发展。五是危机、挑战和压力是扩大开放的动力。开放主动引入外部竞争压力，不浪费危机可能促进转型发展的历史性机遇。六是开放意味着开放国际竞争与合作。在开放的激励下，从要素禀赋到要素创造，从开放竞争到共享合作，从中国特色到全球交融，中国正成为全球动力源和活力策源地。七是开放带来“干中学”的内生学习效应。开放转变了思想观念，激发出各种积极因素，取得了内生发展效应。八是开放造就了开放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构建了保护主义难以解构的利益共同体，在逆全球化条件下，成为继续推动全球化前行的重要力量。

参考文献：

1. 陈东林：《20 世纪 50—70 年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引进》，《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4 年 6 期。
2. 邓小平：《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79）》，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
3. 宫力：《从中美缓和到实行“一条线”的战略》，《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2 年 5 月第 6 卷第 2 期。
4. 李先念：《关于国民经济调整问题报告》（1979 年 4 月 5 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2011 年版。
5. 李正华：《1978 年国务院务虚会研究》，中国网，2010 年 4 月 19 日。
6. 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
8. 佚名：《“Z 世代”》，《美国商业评论（中文版）》2019 年 7 月 10 日。

责任编辑：谷 岳

关于世贸组织改革面临的 严峻形势及中国的对策

霍建国

摘要：由于国际经济贸易格局的变化，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国际多边贸易规则不断受到冲击和挑战，致使世界贸易组织的权威性受到严重影响。2018 年以来，美国、欧盟和加拿大等成员已就改革问题先后发表了书面意见，提出了各自的主张和建议，中国商务部也发表了针对世贸组织改革的有关文件和主张，并正在积极地同有关成员进行沟通和协调立场。2019 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大阪峰会已同意启动世贸组织改革。但从目前的进展看，改革仍充满了矛盾，美国、欧盟、日本和中国各自的立场和诉求相差甚远，难以达成一致。中国应高度重视世贸组织改革进展及动向，厘清多边贸易体制发展困难的真正原因，未雨绸缪，争取获得主动。

关键词：世贸组织改革 国际多边贸易 贸易规则

作者简介：霍建国，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副会长。

1995 年成立的国际多边贸易组织全面继承和捍卫了 1947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和 1994 年乌拉圭回合谈判的全部成果，世界贸易组织（WTO）独特的工作机制和以规则为基础的约束机制成功的开创了国际贸易的治理模式并得到了广大成员国的高度认可和支持。进入 21 世纪，由于国际经济贸易格局的变化，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主要贸易大国和利益集团针对 21 世纪新规则的博弈日益凸显，导致国际多边贸易规则不断受到冲击和挑战，致使 WTO 的权威性受到严重影响。2018 年以来，美国、欧盟和加拿大等成员已就改革问题先后发表了书面意见，提出了各自的主张和建议，中国商务部也发表了针对 WTO 改革的有关文件和主张，并正在积极地同有关成员进行沟通和协调立场。2019 年二

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大阪峰会已同意启动 WTO 改革。但从目前的进展看，改革仍充满了矛盾，美国、欧盟、日本和中国各自立场和诉求相差甚远，难以达成一致。中国应高度重视 WTO 改革进展及动向，深入把握、未雨绸缪，争取在国际社会获得主动。

一、厘清国际多边贸易体制受阻的真正原因

要推动多边贸易体制改革，必须厘清多边贸易体制发展困难的真正原因。改革不是推倒重来，更不是为了满足部分国家的关注和诉求，国际多边机构的存在和发展是兼顾各方利益的一种复杂的平衡过程，其中大国更应主动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一）多哈发展回合谈判被无限期拖延迟滞

2001 年多哈回合谈判的启动主要涉及三方面议题：一是发展问题几乎涵盖了贸易领域与发展相关的一切诉求；二是市场准入问题涉及农业、非农产品和服务贸易领域的市场开放取消各种关税和非关税措施；三是修改和完善相关规则，如反倾销、反补贴纪律及争端解决机制规则的修改完善，对区域贸易协定相关规则的完善，对环境产品自由化以及可能启动的新加坡议题规则的讨论等。应该说多哈回合谈判同前 8 轮多边贸易谈判相比，议题覆盖面最广、力度最大，涵盖了 96% 的全球贸易，市场开放目标是乌拉圭回合的三倍，根据计划全部谈判应在 2005 年 1 月完成。多哈回合之所以被称为发展回合主要是因为当时有两大背景：一是 2000 年 9 月联合国召开了千年首脑会议，提出了新的千年发展目标，全球都在关注发展问题，特别是欠发达国家的脱贫问题；二是 2001 年 9 月 11 日美国受到恐怖主义袭击后，美国对外政策将联合更多国家反恐作为首要任务，全球反恐行动被提到议事日程，在此背景下美国不得不迁就发展回合谈判的有关要求。

多哈回合受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议题过于广泛，且参加方多达 142 个成员，难于达成一致；二是欧美各自关注点不同，缺乏利益驱动的积极性；三是国际利益格局发生复杂变化，发展中成员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不断升上，为维护发展中成员的利益，更多的发展中成员结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坚决捍卫发展利益并对美欧形成压力；四是区域贸易协定的兴起和快速发展对多边统一规则形成新的挑战；五是围绕规则解读难以协调一致。总之，多哈回合谈判的失败，主要是欧美国家经济发展困难加大，面对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崛起，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暴露了 WTO 协商一致原则的弱点。

（二）上诉机构因大法官缺失而面临瘫痪

WTO 成立后，上诉机构的工作得以加强，乌拉圭回合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是对争端解决机制的全面修改和更新。与原关贸总协定争端解决安排相比，新规则赋

予上诉机构独立的裁决权。WTO 的上诉机构由 7 名大法官组成，负责审理专家组报告中有关法律问题的上诉，上诉机构的裁决是终审裁决，各方必须执行。上诉机构的法官由被公认的法律、国际贸易和 WTO 专家组成，其国籍地域分布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每位成员任期 4 年，经 WTO 成员同意还可以连任一届。由于美国对上诉机构裁决的不满和抱怨，故意迟滞新任法官的遴选工作，目前仅剩 3 人工作。美国迟滞的理由是上诉机构工作效率低下，平均案件的裁决需 13 个月的周期，比规定的 9 个月要滞后 4 个月，同时抱怨上诉机构法官裁决不够公正等，并多次提出改革上诉机构的要求，希望重新回到关贸总协定的争端解决机制，致使目前的上诉机构无法正常工作。

（三）贸易政策审议机制形同虚设

WTO 贸易政策审议机制一直是 WTO 的核心功能之一，与争端解决机制和贸易谈判一起被称作 WTO 的三大支柱。为了遏制贸易保护主义，关贸总协定从第七轮谈判开始就尝试加强对缔约方贸易政策的监督和审议，并于 1979 年 11 月通过了“关于通知协商争端解决和监督的谅解”。通过设立总理事会特别会议，建立了对多边贸易政策的审议机制，由总理事会每年召开两次特别会议，审议贸易制度的总体发展。在程序上，为了便于审议的进行，一般由被审议的成员准备一份国别报告，通报被审议期间其经贸政策的演变和实施。WTO 秘书处同时准备一份详细的汇总报告，由秘书处就相关成员有关经贸政策的演变和实施提出独立的中性的分析报告。WTO 成员则基于这两份报告在审议开始前对被审议成员进行提问。被审议成员需在规定期限内对提问进行答复，尤其是针对主要成员贸易政策审议，各成员的关注度和参与度是较高的。

目前审议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一是审议机制与 WTO 其他功能脱节难以发挥有效的约束职能，且审议结果不具有强制性；二是成员通报表现不佳，大多数成员均难以按程序要求定期提供相关通报，削弱了审议的效果；三是对主要贸易大国的审议更难以促进实质性解决问题，且由于大部分发展中成员对规则的把握能力不足，影响其参与审议的有效性。

（四）区域贸易协定发展对多边贸易规则形成新的挑战

区域经济合作并不是 WTO 成立后的产物，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已陆续产生，例如欧共体的诞生和逐步加强，拉美安第斯共同体、南部非洲关税同盟、海湾合作委员会以及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成立和诞生都是重要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20 世纪 90 年代后，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主要贸易大国区域经济合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1994 年北美自贸区的建立，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APEC）的启动，特别是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

等超大型自贸区的出现，这些自贸区的存在和发展推动了全球经贸格局和国际经贸规则加速演变。从经济的角度分析，自贸区的发展总体有三大影响：一是贸易创造效应明显，自贸成员间通过相互降低关税，取消贸易限制，通过降低成本可以达到扩大贸易的效果；二是贸易转移的效果，自贸协定的参与方通过在内部实行自由贸易将使参与方减少自外部进口的机会，转为从自贸伙伴进口，从而导致贸易流向发生变化，这种贸易转移的效应会导致自贸协定非参加方被边缘化，贸易利益将受到较大减损；三是众多区域贸易协定的存在对 WTO 多边贸易规则形成新的挑战。随着全球分工从最终产品转向以产业链为基础的要素分工，发达国家在全球化的争夺焦点发生明显变化，政策关注点更多地从货物贸易转向服务贸易，从关注边境贸易政策转向更加关注一国边境后政策，从自由贸易转向所谓公平贸易。为适应这种新的竞争需要，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正从规则层面入手，绕开 WTO 多边体制，在区域合作层面推进新的规则 and 标准，将自贸协定视作推行国际经贸新规则的试验田，企图打造 21 世纪贸易协定的新模板，占据未来发展的制高点。这些新规则和新标准的规范内容从贸易政策延伸到产业政策、环境标准、劳工标准，规范领域从边境措施延续到边境后，远远超出传统贸易协定的范畴，从而对国际多边贸易规则形成了严重的挑战。

（五）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对多边规则造成破坏性影响

美国长期以来奉行的单边主义政策对 WTO 的规则形成严重冲击和破坏，特别是特朗普总统执政以来奉行的“美国优先”和“美国第一”的单边主义政策对国际多边贸易体制形成了新的冲击和挑战。例如，美国随意引用 WTO 的保障条款和国家安全例外条款，以美国国内 1962 年贸易法和 1974 年贸易法为依据，强行对部分国家钢材和铝制品加征关税以及对中国开展 301 调查等行为，都是明显违背 WTO 多边贸易规则做法的，这种行为同 WTO 多边贸易规则及争端解决机制的要求是完全背离的。尽管国际社会和 WTO 对美国的单边主义不断发出警告和指责，但长期以来美国习惯于国内法大于国际法的做法，美国的行为不仅引起了 WTO 主要贸易伙伴的反对和抵制，同时也是对多边贸易规则的践踏和挑衅，如不加以纠正，多边贸易规则的严肃性将遭到彻底破坏。

二、WTO 改革面临的矛盾及主要成员的关注点

自 2018 年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抱怨 WTO 对美国不公平并威胁要退出 WTO，美国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在出席第 11 次贸易部长会议期间公开提出了对 WTO 的改革建议，此后在 WTO 理事会又多次提出针对发展中国家享受差别优惠待遇的改革意见。关于美方提出的 WTO 改革意见，我们应认真研究对待，对其不合理的建议应予以主动批

驳，并提出可行的改革建议。

（一）关于发展中国家差别优惠待遇问题

WTO 机制中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差别优惠待遇问题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自 WTO 成立以来，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制，目前成员已达 164 个，其中 85% 属于发展中成员，实际情况是部分成员的经济贸易发展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变化符合联合国确立的千年发展目标的要求，是一个积极的变化，其取得的成绩应予以充分的肯定。而美国提出的新的标准初看上去似乎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实际上其动机和科学性是有问题的。首先，同 WTO 的宗旨是相违背的。《马拉喀什声明》明确指出 WTO 的宗旨是为了促进贸易与就业发展，实现经济发展的繁荣。如果过早的剥夺掉部分发展中国家享受差别优惠待遇的权利，将会对这些国家的发展带来新的矛盾和压力，不符合 WTO 的基本宗旨。其次，差别优惠待遇只是一个原则，并没有明确的标准，在实际执行中是通过谈判承诺来实现的，体现了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这一原则的存在是 WTO 的一个创举和魅力所在，符合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在过去的发展中也证明了这一原则的存在是有助于激发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多边贸易体制中来共同推动全球贸易的发展，效果是应予以充分肯定的。第三，WTO 的原则是协商一致，个别国家的标准不应成为强加在众多成员头上的一个新的标准。所以美国提出的标准应由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充分发表意见，并做出最后的选择。

（二）坚决抵制美国关于对发展中成员分类的标准

美国于 2019 年初直接向 WTO 理事会提出了关于发展中成员继续享受差别优惠待遇的四条标准，主张四类成员不应再继续享受差别优惠待遇，包括经济合作组合（OECD）国家、G20 国家、高收入经济体成员、贸易额占全球贸易 0.5% 的经济体。我们注意到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发展，不少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贸易中的比例已发生了积极的变化，这一标准会涉及到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相信很难被广大发展中国家所接受，甚至会严重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经济贸易的平稳健康发展。在国际经济治理和多边贸易体制改革的问题上，坚持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是一个重要的原则，任何一个国际机构的存在如果只是为了维护少数国家的利益，而忽视了大多数成员的切身利益，这样的机构肯定是难以发挥其作用和影响力的。所以 WTO 的改革重点不应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改革，而应将改革的重点定位到加强和巩固 WTO 的作用和影响力方面。

（三）明确 WTO 改革的重点和急需推动解决的问题

我们认为 WTO 改革不应采取颠覆性的改革方法，而应坚持其行之有效的基本的原

则，如促进贸易和就业的发展目标。协商一直的有关原则，坚持公开、透明、公平公正的原则等。当前 WTO 的改革应以完善其机制为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加强 WTO 的工作机制及其权威性，如何尽快解决上述机构工作机制瘫痪问题以及当前面临的国际贸易的新变化，对于原有的部分规则如何进行完善和修改，以及对于新形势下发生的一些新的贸易行为如何界定并明确新的贸易规则和要求，以进一步促进全球贸易的发展及全球经济的繁荣。

（四）国企中性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的标准问题

从目前全球自贸协定发展趋势看，欧美国家在这一轮改革中都高度关注国企的中性竞争政策和过度的产业政策支持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我们肯定会面临来自欧美国家的限制和挑战，但应该指出国企的存在是世界各国普遍的现象，实行严格的界定标准和创建公平法制、一视同仁的竞争标准是完全必要的。我国人大会议通过的外商投资法已为我国各类企业构建统一的竞争环境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们愿在推进公平法制的营商环境方面做出持续的努力，但应注意在具体的规则和标准的确定过程中应平衡考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情况，标准不应是针对新兴经济体的，同样应对发达国家存在的公开和隐形的产业政策和补贴予以严格的约束和限制。总之，这将是一项技术性很强、十分复杂的谈判过程，需要根据我方利益，既要坚持原则又要保持一定的灵活性。

（五）针对上诉机构的改革

关于针对上诉机构的改革将是此轮改革的重点之一，我们应认真对待争端解决机制改革问题。美国指责争端解决机制“越权”主要是因为上诉机构按 WTO 协定裁决妨碍美使用国内法应对所谓“非市场导向的政策和做法”。所以美国希望推翻现有的上诉机构的终裁程序，重新回到关贸总协定的争端解决机制。这是一种明显的倒退，相信主要成员均难以接受，我国在尽快恢复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裁决功能方面与欧盟、日本的立场基本一致，改革的目的是要继续加强上诉机构的作用并发挥其权威性，约束美国的单边主义和以国内法为主的霸权主义做法，将美国关进制度的笼子。关键是要先恢复上诉机构的法官遴选机制，当然也可考虑增加上诉机构成员数量，延长任期等一些合理化提议。

三、中国参与 WTO 改革应把握的有关策略

（一）积极主动参与 WTO 改革，注意发挥中国的作用和影响力

此次 WTO 改革对中国尤其重要，WTO 改革的成败对中国的发展模式和理念是一次重要的考验，其重要性明显要大于对美国 and 欧盟的影响。因此，中国对 WTO 改革应采取

积极主动态度。当前 WTO 改革面临的形势和矛盾是极其复杂的，其中所讨论的议题涉及多个领域，如发展中国家的差别优惠待遇争议、透明度原则和通报机制的要求、产业政策和补贴的规范使用、国企竞争政策问题等，大部分改革的谈判内容都同我现行政策存在一定的差异和矛盾，将超越我国商务主管部门的职责范畴，需有关部委的配合并提供相应的谈判口径，有些还需要党中央、国务院的授权，建议商务主管部门应早做预案准备，加强同有关部委的沟通协调，如有必要应尽早成立更高级别的协调决策机构。

（二）WTO 改革对中国深化改革开放意义重大

坚持深化改革开放是国内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中国参与国际多边合作和在国际组织中发挥积极作用的需要。要将推进 WTO 改革与深化国内改革开放密切联系起来，明确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改革重点和节点，真正将外部压力转化为内部动力。同时也要确定哪些关键点是我们的底线，是必须坚持的。在把握大势的背景下，我们才可以更好地把握国内改革开放的方向和目标；通过加快深化国内改革，才能更主动的为推进 WTO 改革提供必要的政策环境，并使我国在新一轮国际多边规则的博弈中处于主动。

（三）抓紧研究 WTO 改革的有关内容及贸易规则的修订与重塑

目前美国没有对 WTO 规则改革提出具体方案，但通过分析美国签署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USMCA）以及推动跟欧盟、日本的自贸协定谈判的有关内容，不难看出美国正在构建一个替代 WTO 的全球贸易规则的框架。美国改革的主张可以从美贸易谈判代表罗伯特·莱特西泽 2017 年在第 11 届贸易部长会议期间的讲话中看出一些端倪，此外 TPP 规则的模板也充分反映了美国的主张。因此，在推动 WTO 改革的同时，中国应该高度重视对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及 USMCA 的研究，找出哪些是符合中国发展利益的条款，推动国内的政策调整。对于中国目前执行有困难的规则条款，要注意把握谈判策略，争取达成于我有利的谈判结果。

（四）推进 WTO 改革，中国要处理好同欧盟的合作问题

WTO 改革主要是看中美两国的博弈结果。中美双方都是最重要的贸易大国，中国不可避免将与美国在多边改革中发生对抗和冲突。我们既要坚持原则，维护我长远利益，更要兼顾好缓解中美矛盾和针对 WTO 改革的利益平衡。此次 WTO 改革要特别关注欧盟的态度。欧盟较关心的是上诉机构的改革、公平竞争政策及补贴规则的修改，美国更希望改革发展中国家的差别优惠待遇，约束国有企业的竞争行为等。在改革的诉求方面，特别是在如何约束美国的霸凌做法方面，我们同欧盟有一定的共同诉求，因此我们同欧

盟应尝试在 WTO 改革中加强协调立场，共同抑制美国的霸权主义。因为要想制衡美国必须要处理好与欧盟的合作关系，特别要加快推进中欧的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以推动中欧合作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目前中欧联合提案的方式和副部级沟通机制已正式启动，最近又针对上诉机构改革问题提出了联合议案并取得良好效果。因此我们还需要继续寻求在多个改革议题上同欧盟的合作。

（五）跟踪了解日本的态度，避免日本成为美国的工具

我们注意到日本不仅有意愿推进 WTO 改革，而且在推动 WTO 改革问题上愿意扮演一个贸易大国的角色，发挥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必须要加强与日本的沟通合作，借当前中日关系改善之际，继续加大力度推动中日、中日韩 FTA 的进程。此外中国也要注意美欧日之间及其与成员之间的矛盾，以利分化瓦解、巧妙利用。

（六）做好舆论宣传工作

WTO 改革的舆论宣传工作十分重要，美国明明是 WTO 规则的破坏者，但其经常在国际场合颠倒黑白，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受害者，反而不断批评指责中国是 WTO 规则的破坏者，并将改革的矛头指向中国，同时还不断地拉拢其主要贸易伙伴企图结成同盟。对此我们应予以坚决的反击，向全世界阐明 WTO 面临艰难困境的真实原因，充分认识到美国奉行的单边主义危害，以及其在改革问题上狭隘之意。针对 WTO 的改革宣传要注意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针对改革议题的舆论宣传，如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如何约束个别贸易大国的单边主义行为，为什么要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差别优惠待遇，为什么要维护最惠国待遇原则等。二是针对 WTO 的改革议题及改革的方向一旦有了倾向性意见，我们一定要做好早期的舆论宣传工作，如规范的产业政策、不可诉的补贴政策、国有企业改革、公平竞争条件等议题，有必要做好国内宣传，统一思想，既有利于促进 WTO 改革的谈判，也有利于推动国内市场化改革，争取主动，避免欧美借改革之机批评和丑化我国形象。

从目前形势判断，WTO 改革是我国面临的一场复杂艰巨的多边博弈，任重而道远。需要明确哪些是利益攸关的、哪些是必须坚持的、哪些是可以体现灵活性的，尽快组织专业团队加强对重大问题的研讨、做好各种预案。要警惕 WTO 改革中可能存在的陷阱，同时也要注意发挥中国的智慧和影响力，力争通过改革为我国开创一个良好的可持续发展的外部环境。

责任编辑：沈家文

· 国际经济 ·

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的国际经验

宋 群 杨 坤 陈 啸

摘要：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人民的健康需求与日俱增，但我国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养老问题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2018 年，我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 17.9%，老龄化程度上升态势较为迅速，对养老服务产业需求不断扩大，对养老服务的质量要求也不断提高。日本等发达国家早于我国数十年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其养老服务产业也已经历了较为长期的发展，并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养老服务产业体系。本文介绍了日本、新加坡、英国和德国等发达国家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经验，为构建适应我国发展需求的养老服务产业体系提高了参考。

关键词：养老服务 产业供给 市场监管 保险公益

作者简介：宋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家发展改革委学术委员会原秘书长；

杨坤，创新养老产业促进平台负责人；

陈啸，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

一、日本：以政府加公私合办为主的养老服务产业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一个国家或地区在 60 岁以上的人口比例达到 10%，65 岁及以上的人口比例达到 7% 以上，即可被称为老龄化的社会；65 岁及以上的人口比例达到 14% 即可称为老龄社会；65 岁及以上的人口比例超过 20%，则可以被称为过度老龄社会。日本在 1970 年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1994 年进入老龄社会，2006 年成为世界上最早迈

人超老龄社会的国家之一。日本社会的老龄化速度是全球少有的，为应对老龄化挑战，日本构建了结构完善、门类齐全的养老服务产业体系，积累了很多经验。

（一）完善的政府管理体系

日本政府在养老服务产业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立法与行政上重视对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的支持、鼓励、规范和引导，确立了较为完善的政府管理框架。

完善法规。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日本政府针对老龄化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如 1959 年《国民年金法》、1963 年《老年人福利法》、1982 年《老年人保健法》、1987 年《社会福利及介护士法》、1992 年《社会人才确保法》、1995 年《高老龄社会对策基本法》、1997 年《介护保险法》、2004 年《护理社会保险法》等，搭建了养老机构发展的法律框架，从法律上保障了老年人权利，规范了老年服务队伍的建设 and 从业人员的权益。1989 年制定了《促进老年人健康与福利的十年规划战略》（即《黄金计划》），完善了社会保障制度；1994 年制定了《新黄金计划》，确立了社会养老的基本原则；2002 年又推出了《21 世纪黄金计划》，构建面向全体公民的养老服务体系。2011 年日本大幅修订《关于保障老年人住房稳定的法律》（俗称《老年人住宅法》），为老年人住房稳定事业提供直接补贴、税收优惠和金融优惠。

加强指导管理。日本设有内阁总理担任负责人，内阁官房长官、相关行政部门部长组成的“高龄社会对策会议”，负责制定和审议高龄社会养老策略，协调各部门行动。日本劳动厚生省承担国民健康、社会保险和社会保障等职责，是养老机构建设运营的主管部门，管理全国养老机构法人和协会组织，出台机构建设运营标准，为机构建设提供支援和指导。

（二）公私结合的产业供给

日本养老机构从性质上分为公办、民办、官民协作三种类型，形成了以公私结合的产业供给模式。公办主导的运营主体包括社会福祉法人、社会福祉协会和医疗法人等。社会福祉法人是日本最大的福祉提供主体，主要负责特别养护老人院、上门护理服务等，其运营的福祉设施约占日本福利设施的 45%。社会福祉协会原则上为具有自主性的民间组织，但由于是以行政主导设立的，因此行政色彩较强。医疗法人包括医院、诊疗所以及护理老人保健设施。民办运营主体是 20 世纪 80 年代兴起的以营利为目的从事养老产业的企业。根据日本老年人住宅财团的 2011 年的调查，服务型老年人住宅中，以股份公司和有限公司为法人的比例超过了 70%。官民协作的运营主体包括农业协同组、生活协同组等非营利团体以及非营利活动法人等组织。农业协同组、生活协同组原非提供护理服务的

组织，但随着老龄化加剧发展也增加了老人护理服务，并形成一定规模。非营利活动组织的主要目的是在地区内建立一种护理服务需求与供给的循环体系，地区居民本身作为护理服务提供者的同时，也是护理服务的受益者，提供以居民参与型的福祉服务，提供护理服务的主体为中老年女性。

日本养老服务业供给类型多样，按照提供的服务类型可以分为主要提供设施服务的护理机构、主要提供居家服务的居家服务事业所和居家护理支援事业所三大类。各类型机构服务内容明确，均集不同服务于一体，有效满足了不同老人的多样化需求。

护理服务机构主要包括特别养护老人院、护理老人保健机构、护理疗养型医疗机构。特别养护老人院由社会福祉法人及地方自治团体等运营的公办护理设施，可以享受由国家给予的补助，入住者只要负担较少的费用就可以长期入住。该设施入住对象原则上年龄在 65 岁以上，以处在卧床不起状态需要护理程度较重的老人为中心。服务内容包括提供饮食、排泄援助等护理服务。入住者不需要缴纳初期费用，根据护理级别的不同，入住者缴纳的设施服务费也不同。护理老人保健机构由医疗法人和社会福祉法人等公共机构运营，因此通常提供的服务费用负担较少。入住对象原则上为护理认定结果为“要护理 1 级”以上的 65 岁以上老人，主要为虽不必住院但在医疗管理之下需要照护、护理及康复训练的护理程度较重的群体，收入和资产较少的入住者作为优先使用该设施的对象。护理老人保健机构是以在医院接受急救治疗后的患者为对象，为了他们能恢复居家生活而设立的医院与家之间的中间医疗设施。该设施入住时间较短，一般为 3 个月至 1 年。提供的服务主要有照护、医疗护理、机能训练及其他必要的医疗和日常生活服务。入住者不需要支付初期费用，但要负担每月的设施服务费和生活费。入住者缴纳设施服务费根据护理级别不同而不同。由于需要追加由护士和理疗师提供的服务费用，所以通常比特别养护老人院的费用高。护理疗养型医疗机构由医院和诊疗所等机构运营，分为面向重度要护理者的护理疗养病床和面向重度痴呆症患者的老年性痴呆症疾患疗养病床。该设施的入住对象包括在医学管理上被认定为“要护理 1 级”以上、65 岁以上的老年人或者被认定为“不需要长期住院”的老年人。服务内容主要包括医生诊疗、由医生和护士进行的疗养管理和照护、医学上所需的护理、医疗照料、机能训练指导员和生活咨询员进行的恢复期康复训练、护理从业人员进行的护理服务等。入住者同样不需要支付初期费用，每月自己负担的费用包括设施服务费与生活费，费用水平在上述三种机构中最高。

居家服务事业所主要包括民办老人院、附带服务型老人住宅、痴呆老人照料之家等。民办老人院由民间事业者和特别非营利活动法人等运营，大致分为护理型民办老人院、住宅型民办老人院及健康型民办老人院。护理型民办老人院可细分为混合型和护理专用

型，混合型一般接受能够自理的老人，护理专用型接受患老年痴呆或卧床不起等重度需要护理状态的老人；住宅型民办老人院基本上以能够自理的老人为对象；健康型民办老人院基本上以能够自理的老人为对象。健康型民办老人院服务包括守护、饮食、打扫、洗衣等日常生活照料服务、紧急应对等服务。住宅型民办老人院可由外部护理事业团体提供入浴和饮食照顾、康复训练、咨询等服务，而护理型民办老人院提供上述全部服务。入住以上三种民办老人院都需要缴纳初期费用和每月利用费。附带服务型老人住宅为居家困难者及等待入住特别养护老人院等护理设施的老人或出院患者提供服务的场所，分为一般型和护理型。一般型主要以能够自理、需要支援的老人为对象，护理型主要以轻度需要护理的老人为对象。提供的服务包括由常驻护理从业人员定期巡视守护，以确认其是否安全，向其接受医生等进行生活方面的咨询等。一般型设施中需要护理的老人可以获得日间照料服务或上门护理服务，护理型设施可接受由护理从业人员向其提供饮食、打扫、洗衣等护理，还可以接受机能训练指导员向其提供康复训练等服务。入住该类设施需要缴纳初期费用和每月利用费。痴呆老人照料之家由社会福祉法人、地方自治团体和非营利活动法人等运营，是一种以“官民协作”为主导的护理服务。这是一种以5~9人为单位的老年人小规模共同生活设施，服务对象以65岁以上并“要支援2级”或“要护理1级”以上的轻度、中度痴呆症患者。服务包括痴呆症专业护理人员提供的守护、饮食、打扫、洗衣、机能训练和紧急应对等服务。入住者需要缴纳初期费用、每月利用费和生活费。

居家护理支援事业团体是为需要护理的人能够利用适当的服务，对本人或其家属进行咨询，制作并修改护理服务利用计划以及与护理服务事业团体和护理机构进行联系沟通等工作。

（三）细致标准的评估运营

为了保证供给机构提供的养老服务的质量，日本建立了完善的养老机构评估体系和标准化运营体系，同时强调提高服务的人性化水平。

开展评估。日本建立了入住老人评估制度，由专业人士对申请者身心状况、行为能力和生活能力进行数十项的调查评估，并辅之以医疗调查，最终确定入住资格和等级。为提高机构运营和服务质量，建立了评估体系，开展机构自评、老人评价和第三方评价。自评，主要由机构自身遵照政府法规和有关标准，从结构、管理和服务等方面进行；老人评价，从受服务者体验和感受出发进行过程及结果评价；第三方评价，由县区评价机构、质量监督组织和医疗护理机构人员组成，主要从养老机构的构成、服务内容、服务

过程和结果等方面展开。评估结果在官方网站公布，全体公民可在线查询，老人及家属可依据评估情况选择入住机构。评估有利于监督养老机构运营、保障老年人权益和服务政府决策。

标准化运营。日本厚生劳动省针对各类型养老机构特点制定了涵盖设施、人员配备及运营标准，其中营利性养老机构另行制定标准。每种类型养老机构人员数量等严格执行配备标准。以特别养护老人院为例，要求每 50 名老人配备工作人员 15 名，其中院长、办公人员、看护人员、营养师、生活指导员、医生（可兼职）各 1 名，厨师 4 名，护理人员 5 名。在建筑设计方面，对机构服务设施和安全设施都有明确的标准。为确保养老机构和入住老人双方的权益，日本建立了契约制度。政府部门制定契约蓝本，对双方权利义务、服务内容、收费标准、注意事项和纠纷解决等条款予以详细规定。契约具有法律效力，以约束不当行为，规范养老机构运营。

人性化服务。日本养老机构选址远离城市喧嚣，但要求交通便利且靠近医院。机构内电梯、桌椅、餐具、浴室、床铺等设施按照老年人特点设置，处处体现老年人感受和需求。入住机构的老人可以享受人性化服务，甚至一些细节都体现关怀。比如：餐饮搭配方案具体到人，护理记录详细标明每个老人注意事项；服务者要求使用敬语、微笑表情，会养殖花草；如果入住老人离世，机构人员会根据家属要求设计告别方案，亲自献花并参加遗体告别，尊重逝者，安抚家人。日本老年人立法体现伦理道德，追求人性和法治的结合，收费标准充分考虑不同老年人需求，服务质量评价指标将老人感受和满意度作为重要依据。

二、新加坡：以中央公积金加社会供给为主的养老服务产业

新加坡现有 60 周岁以上老人超过 100 万人，占总人口数的 20%，到 2020 年将达 26.5%，到 2030 年将达 35.6%，到 2050 年将达 39.6%。新加坡也是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按 65 岁以上人口占比从 7% 上升到 14% 所用时间来测算，法国用了 115 年、美国用了 69 年、中国用了 26 年，而新加坡仅仅用了 19 年。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新加坡建立了政府统筹的中央公积金制，形成了多方参与的养老产业供给，推进养老服务标准化，促进老龄事业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

（一）政府统筹的中央公积金制

新加坡鼓励国人自力更生和风险共担、机会均等，政府给予支持。新加坡政府推出中央公积金制度，明确所有受雇的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都强制加入的一项完全积累强

制储蓄计划，并实行会员制，涵盖不同收入水平的大多数国人，形成以中央公积金制度为核心的健全的养老保障制度和运作体系，较好解决了公民养老、医疗、住房等难题。

中央公积金局的任务是确保新加坡公民能享有终身入息、有能力支付医疗保健开销、购买组屋等，最终为公民提供晚年生活保障。新加坡明确无论是雇主还是雇员，都必须参加中央公积金计划，雇员按月薪的一定比例按时足额缴纳公积金，并计入会员个人账户。会员到了法定年龄或丧失劳动力时方可提取使用。该国的公积金缴费率为 37%，其中雇员为 20%，雇主为 17%，所缴款项存入雇员普通户头、特别户头、保健储蓄户头的三个公积金户头。同时，政府依据会员公积金缴存情况推出了组屋购屋计划、公积金终身入息计划、就业入息补助计划、乐龄补贴计划等，其中的乐龄补贴计划是指政府拨款为低收入老人提供现金补助，以帮助他们应付退休生活开支，政府还根据老人一生收入水平、组屋类型和家人提供资助或依靠等给予乐龄补贴。

医疗保障方面，通过保健储蓄计划、健保双全计划、保健基金计划等保障老人就医。如保健储蓄计划规定病人在政府办的基层社区医院住院只需缴纳 15% 的住院费，无能力缴纳者可向政府申请补助或申请全免，60 岁以上老人在公立医院看病只需缴纳一般的门诊费和基本药费。健保双全计划是一项大病医疗保险计划，规定会员以公积金保健储蓄账户的存款投保，确保会员有能力支付重病治疗和长期住院而保健储蓄不足的费用。由此，为老人提供了健全医疗保障网。

住房保障方面，中央公积金积极介入低收入阶层的住房保障，规定低收入会员可以动用公积金普通户头的存款作为购房首付。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在设计建造组屋时，专门设计了适合几代同堂的户型，并在购房价格上给予优惠。推出“乐龄公寓”计划，让老人在购买组屋上又多了一种选择，这些乐龄公寓一般建在成熟社区内，各种设施齐全完善，公共交通便利。此外，政府还针对独居老人和低收入涉老家庭，提供一房式和二房式的小型组屋。现今 82% 的新加坡人均居住在政府建造的组屋中，实现让全民“居者有其屋”目标。

（二）社会力量为主的产业供给

新加坡的养老服务供给发展至今形成了多元社会力量供给为主，政府积极动员参与的产业供给模式。2018 年，新加坡有 45 家非营利组织兴办的慈善疗养院、38 家市场运营的疗养院、387 家社会团体组织成立的乐龄俱乐部。慈善组织、市场机构、社会团体等多元社会力量在产业供给中居于主导地位：一项统计表明，新加坡各类养老服务或医疗护理的机构收养的 60 岁以上老人中，公立收养的仅占 12.1%，其他社会力量经营收养的占

87.9%。另据统计，新加坡全国公民义工参与率达 35%。

新加坡的居家养老主要由居家护理机构、居家姑息照护机构和综合诊所来提供。其中居家护理又分为家庭护理和家庭医疗；居家姑息照护又分为姑息护理、姑息医疗和社会心理辅导。但这些机构的数量并不是很多。

新加坡的社区养老包括日间护理、康复/日托中心。其以“家门口的项目”著称的居家照护服务为老年人提供一系列的服务，包括家务、送饭、陪伴去诊所和医院看病以及义工服务等。新加坡共有 89 个选区，社区以选区为基础，每个选区设有公民咨询委员会、市政理事会和居民委员会，共同承担社区养老任务。近年来，新加坡社区养老机构数量有快速上升的趋势。

新加坡的机构养老主要包括社区医院、慢性病医院、养老院、临终关怀机构四种。其中，社区医院的服务对象主要是那些从急性病医院出院，但需要住院康复或康复治疗的患者；慢性病医院为慢性病患者提供长期的医疗和护理服务；养老院为那些家中无人照护或无法提供照护的老年人提供其所需要的护理服务；临终关怀医院为身患绝症的晚期病人提供疼痛管理和治疗服务。

政府对老年人入住养老院有着严格的限制。入住养老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因病导致的身心残疾；半失能、使用轮椅或卧床不起，需要日常护理，以及如厕或走路方面的协助；已经尝试过其他选择，如雇佣家政人员，或使用日托、居家护理和其他服务；家庭或照护者无法提供居家照护；通过了长期补贴的家庭经济状况调查。新加坡养老院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私人运营的养老院；一类是志愿型福利机构运营的养老院。第二类又可再细分为四小类：一是接受卫生部补贴的志愿型福利机构。一般收住的是由政府综合护理署送来的符合救济标准的老人。二是不接受卫生部补贴的志愿型福利机构。它们多是通过募捐资助的方式自筹资金，尽管这里的老人不受卫生部补贴，机构也能够为那些无力支付护理费用的患者提供必要的资金和社会援助。三是享受卫生部补贴计划的私人养老院。自 2003 年以来，卫生部提高了对符合救济条件老人的补贴标准，并允许政府认可的私人养老院通过保留一定比例的床位来为这类人群提供服务，表现出卫生部对私人部门参与政府公共服务的认可。四是不享受卫生部补贴计划的私人养老院。这些私人养老院收住的多为自费的老人。

新加坡的社区医院也主要由志愿型福利机构运营。社区医院提供的服务类型包括医疗服务、护理服务和康复服务，有时也会提供诸如姑息服务、亚急性痴呆护理、透析服务和伤口护理等。功能上社区医院一般设置日间康复中心（所有社区医院都有，为需要额外治疗的患者提供门诊康复服务）、健身房、治疗区和住院病床。除此之外，一些社区

医院还设置模拟房间，其主要服务目的是帮助患者重返家庭和社区生活，使患者能够再次为社会群体和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而一些社区医院也提供一整套的居家护理服务，从家庭护理服务、家庭医疗服务到家庭治疗服务。值得一提的是，社区医院的医疗服务人员通常以团队协作的方式工作，团队成员包括医生、护士、康复治疗师、医务社会工作者、药剂师等。

临终关怀是一种专注于患者在将要逝世前的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时间内，减轻其疾病的症状、延缓疾病发展的医疗护理，通常由医生、护士、心理师、社工、义工等多方人员组成的团队提供特殊的缓和医疗服务，也包括给予临终者家属身心慰藉和支持。新加坡临终关怀机构的服务为完全免费模式，资金筹集主要依靠政府拨款和社会捐助。

临终关怀机构能享受免费服务一般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病得很重到了末期，二是剩下寿命很短。病人需要有医生写的推荐信，证明寿命只剩下一年或者更少，所患病为绝症。如果要留住的话，医生给他们预测的寿命要少于3个月。与“乐龄公寓”的思路相同，即使是末期失能患者，护理中心仍然秉持居家护理为主的方式，大多数临终关怀护理通过家访完成。为此卫生部门还为病人提供家庭装修、改装所需资金的贷款。并且护理中心的设备也可带到家中使用，只需支付押金即可。

（三）内容全面的养老服务标准

新加坡国家标准化委员会专门下设老龄产业标准化委员会（SISC），负责老龄产业的标准制定和质量管理。SISC旨在配合新加坡积极老龄化政策的落实，并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该委员会关注的领域包括家庭和社区的宜居性、老年人医疗服务和养老服务、老年人的营养、与老年人相关的科技研发和应用等。

为了保障养老服务的质量，由新加坡卫生部牵头，联合标准化委员会等其他机构陆续颁布实施了系列养老服务标准，如2014年1月颁布《疗养院服务标准》，2015年4月颁布《社会照护中心服务指南》和《居家养老服务指南》。以上标准的制订工作则由专门成立的标准化工作组承担。

《疗养院服务标准》旨在保障老年人能够获得高质量的养老服务，该标准由疗养院服务标准化工作组制定。该标准主要包括医疗护理、社会照护和组织管理三方面的内容：明确地阐述了疗养院要提供安全和高质量的医疗护理服务；明确地提出疗养院提供的服务要保障老年人的尊严，并且提高其心理和社会福利水平；提出了疗养院运营的标准，如财务管理、人员配备和管理、人员资质、人员培训和监管、顾客关系和持续改进机制等。新加坡卫生部联合整合性照护服务局（AIC）开展一系列活动来帮助疗养院实施该标

准。如 AIC 为疗养院提供基础评估，以明确其存在的薄弱环节以及施行《疗养院服务标准》的重点领域。AIC 还为疗养院工作人员和监管人员提供一系列的培训课程，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疗养院服务标准》的要求。AIC 制定《疗养院服务标准》指南，使疗养院工作人员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执行该标准。

《社会照护中心服务指南》主要包括四部分内容：照护服务的提供、安全、保障老年人的尊严、组织管理。社会照护中心在提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社会照护服务中心主要包括日间活动中心、日间康复中心、老年痴呆日间照料中心等，以满足老年群体的不同需求。为了提高服务质量，新加坡于 2012 年成立了专门的工作组来制定社会照护服务指南，并且致力于综合老年人的社会照护需求和医疗服务需求。

《居家养老服务指南》主要包括整体照护服务、服务质量、老年人被告知权和获取增能服务、服务的可持续性。居家养老是新加坡政府一直以来倡导的养老方式。此外，新加坡卫生部也致力于发展一系列的居家养老服务以满足居家养老者的需求。为了保证各类居家养老服务的质量，新加坡于 2013 年成立居家养老服务标准化工作组，并制定《居家养老服务指南》。

三、英国：以市场加监管为主的养老服务产业

二战后，英国社会逐步稳定，社会经济开始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医疗卫生体系不断完善。随着英国老年人口不断增加，20 世纪 50 年代的英国老年人口比重已经达到了 15.5%，是国际公认标准的 2 倍，21 世纪该比重上升至 20.8%。预计到 2050 年，英国人口高龄化和老龄化程度将进一步加深，将有近 1/3 的英国人口是老年人，英国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老龄化局面。面对庞大的养老压力，并结合本国的实际，英国政府推行社区服务的养老模式，鼓励企业进入养老市场，通过设定一定的服务标准，建立各种养老服务设施并安排专业人员对老人进行照料，由政府和市场共同进行养老市场的开发，养老产业开始逐渐发展起来。

（一）市场为主的产业供给

目前英国养老服务呈现出以市场化供给为主的产业模式，供给主体包括民营机构、慈善组织和地方政府，但目前政府直接提供服务的比例已经很少。民营机构是提供养老服务的最主要主体。他们会根据市场需要进行严格的市场调查，包括当地的人口数、老年人口数、目标人群的数量和购买力，已有的养老服务市场情况，包括服务机构的服务种类、规模，再根据市场调查分析自己的目标人群和服务定位，综合判断后再进行投资

运营。慈善组织也为英国老年人提供了大量养老服务。目前，英国三个主要的全国性老年慈善社会团体，分别是关心老人协会、全国照顾老人协会和帮助老人协会。接受政府办的社会服务要经过家庭财产调查，而且接受人员的数目因受到控制而比较少。且英国政府投资建设的养老院不享受税收、贷款或者其他方面的优惠，与民营养老机构一样进行市场运营。政府的各类补贴是直接支付给老人的，不存在对养老院的建设补贴或者运营补贴等资金支持。

英国养老机构类型多样，按照供给主体的差异，可以大致分为政府直接供给、民营市场供给和官民合作供给三种大的类型。

养老机构的政府直接供给依托国民卫生与健康服务（NHS）合并成人照护系统（ASC）转变而来的国民健康和照护服务（HSC），主要依托护理院专业医疗服务提供长期服务、公助护理服务和中长期照护。

养老机构的民营市场供给类型更加多样，可以根据老人的身体状况、经济状况以及需求的不同为之提供不同的服务内容。是老年公寓。这是一种为有生活自理能力、依赖性不大、有人照顾的老人提供的服务设施。一是老年公寓有医疗、保卫人员，还配有紧急呼叫装置。相对独立，有隐私，但也有服务，还有公共的休息区域。这种模式在英国属于适合多数老年人的养老院。二是辅助型养老机构。这是一种为有一定服务需求的老年人设置的，通常提供帮助洗澡、穿衣、吃饭、料理家务的服务。许多辅助生活设施里有 24 小时服务的专业护士和其他卫生护理人员。辅助型养老机构可以为老人提供日常生活照料、提醒服药、助行、慢性病护理等照料与护理服务。三是养老院/护理院。这类服务一般针对的是鳏寡孤独、生活自理能力较差、需要长期照护、缺乏家庭支持的老人。这类机构一般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不带医疗服务的养老院，主要为老人提供助餐、助浴、助行、助厕等服务；还有一种是带医疗服务的护理院，除了基本的生活照料服务外，还有专业的医疗、康复和护理服务等。此外，英国还有很多专门针对某种特殊需求老年人的养老院或者护理院，如临终关怀机构、专门看护痴呆病人的养老院等。

官民合作性质的养老服务供给则通过纳入 NHS 体系的民营机构 NHS 信托。自英国市场化、去机构化改革以来，越来越多的“独立”社会照护服务机构出现。这种独立性其实指的是非政府属性的社会养老服务机构。它们可能是与政府合作的半官半民机构，可能是独立运营的社会慈善机构，也可能是纯粹的商业养老服务机构。其中作为公私合作的案例，NHS 信托便是民办公助的典型。目前 NHS 信托将内容分为医院信托、精神健康信托、急救服务信托和社区健康信托四块。其设立初衷就是在 NHS 体系的基础上提供服务的补充，进一步打开市场，将服务专业化，并扩大服务资源覆盖面。并且在组织结

构上，每一个 NHS 信托的董事会或委员会都是由行政职务与无行政职务成员共同组成，并由无行政职务成员担当董事长。NHS 信托半官半民的特点还在于，它以政府官方合作伙伴的名义受到国家审计的信任。

（二）类型多样的资金来源

针对不同的养老服务类型，英国政府和老年人个人会采取不同的筹资方式来获得购买资金。

对于政府直接供给的养老服务的资金筹措，主要包括政府直接补贴、商业融资产品以及社会慈善捐赠的多元资金供给链。英国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项目包括现金津贴和实物津贴两类。后者覆盖范围更广，包括教育、医疗保健，对体弱者、残疾人或精神病患者及对儿童的保护等等。现金津贴按照资金来源可以进一步被划分为两类社会保险和非缴费性的现金给付。其中，非缴费性现金给付又分为普惠性福利项目与社会救助，按照我国对社会保障体系的划分与理解，可以将它理解为社会福利。

对于一般的养老服务购买，其资金一部分来自于老年人个人，一部分来自于政府。老年人的个人出资与其财产状况挂钩。如果老年人的家庭财产低于 14250 英镑/年，那么老年人的服务费用就完全由地方政府支付；如果老年人的家庭财产在 14250~23250 英镑/年之间，那么每当政府支付 250 英镑的费用，老人就需要额外支付 1 英镑/周的费用；如果老年人的家庭财产在 23250 英镑/年以上，则老年人的服务费用完全由自己支付。老年人的社会服务费用支出已经成为英国地方政府的重要支出项目，未来随着英国人口老龄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政府的投入和支出将会不断且更加快速的增长。这已经成为英国养老服务面临的重要资金难题。

“以房养老”反向抵押贷款成为老年人养老资金的筹集方式之一。英国以房养老政策安排在推广“个人养老责任”的社会氛围下孕育成熟，个人养老责任指的是老人应当对自身退休生活的资金保障负有责任。英国以房养老的金融产品主要以“共享升值贷款”和“卷藏贷款”为住房反向抵押的经营方法。其中共享升值贷款的特色是考虑房产的利率浮动给出不同的还款方案，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当借款的利率低于市场利率时，金融机构将与贷款老人共同分享未来房屋升值的利益。二是贷款人无需支付任何关于利息的费用，但未来还款的计算方式则是本金加上升值利息与借款比例的乘积，最高可达 25%。而卷藏贷款则采用利息自动累积到贷款总额的方式，无需每月偿还。等老人身故之后，其房产的本金及利息通过变卖的方式清偿。后者在操作管理上相较于前者更为简便，从而成为大多数英国老人选择以房养老的首选金融方案。

（三）完善全面的监管评估

英国的老年社会服务主要由卫生部和地方社会服务部门管理。1974 年之前，卫生部负责主要的长期照料服务。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英国去机构化的浪潮，以及“社区照护”理念的出现，特别是 1974 年地方社会服务部门的成立，老年人的社会服务责任逐渐转移到地方服务部门直接管辖。从职能划分上看，卫生部主要负责老人的卫生服务体系，社会服务的政策和标准制定、监督与管理等职能。地方政府则主要承担对老人的服务评估、服务信息发布、养老资源配置、服务购买等具体工作。英格兰、苏格兰都有专门的机构负责检查和评估养老服务机构的组织，如英格兰的照顾质量委员会、苏格兰的社会服务监察会，都是负责境内整个社会服务评估、监督工作的具体部门。

英国老年服务实行“契约制”，即把原来由政府承担的一些服务移交给社会工作机构。政府委托机构提供社会所需要的服务，然后政府花钱购买，提供给服务的需求者。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英国政府采取项目管理模式，从申报、执行、监督到年度报告，从工作人员到志愿者或义工都有一套完整规范的工作管理和评估体系。各机构如果要承接项目，拿到经费，必须首先与多家机构一同经过项目评估，政府认为该机构的计划最优，才会把经费交给该机构。此外，在执行过程中，机构内的人员培训、设施配置、服务标准、服务价格等，都受到政府的定期检查，提供资金的组织也会不定期的进行抽查，同时还会安排义工进行监督等。政府与机构建立契约关系，合同的违反者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德国：以保险加公益为主的养老服务产业

德国是一个典型的老龄化国家。目前，德国人口约 8300 万人，其中 60 岁以上老年人约占总人口 23%，而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约占总人口 19%。预计到 2050 年，德国人口将下降到约 7000 万人，超过 50 岁的人口将占 50% 以上，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将占德国总人口的 35.5%。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伴随着德国工业化的进程，德国也步入老年化社会，养老护理问题也日益受到社会与政府的关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德国已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养老护理制度与体系，并具有如下主要特点。

（一）保险性质的养老护理制度

养老护理制度是以保险的形式参加养老护理险，积累保险基金，在以后参保人进入老龄队伍身体不便时，相关的养老服务机构对参保人进行养老服务，护理费用就由参保人的保险资金来保证。1995 年颁布的《护理保险法》为主要法律依据，建立了这项强制

性护理保险制度。

德国的养老护理制度是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内容之一。根据“医疗保险指导护理保险”的参保要求，参加法定医疗保险的投保人也应当参加护理保险。民众必须以强制性保险的形式缴纳护理保险资金，数额为每月净工资的 1.7%。雇员的费用由企业和个人各承担一半，已退休且尚未接受养老护理的个人保险费则由本人和保险机构共同承担，失业人员则由政府全额负担。因此，通过不同形式将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全部纳入到养老护理保险中，使养老护理保险的范围不断扩大。养老护理制度的推行为德国养老保障体系注入了巨大活力，以北威州为例：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居民的护理需求日益增长，预计在今后十多年内会达到 100 万人，并且有 2/3 需要护理的老人在自家接受照顾，因此兴起了不少专业的护理服务机构，以派出专业的护理人员的形式提供上门服务。从年龄上看，接受护理的老人一般在 80 岁左右，所需的养老护理费用巨大，而养老护理制度的实施正好解决了养老所需的资金问题，使得大部分的退休老人都能得到专业照顾，安享晚年。

（二）公益为主的产业供给模式

德国的养老服务产业供给呈现公益为主，私营为辅的产业供给模式。公益组织是护理业的主要供给者，2011 年德国 12354 家住院护理机构中，有 6721 家是由公益组织经营的，比例高达 54.4%；在 12349 家上门护理机构中，由公益组织经营的有 4406 家，占比约 1/3。从护理对象的人数来看，公益组织的市场份额超过 50%，德国受护者中超过 50% 接受的是公益组织提供的服务。私营护理机构也在不断发展壮大，目前占护理机构总数超过 1/4，且以中小型企业为主。德国的养老服务产业体系从供给类型上包括三种养老模式：一是居家养老模式，二是老年社区模式，三是机构养老模式。

一是居家养老护理模式。这种模式下，原有的居住场所仍是老年人的主要活动场所，对于那些生活能够自理的老年人，不需要提供特殊护理，社区只对他们进行日常起居类的简单服务。对于那些能够部分自理的老年人，以不离开原有生活环境为原则，依托居住场所周边的养老机构上门提供的护理服务，针对老年人无法自理的活动和事项进行服务。同时，为了抑制老年人社会化功能降低等现象，机构还提供日间护理中心，不仅能够为老年人提供日常护理，还能够增强社区内部老年人的资源链接。还有一部分老人可以享受托老所提供的短期照护服务，如家庭成员因故无法完成日常照顾服务的，或在康复阶段无法接受来自家庭照顾的，都可进入托老所享受短期托老服务，其时间以两个月为上限。

二是老年社区模式。受城市管理中网格化思维的影响，作为一种新型的居家养老模式，老年社区式养老降低了政府和养老机构对老年人提供服务的难度。通过集中居住的方式，将养老的空间格局变得紧凑，提高了服务效率。老年社区式养老以照护式公寓为主要服务场所，具体的操作方法是，老年人从原有老旧社区搬离，入住政府统一修建的居家服务监护式公寓，老年人可以通过支付一定数额的资金，以购买或租赁的方式取得居住权，但大部分个体选择租赁而不是购买。由于入住主体的特殊性，政府在设计公寓时就充分考虑了老年人因生理因素变化可能导致的行动不便等问题，因此公寓整体进行了适老化设计，充分配备无障碍设施，同时考虑到部分老年人面临精神健康的困扰，公寓内部还在部分场所添加了其他诸如远程电子求助器或闭路电视监控等硬件设施。老年居住社区模式与居家养老护理模式各有异同，相同的在于二者都以居家养老为服务原则，相异之处在于对“家”的定义为何，即前者强调搬离原址，聚群而居，以统一服务为指导思想；后者强调保留原址，机构入驻社区，减少老人对环境改变所产生的不适，以“落叶归根”作为主要服务理念。相比老旧社区，新型公寓无论在硬件配套设施上，还是在服务获得的方便程度、专业程度等软件设施上都更适合老人在此安享晚年，而西方国家鲜有类似“落叶归根”的中国传统思想，因此这一养老模式得到较多德国老年人的认可。

三是机构养老模式。大多数情况下，居家养老护理和老人社区护理模式能够囊括大部分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多数机构也能够在这一模式下提供完善和高效的居家养老护理和养老社区服务。因此，只有当上述两种模式都无法为老人提供所需服务的情况下，德国老年人才选择最后时刻接受养老机构的服务。目前德国共有超过一万家类似的养老机构，按照举办方式的不同，养老机构可以分为三种，即慈善组织举办的养老机构、个人举办的养老机构和公立养老院。其中，慈善组织所办的养老机构数量占比超过 50%，而公立养老院占比不足 5%。

（三）严格规范的管理教育培训

强化养老护理服务规范管理，提升服务专业化水平。德国对于进入社会保险系统的养老服务护理机构管理比较严格。社会保险系统每年对各类养老护理服务机构进行评估，只有通过审核的养老护理服务机构才能得到资质认定。对于护理人员的任职资质和服务水平，相关法规也都有统一的要求。《护理保险法》规定，医院的护理院长或护理部主任，只有接受过护理高等教育和管理专业训练的人才才有资格担任。护理人员除护理院长（主任）外，还有护士长、高级护士、注册护士、助理护士 4 个级别。注册护士以上资格

的护理人员才能直接护理服务对象。借鉴德国经验，我国要加快建立完善养老护理服务评估监督机制。对服务质量好、诚实守信的服务机构给予支持和激励，对服务质量差、经营中存在失信问题的服务机构进行惩戒。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社会媒体、老年人及其家属等多元主体的监督作用，搭建社会监督平台，加强对养老服务机构的第三方评估，并向社会公开督查评估结果，以促进养老服务机构规范管理。与此同时，我国要加快培养养老护理服务专业人员。将社会工作、护理、康复、营养等养老服务专业人才培养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加大对养老护理专业和管理人才的培养力度，尽快提升养老服务专业化水平。

养老护理教育培训体系完备。德国养老护理服务从业人员要接受统一的教育培训，达到一定资质才能上岗。完善的教育培训体系为养老护理服务提供了稳定的人员保障。德国的养老护理教育培训体系包括三个部分：中等职业专科教育、大学本科教育、在职进修培训。德国的护理教育以中专为主。《护士执业法》对护士生的学制、学时有明确规定：中专护理教育的学制为 3 年，教学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双元制培养模式，即在校的理论学习与在服务机构的实习交替进行。总课时不少于 4600 学时，其中理论学习不少于 2100 学时，实习不少于 2500 学时。三年之后，学生通过老年护理员考试才可以上岗工作。大学主要为中专培养师资力量。德国的大学护理教育起步较晚，1992 年开设护理科学、护理教育学、护理管理学的学士专业，但发展比较快，目前除了本科教育之外，还有提供护理硕士及博士学位教育的机构。养老护理进修培训主要是对现有的护士进行培训，将普通护士培养为从事养老护理的专科护士，其资格由地方政府予以确认。

新时代我国养老服务体系的构建，要充分吸收借鉴发达国家养老服务发展中的经验做法，从法治建设、政府职责、供给主体、医养结合、服务质量、标准监管及人才培养等体系建设方面谋划，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化养老服务产业发展之路。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要加快养老服务产业法治建设。二是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产业供给，促进我国养老产业的多元化、市场化、专业化和规范化。三是合理定位政府在养老服务产业中的职能，更多转向政策制定、标准制定、监督评估和服务购买。四是发展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产业，加大社区居家养老投入，特别是城乡社区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力度，进一步拓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内容，探索各种有效的服务形式，完善体系。五是建立完善医养结合养老模式。主要是制定养老机构内设护理床位的医保支付政策和扩大高龄老人医疗护理计划覆盖面的政策；建立统一的老年照护需求评估标准，合理匹配相应的生活照料服务和护理服务，推进包含医疗、照护、预防、居住、生活支援服务在内的综合服务体系的构建。六是培育壮大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学历教育和职业教育并

重，提升养老护理人员社会地位，改善养老护理人员的工作待遇，制定相关政策，鼓励机构开设养老护理相关专业并给予一定的资金扶持。

参考文献：

1. 陈天红：《新加坡养老服务标准化及其启示》，《中国质量万里行》2016年第7期。
2. 金璐：《中英养老服务供给方式比较研究》，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学位论文，2015年。
3. 陆继锋、陈偲：《日本养老机构建设与运营经验》，《理论导报》2018年第9期。
4. 潘慧、余宇新：《发达国家发展养老养生产业经验及其启示》，《改革与战略》2019年第2期。
5. 王杰秀、徐富海、安超等：《发达国家养老服务发展状况及借鉴》，《社会政策研究》2018年第2期。
6. 王齐彦、李慷：《老年服务业态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7. 吴江、李力扬：《德国养老事业对我国养老体系建设的启示》，《宁夏党校学报》2017年第1期。
8. 吴孝芹：《养老金融产品创新国际比较——以美国、德国和新加坡为例》，《现代管理科学》2019年第3期。
9. 吴玉韶、王莉莉：《中国养老机构发展研究报告》，华龄出版社2015年版。
10. 肖守渊：《新加坡养老服务市场化改革的启示》，《中国社会工作》2018年第35期。
11. 杨俊：《个人账户养老保险制度管理的“账户化”研究——以新加坡、智利和瑞典为借鉴》，《社会保障评论》2018年第3期。
12. 余星、姚国章：《国外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比较研究——以日本、德国、丹麦为例》，《经营与管理》2017年第6期。
13. 赵立新：《英国养老保障制度》，《中国人大》2018年第21期。
14. 中国开发性金融促进会：《国外养老产业投融资模式案例汇编》，中国金融出版社2017年版。
15. 朱凤梅：《新加坡养老保障体系：制度安排、政府角色及启示》，《社会政策研究》2018年第3期。

责任编辑：沈家文

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的 路径选择与政策建议

——以津巴布韦为例

郭建民 孙安琪

摘要：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向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我国对外贸易与投资规模不断扩大，跨境人民币结算需求快速增长。一方面，“一带一路”建设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重要路径，为拓展人民币职能搭建了良好平台；另一方面，人民币国际化也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本文以“一带一路”非洲重要支点国家——津巴布韦为例，分析了扩大人民币在津广泛使用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结合中津共建“一带一路”实际，研究提出扩大人民币在津使用的现实路径：第一，短期增量，通过有担保的人民币贷款增加货币流动性；第二，中期增量，逐步扩大贸易与投资增加人民币供给，以对津形成相对稳定的人民币流动性供给。最后研究提出扩大人民币在津使用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人民币跨境使用 一带一路 中津合作 货币流动性

作者简介：郭建民，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处长、副研究员、博士；

孙安琪，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研究分析员。

引 言

津巴布韦（下文简称“津”）位于非洲南部内陆中心地带，经济发展水平在南部非洲地区曾一度仅次于南非。2008 年因遭遇恶性通货膨胀，最高年通胀率达 200000%，本币津元出现最大面值 100 万亿元。2009 年津政府开始推行“一揽子货币”体系，美元、南非兰特、澳元、人民币、日元、英镑和欧元等 9 种货币在津合法流通。2015 年，津央行

宣布启动津元“去货币化”行动，津元正式退出该国货币市场，标志着津元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流通的价值。同年，津政府开始把人民币作为主要流通货币。2016 年政府发行债券货币，仅在津国内流通，面额与美元等值，截至 2019 年 2 月，已贬值超过 70%。2019 年 6 月，津政府宣布废除该国十年的多货币体系，不再允许美元等外币在境内流通，完全使用债券货币作为交易手段，但是津元迟迟未发行，国内货币流动性出现短缺，外币在黑市继续流通。目前津的金融体系已经处于失效状态，其主要原因：一是主权货币缺失；二是资金匮乏特别是美元资金匮乏导致了银行间市场无流动性可言；三是本土化政策以及高税负阻止了外国投资者，导致本国资金缺乏。

近年来，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引领下，中津经贸合作不断深化，人民币以其便利贸易与投资、优化外汇储备结构、防范汇率风险、稳定金融体系等多方面优势，日益受到津政府及非洲各国重视。中津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大，人民币业务在津增长空间大、发展前景广。一方面，津具有开展人民币业务的现实基础。另一方面，随着中津合作的深化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升，津对人民币的接受度将进一步提高，企业从节省汇兑成本、降低汇率风险和商业风险的角度出发，主观上更乐于接受、使用和持有人民币。

一、扩大人民币在津使用的必要性

（一）为中津贸易与投资合作提供金融支撑

津资源优势突出，中津两国经济互补性较强，在农业、矿业、制造业、旅游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作潜力巨大。2015 年习近平主席对津成功进行国事访问，为全面深化中津经贸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近年来，随着共建“一带一路”深入推进，中钢 Zimasco 项目、华津水泥厂、津纳拖拉机组装厂等一批项目启动实施，带动了贸易和投资的快速增长。2018 年，中津双边贸易额 13.35 亿美元，我国企业在津新签工程承包合同额 11.72 亿美元，截至 2017 年底我国企业对津直接投资存量 18.78 亿美元。在此背景下，扩大人民币在津使用范围，可以帮助企业有效规避汇率风险，进一步强化融资支撑，有利于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

（二）帮助津恢复经济正常化

2002 年，欧美西方国家对津实施制裁，给其经济造成沉重打击，之后连续多年经济呈现负增长（见图 1）。2008 年津政府推出“向东看”政策，提倡全面加强与中国合作，希望我国为津转型发展蓝图转化为切实可行的发展计划和重大项目提供支持。为此，

2015 年现任总统姆南加古瓦访华期间，提出希望引入人民币为其主要流通货币，缓解货币流动性紧缺，为两国企业开展贸易与投资合作提供融资支持，促进津国内经济增长，尽快恢复经济正常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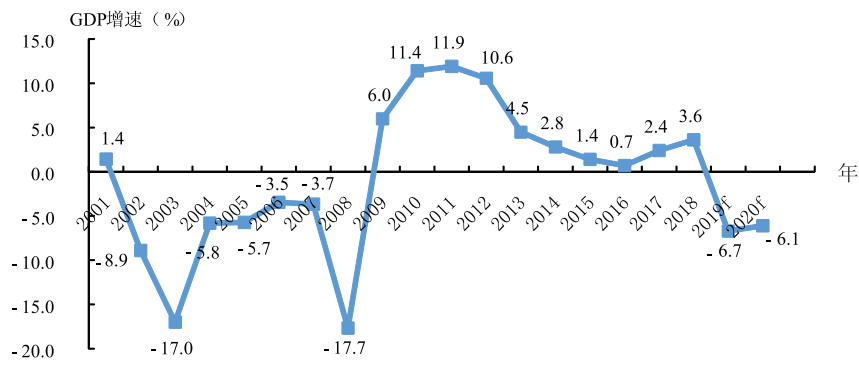


图 1 2001—2020 年津巴布韦经济增长率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经济学人智库。

（三）缓解津货币流动性紧缺

在 2015 年津元退出流通，津没有主权货币之后，有 9 种外国法定货币流通，但经济结构无法支撑市场通过自发调节来避免严重的货币流动性短缺。表 1 可见，在 2011—2017 年，津多年维持进口大于出口的局面，国内货币流动性总供给增量基本维持负增长趋势。当前，津经济长期处于增长乏力的境地，国家信用风险极高，难以获得持续稳定的国际资本流入和信贷支持，依靠国际贸易等经常性项目的货币流入更难以支撑国内经济增长对新增货币的需求，进而严重阻碍经济发展。而在 2019 年年初，津宣布废除多货币体系后，津元迟迟未发行，部分美元、人民币等外国货币继续在市场流通，货币市场流动性严重不足。

表 1 2011—2017 年津巴布韦货币市场流动性来源 单位：亿美元

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项目	出口总额	35.12	38.82	35.07	30.64	27.04	28.32	26.11
	主要产品							
	烟叶	7.17	8.27	8.54	8.08	8.65	9.39	9.04
	黄金	3.46	3.58	3.27	3.54	2.18	5.06	8.3
进口总额		44.0	44.00	43.0	42.2	40	37.0	40.83

数据来源：Africa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8。

因此，津需要货币发行国政府提供足够的支持，帮助其度过目前的困境。若扩大人民币在津使用，并将一定规模的人民币注入其市场，为其获得可观的流动性增量，将直接有助于调节津国内货币供给，从而缓解其货币流动性紧缺的现状。

（四）重建货币金融体系

从中长期看，津必将重发本国货币，人民币在津使用量的增加有助于提高津未来货币与人民币挂钩的可能性，这为津重建货币金融体系提供了有利条件。当前，通过扩大人民币使用范围，有效摆脱美元货币政策周期的影响、缓解流动性短缺矛盾，进而为下一步构建相对独立自主的货币金融体系奠定基础。津需要从我国获得支持，以寻求可持续的人民币流入途径，为金融市场注入活力，以激活本国经济。当津经济形势趋于稳定，金融市场调节机制可以发挥积极作用时，逐步恢复主权货币，实现重建本国货币金融体系的目标。

二、扩大人民币在津使用的机遇和挑战

（一）面临的机遇

第一，有助于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当前，津受到欧美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无法获得足够的美元等主要国际化货币，导致货币流动性严重紧缺。此时，我国对其施以援手，多措并举扩大人民币在津使用，可以有效帮助其缓解经济困难，进而提升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地位。而当津引入人民币时，用其商品换取人民币是津的一条必经之路，而这需要依靠以人民币作为结算方式的国际贸易。在实施过程中，人民币作为跨境结算方式的功能将得到提升。此外，当津正式以大量人民币作为其法定货币在其本土进行流通时，津的本土贸易便离不开人民币。所以当津与其他国家的商业机构或政府进行跨境贸易时，原本津币或者其他国家货币充当结算方式的角色将被人民币所部分取代，人民币作为跨境结算货币的角色将会再次被强调。而这整个过程，便是人民币提升国际地位的过程，是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一项举措。

第二，有助于深化中津全面战略合作关系。当前，在欧美经济制裁尚未取消的背景下，津出现了货币流动性短缺，与津开展贸易及投资的中资企业面临国际支付的诸多不便和风险。因此，扩大人民币在津使用，助力其走出困境，必然提高我国的国际声望，对深化与非洲国家的经济合作起到重大示范作用，从而为在非洲地区形成人民币区提供空间。同时，通过扩大人民币在津使用，切实参与到其经济运行中，可以与津及更多非洲国家建立良好的政治经济关系，也有助于未来在非洲乃至国际上更加顺利地进行各项

政治经济活动，争取更多话语权。

第三，有利于探索形成人民币国际化的有效路径。扩大人民币在津使用，将突破现有离岸模式，是对人民币国际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在实践这一新路径的过程中，探索构建完善的人民币回流机制，取得人民币回流管理经验，不仅有利于香港等人民币离岸市场的长远发展，还将在海外形成独立于境内经济体的人民币体外循环。另外，扩大人民币在津使用，帮助缓解了津的经济问题，使得津乃至全世界民众对人民币的信心提升，对持有人民币和通过人民币进行实体商品交易或者资本交易的需求也将得到提升。这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难得的试验，为实现人民币国际化长远战略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主要风险与挑战

第一，政治风险。2017 年 11 月执政 37 年的穆加贝总统下台，新总统姆南加古瓦提出快速恢复发展经济的 2030 年达到中等收入社会的发展目标，大力改革政府机构，出台开放招商引资政策，加强国际社会活动，加大反腐力度等一系列新政，使社会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的局面。但反对党 MDC 的支持率也一直在增加，国家政治安全还有待观望。2019 年上半年，津国内出现燃油短缺、外汇收入赤字叠加影响严重，国内社会经济局势日趋紧张。同时，津政府政策多变，各部门制定、执行和解释法律非常随意，加之政府机构庞大、人员臃肿，支出巨大等问题，对扩大人民币在津使用及我国企业赴津投资等面临较大的风险。

第二，经济风险。目前津国家信用较低，2018 年津外债总额约为 91.3 亿美元，偿债率估计值为 12.7%，负债率估计值为 39.8%，债务率估计值为 151.7%，负债率和债务率均超出国际警戒线。津国际融资渠道狭窄，对外偿付能力不强，整体债务状况不容乐观。一旦津政府宣告破产，以政府收入为担保的贷款追偿不确定性将大大增加。此外，津正在从经济衰退中走出，虽经济实现了一定增长，但近几年明显回落。一旦经济增速持续低于预期，中津双边进出口贸易规模将受到较大影响，我国在津直接投资也将面临一定的损失。

第三，对我国货币政策市场的冲击。扩大人民币在津流通使用，伴随着货币的流动，津国内经济问题也会我国的货币市场产生影响。反之，我国的货币政策将会对津也产生影响。一旦人民币被允许大量在境外使用，当我国为了实现某一经济目标而实施宏观货币政策调控时，外溢的人民币将稀释国家的宏观货币政策效果。也就是说，当我国的人民币大范围地出现在津的货币市场时，我国试图用货币政策调控的市场便不仅仅局限

在国内市场中，也会伴随着人民币流动，传递到津的市场之中，货币政策的效果便不会如预期一样强烈、有效，政策的效果将会更加复杂、不可预测。

三、扩大人民币在津使用的路径选择

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稳步扩大人民币在津使用，在风险相对可控的前提下解决津流动性短缺问题，积极创造条件，既满足人民币国际化需要，又为津最终发行自主货币奠定基础。扩大人民币在津使用的主要路径：一是短期增量，通过有担保的人民币贷款增加货币流动性；二是中期增量，扩大贸易与投资增加人民币供给，以对津形成相对稳定的人民币流动性供给。

（一）通过人民币贷款增加货币流动性

第一，以烟草税收为还款来源的人民币贷款。2017 年津烟草销售收入为 8.27 亿美元，烟草综合税率为 6%，津政府通过征税获得的收入约为 4962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 3.35 亿元（2017 年美元兑人民币平均汇率为 6.75），约占当年津政府税收收入（37.14 亿美元）的 9.02%。目前，津国内出售烟草产品主要为未加工烟叶，价格相对较低，若以卷烟成品出售可获得 10 倍增值。因此，津政府在烟草税收方面有很大提升空间。

若仅以每年烟草税收作为贷款的还款来源，则第 n 年时津的累计烟草税收入为：

$$TotalRefund_n = \sum_{i=1}^n Tax_0 \times (1 + r)^i \tag{1}$$

其中， Tax_0 表示第 0 年的烟草税收入， r 表示烟草税收增长率。

目前，津政府已计划在国内开展卷烟成品加工，若以烟草税收入维持 10% 的增长率，则可反映烟草税收为还款来源的有效性，可作为贷款额度依据。按照我国商业银行的贷款规则，对应的人民币贷款额应为累计烟草税收入的 60%。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我国可为津提供的 10 年期、15 年期和 20 年期人民币贷款分别为 32.21 亿元、64.43 亿元和 116.10 亿元（见表 2）。

表 2 以烟草税为还款来源的人民币贷款额 单位：亿元人民币

税收增长率 10%	10 年期	15 年期	20 年期
累计烟草税收入	53.69	107.39	193.51
对应人民币贷款额	32.21	64.43	116.10

数据来源：作者以 2017 年津烟草销售收入为基期，由（1）式计算而得。

第二，以铬矿税收收入作为还款来源的人民币贷款。根据美国第三方市场研究机构 Technavio 发布的《2019—2023 全球铬铁市场分析——规模、增长、趋势和预测》报告，津拥有全球第二大铬储量，约占全球总量的 12%。津已探明铬矿储量 9.3 亿吨，但因经济衰退和技术匮乏导致国内铬矿产能普遍较低，2018 年津铬矿产量为 75.9 万吨。津铬矿石质量优、含铬量高，是冶炼高碳铬铁合金的最佳原料。若津政府对铬矿开采提供足够支持，在未来 10 年内以年均 15% 的增长率，可实现约 4 倍左右的增长规模。在平滑的铬矿产量增长率假设下，以 2018 年国际市场铬矿约 100 美元/吨计价，铬矿综合税率按 5% 计算，到 2030 年预测的累计铬矿综合税收入约为 1.28 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 8.47 亿元（2018 年美元兑人民币平均汇率为 6.62）。按照我国商业银行的贷款规则，对应的人民币贷款额约为累计铬矿税收入的 60%。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我国可为津提供的 10 年期人民币贷款约为 5 亿元人民币（见表 3）。

表 3 2019—2030 年津巴布韦铬矿生产规模及税收收入情况预测

年份	铬矿产量增长率 (%)	铬矿产量 (万吨)	铬矿收入 (万美元)	税收收入 (万美元)
2019f	20	91.08	9108.00	455.40
2020f	20	109.30	10929.60	546.48
2021f	20	131.16	13115.52	655.78
2022f	20	157.39	15738.62	786.93
2023f	15	180.99	18099.42	904.97
2024f	10	199.09	19909.36	995.47
2025f	10	219.00	21900.30	1095.01
2026f	10	240.90	24090.32	1204.52
2027f	10	264.99	26499.36	1324.97
2028f	10	291.49	29149.29	1457.46
2029f	10	320.64	32064.22	1603.21
2030f	10	352.71	35270.64	1763.53
合计		2558.75	255874.66	12793.73

数据来源：作者以 2018 年津铬矿产量为基期，由（1）式计算而得。
注：f 指各年预测值，以 2018 年国际市场铬矿约 100 美元/吨计价。

第三，以铬矿对华出口收入作为还款来源的人民币贷款。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开展国际产能合作，自 2015 年津政府解禁铬矿出口，逐年增加对我国的铬矿出口，2017 年我国从津进口铬矿为 44.65 万吨，同比增长了一倍之多。我国的铬矿资源匮乏，市场需求长期持续增长，且对外依存度达 90% 以上。在共建“一带一路”引领下，中津铬矿贸易与投资将呈现快速增长的发展趋势。在未来 10 年内，若津铬矿产量的 70% 可供我国进口，预计到 2030 年我国累计从津进口铬矿总量约 1791.1 万吨，按照 2018 年国际市场铬矿约 100 美元/吨计价，津累计铬矿对华出口收入约为 17.9 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 118.45 亿元。按照我国商业银行贷款规则，对应的人民币贷款额应为铬矿出口收入的 60%，我国可为津提供的 10 年期人民币贷款约为 71 亿元人民币。

表 4 2019—2030 年津巴布韦铬矿对华出口收入预测

年份	铬矿产量（万吨）	对华出口规模（万吨）	对华出口收入（万美元）
2019f	91.08	63.76	6375.60
2020f	109.30	76.51	7650.72
2021f	131.16	91.81	9180.86
2022f	157.39	110.17	11017.04
2023f	180.99	126.70	12669.59
2024f	199.09	139.37	13936.55
2025f	219.00	153.30	15330.21
2026f	240.90	168.63	16863.23
2027f	264.99	185.50	18549.55
2028f	291.49	204.05	20404.51
2029f	320.64	224.45	22444.96
2030f	352.71	246.89	24689.45
合计	2558.75	1791.12	179112.26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表 3 预测情况计算而得。
注：f 指各年预测值。

（二）通过扩大贸易投资增加人民币供给

第一，通过对津贸易逆差增加人民币供给。2018 年中津贸易逆差约 4.45 亿美元，约

合 29.46 亿人民币（见表 5）。中津贸易逆差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将存在，只是逆差结构发生变化，商品贸易下降，旅游逆差上升。在未来 5 年中津贸易逆差若以 10% 的速度递减，两国贸易逆差总额约为 16.43 亿美元，折合人民币 108.81 亿元（见表 6）。

表 5 2011—2018 中津双边贸易情况
 单位：亿美元

	贸易总额		中国出口		中国进口		贸易逆差	增长率 (%)
	金额	同比 (%)	金额	同比 (%)	金额	同比 (%)		
2011	8.74	55.70	4.10	29.90	4.64	88.90	0.54	
2012	10.20	16.10	4.30	4.90	5.90	26.00	1.60	196.30
2013	11.00	8.50	4.10	-3.90	6.90	17.70	2.80	75.00
2014	12.40	12.70	4.00	-2.40	8.40	21.70	4.40	57.14
2015	13.08	5.51	5.46	36.60	7.62	-9.29	2.16	-51.01
2016	11.15	-14.77	3.88	-28.99	7.27	-4.59	3.39	57.26
2017	13.17	18.10	4.44	14.50	8.73	20.10	4.29	26.59
2018	13.35	1.42	4.45	0.41	8.90	1.93	4.45	3.69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商务部网站数据整理而得。

表 6 2019—2023 年中津贸易逆差
 单位：亿美元

	2019f	2020f	2021f	2022f	2023f	总计
预期贸易逆差	4.01	3.61	3.25	2.93	2.64	16.44

注：f 指各年预测值，以 2018 年中津贸易逆差为基期。

第二，通过扩大投资增加人民币供给。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我国不断推动中津经贸合作向生产加工和投资经营优化发展，鼓励更多企业到津投资，参与津交通、电力、信息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优先打造现代农业产业链、矿业产业链和制造业基地。目前，我国是津第一大外资来源地和第四大贸易伙伴，截至 2017 年，我国对津投资累计已经超过 17.5 亿美元，双边贸易额达到 13.17 亿美元。^① 通过扩大对津投资，可以提高津生产能力，同时促进人民币融入津经济社会发展中，扩大人民币在津使用范围。近年来，我国企业积极参与津交通、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截至 2017 年底，累计

① 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津巴布韦（2018 年版）》，2019 年 1 月 29 日。

在津承揽工程 120.3 亿美元，仅 2017 年在津新签合同额 14.8 亿美元，同时我国金融机构为多个项目提供了优惠融资支持。

第三，通过对我国在津企业以人民币支付工资增加人民币供给。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和产能合作深入开展，中津在农业、交通基础设施、加工制造业等领域的大型投资项目持续增加。若我国企业对津直接投资年均增速达 30%，以 2018 年的 1.28 亿美元为基期，未来 5 年内，我国对津直接投资累计可达 11.56 亿美元。其中，仅计算发放薪金的部分涉及的人民币增量，按照员工报酬占投资总额比例为 10% 估算，至少有 1.16 亿美元（2018 年美元兑人民币平均汇率为 6.62），约 76.53 亿人民币（见表 7）。

表 7 2018—2022 年对津巴布韦直接投资中的员工报酬

	2018f	2019f	2020f	2021f	2022f	合计
直接投资额（亿美元）	1.28	1.66	2.16	2.81	3.65	11.56
员工报酬（亿美元）	0.13	0.17	0.22	0.28	0.36	1.16

注：f 指各年预测值，以 2018 年中对津直接投资为基期。

四、扩大人民币在津使用的政策建议

（一）切实增强有担保的融资支撑

充分发挥好信用担保的重要作用，向津提供以烟草和铬矿税收及对我国出口收入为还款保证的人民币贷款，增加人民币在津流动性增量。加大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支持力度，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在境内外市场募集资金用于对津贸易与投资项目。大力发展开发性金融、银行信贷、债券市场多元化融资方式，扩大人民币在津使用规模，推动构建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

（二）加强货币领域的务实合作

适时签订双边本币结算协定，从国家政策层面支持双边贸易投资结算使用人民币。推动签署本币互换协议，通过开展货币互换，为津金融体系注入充足的人民币，满足对人民币流动性的需求。推进人民币与津货币在双方银行间外汇市场挂牌交易，为经济主体提供透明的汇率价格。开展人民币对津货币直接挂牌交易，形成人民币对津货币直接汇率，减少汇率中间套算，降低汇兑成本。

（三）不断强化多元化的金融服务功能

加快中资金融机构在津设立分支机构和服务网点，逐步开设人民币账户，强化贷款、贸易融资、保函等多元化金融服务功能，为扩大人民币在津使用提供保障。发挥好大型商业银行作为人民币清算行的作用，加快在津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设与发展，切实发挥人民币在中津共建“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中的资产配置功能，促进人民币在津广泛使用。

（四）完善人民币在津使用的配套措施

切实加强对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资金自由流动严格管制，进一步稳定汇率，避免套汇和套利。不断加强以人民币支付结算体系为核心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促进金融工具之间的转换，为金融活动信息的交换和安全提供有力保障。通过完善相关制度规则、制定金融标准体系、促进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为跨境投资、金融交易便利化、人民币国际化奠定制度基础。以扩大人民币在津使用为契机，逐步开放金融市场，形成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相适应的金融市场，并根据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和动态对金融监管政策进行调整。

（五）构建人民币跨境使用的风险防控体系

稳步扩大人民币在津使用范围和规模，实现与美元、欧元等主要国际货币共赢发展，为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营造长期有利的国际环境。构建人民币跨境流通监测体系，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实现对人民币在津流通规模、资金流向和资金用途的有效监管。逐步提升国家货币政策调控能力，通过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建立人民币回流机制、渐进式开放资本账户等措施，来防范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金融风险，不断适应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复杂环境。

五、小结

在“一带一路”引领下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选择津作为突破口和试验田，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在津使用，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我国可以与津加大金融合作，帮助津走出当前经济危机，逐步重建金融体系，为深化中津友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下一步，当人民币扩大在津使用之后，通过津的对外贸易和投资活动，人民币在南部非洲国家的地位将得到进一步提升，更多非洲国家和企业从节省汇兑成本、降低汇率风险和商业风险的角度出发，主观上更乐于接受、使用和持有人民币，有望在非洲率先建立

“人民币流通区”，实现人民币的区域化。而作为人民币的发行国，我国将借此得到更多的经济收益，并与更多的非洲国家建立更加紧密的经济关系，这将进一步扩大人民币的使用范围。最后，以非洲为支点，在非洲的区域化基础上，稳步扩大到其他国家，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参考文献：

1. 叶亚飞、石建勋：《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货币替代效应研究——以香港地区离岸人民币为例》，《经济问题》2018年第3期。
2. 金俊永、涂永红：《人民币国际化影响下的朝鲜货币流通“美元化”现象研究》，《亚太经济》2019年第2期。
3. 束斌、马国宏：《印度支那三国的美元化及推动人民币在这一地区成为流通货币前景的研究——基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上海金融》2015年第12期。
4. 孟刚：《货币国际化经验对“一带一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启示》，《全球化》2017年第10期。
5. 李建军、甄峰、崔西强：《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现状、程度测度及展望评估》，《国际金融研究》2013年第10期。
6. 曹远征、陈世波、林晖：《三元悖论非角点解与人民币国际化路径选择——理论与实证》，《国际金融研究》2018年第3期。
7. 杨荣海、李亚波：《资本账户开放对人民币国际化“货币锚”地位的影响分析》，《经济研究》2017年第1期。
8. 丁志杰：《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寻找人民币国际化突破口》，《中国金融家》2017年第8期。
9. 韩龙：《美元崛起历程及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启示》，《国际金融研究》2012年第10期。
10. 李博雅：《“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机遇与制约》，《现代管理科学》2018年第4期。
11. 石磊、李明泽：《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分析》，《经济研究参考》2018年第6期。
12. 林乐芬、王少楠：《“一带一路”进程中人民币国际化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国际金融研究》2016年第2期。

责任编辑：李蕊

全球软件市场发展新动向： 产业、贸易和发展趋势

谢兰兰 王颖婕

摘要：全球软件市场多年保持平稳增长态势，各细分市场，特别是与数字技术相关的市场领域增长迅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加快及消费者数字化消费习惯的逐渐成熟，成为全球软件市场继续扩张的主要驱动力。数字技术也改变了全球软件贸易格局，发展中国家信息化建设加速释放对软件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数字贸易规则缺失和碎片化、新型贸易壁垒是其中最突出的特征。全球软件市场的未来发展将以数字经济为创新驱动力，高端人才需求进一步扩大，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强度空前加大。

关键词：软件产业 软件贸易 数据中心 数字贸易

作者简介：谢兰兰，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博士后、副教授；

王颖婕，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后。

数字经济的发展颠覆了全球软件产业和软件贸易。互联网、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革命深刻改变着经济形态和生活方式，前所未有地重构着全球经济发展图景，世界经济已经迈入数字经济时代。“计算、网络、数据、软件”无所不在，“软件定义世界”，软件是支撑计算、网络和数据的基础，是承载数字要素信息的有效载体。迅速变化的数字化市场环境，对全球软件产业和软件贸易的发展具有重要而深刻的影响。一是新一代信息网络技术的更迭，为软件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技术保障。二是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技术改变了软件服务的供给方式，可以使软件用户需求和厂商供给实现实时匹配、实时服务和

按需供给。^① 三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展，推动软件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不断涌现，并通过推动软件行业产品和服务质量升级、效率提升，优化全球软件贸易的格局。

一、全球软件产业的发展动向

（一）全球软件市场继续保持平稳增长态势，软件市场表现优于硬件市场

2018 年，世界经济动荡加剧，技术进步、贸易争端、经贸规则变革、英国脱欧等重大事件深刻影响着世界经济走势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全球经济发展前景呈现极大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尽管如此，全球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浪潮方兴未艾，成为全球 IT 技术支出的基本驱动力。高德纳咨询公司（Gartner）报告显示，2018 年全球 IT 市场规模继续扩大，IT 支出保持平稳增长，总支出 36500 亿美元，比 2017 年增长 3.9%，这种趋势将延续至 2020 年。

表 1 2018—2020 全球 IT 支出及预测 单位：10 亿美元，%

项目/年份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支出	增长率	支出	增长率	支出	增长率
数据中心系统	202	11.3	210	4.2	202	-3.9
企业软件	397	9.3	431	8.5	466	8.2
设备	669	0.5	679	1.6	689	1.4
IT 服务	983	5.6	1030	4.7	1079	4.8
通信服务	1399	1.9	1417	1.3	1439	1.5
总额	3650	3.9	3767	3.2	3875	2.8

数据来源：Gartner，2019 年 1 月。

与 2017 年相比，企业在各领域增加 IT 支出，各细分软件市场均实现了更大幅度的增长。首先，数据中心系统建设爆发式增长。伴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兴技术的落地，对数据存储、交换、计算等的应用需求不断增加，促进了全球范围内对数据中心相关的服务器、存储和网络技术需求的增长。2018 年，数据中心系统支出 2020 亿美元，增速高达 11.3%。其次，向云端迁移是企业软件^②支出，尤其是云服务和应用程序方面支出保持强劲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2018 年企业软件支出 3970 亿美元，增幅达 9.3%，

①王拓：《软件贸易发展新趋势、影响及我国的应对》，《湖北社会科学》2019 年第 3 期，第 67～72 页。
②ERP（企业资源规划）、SCM（供应链管理）、CRM（客户关系管理）、开源软件、本地软件和云端软件。

成为推动全球 IT 支出增长的重要动力。Gartner 预测，由于企业对应用软件需求居高不下，2019—2020 年这部分支出仍将保持 8% 以上的高速增长。再次，IT 服务市场继续保持稳定增长。近年的年均增速保持在 3%~5%，2018 年这部分支出预计为 9830 亿美元，增速 5.6%。通信服务市场落后于其他领域 IT 软件支出的增速。2018 年，通信服务支出 13990 亿美元，继续平稳增长，增幅 1.9%。此外，硬件方面需求放缓，手机、平板电脑、个人计算机（PC）和打印机等设备支出 6690 亿美元，增幅 0.5%。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是，全球经济不稳定性增加、消费者消费能力减弱、换机周期拉长等导致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主要消费类电子产品销量持续下滑。

（二）数字化转型支出高速增长

数字化转型引领着企业未来的业务方向和业务范围。越来越多的企业将数字化转型、打造数字化商业能力作为未来发展的核心战略资源。国际数据公司（IDC）报告显示，在 2017 年对全球 1000 家大企业的调查中，67% 都将数字化转型作为公司的战略核心。2018 年，全球范围与企业的业务实践、产品和组织的数字化转型相关技术及服务支出超过 1.1 万亿美元，比 2017 年（9580 亿美元）增长 16.8%。到 2021 年，全球生产总值（GDP）至少有 50% 将被数字化。在宏观环境、市场竞争和用户需求的共同推动下，与之相关的支出还将持续高速增长。

（三）智能手机高普及率带动移动应用市场持续扩张

尽管智能手机销量增速放缓，但是庞大的用户规模仍然支撑移动应用市场不断扩张。研究公司 Newzoo 的报告显示，2018 年全球智能手机用户数量达到 30 亿户，移动应用市场收入预计达 921 亿美元，其中以移动游戏收入占比最高，约 699 亿美元，占比 76%。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移动应用市场收入排名第一，估计高达 293 亿美元。从智能手机普及率的区域分布看，北美智能手机普及率约 77%，西欧、东欧地区分别为 75% 和 60%，中东和非洲的智能手机普及率最低，只有 19.9%，IT 设备和移动应用市场的潜在市场空间巨大。

（四）数字化转型浪潮加速了不同规模企业的 IT 支出增长

2018 年，IDC 追踪的 4800 家公司的 IT 支出状况显示，排在前 10 位的公司主要集中于大型互联网企业和传统金融企业，其中前 10 大公司^①占据了总支出（1.1 万亿美元）的

^①10 家公司分别是 Amazon, Alphabet, Walmart, JPMorgan Chase, Microsoft, Bank of America, Facebook, AT&T, Wells Fargo Citigroup.

7%。^① 据数据分析机构 Statista 预测，2018 年全球云市场支出将达 804 亿美元，同比增长 46%，排名前 5 位的公共云服务商分别是亚马逊（254 亿美元）、微软（135 亿美元）、谷歌（68 亿美元）、阿里巴巴（32 亿美元）和 IBM（31 亿美元），支出集中于服务器、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摩根大通、美国银行、富国银行、花旗集团等传统金融行业则将网络安全和数字银行工具作为主要的 IT 投资领域。

同时，IDC 发布的《全球中小企业支出半年度指南》显示，中小型企业^②是全球最大的软件市场。2018 年中小型企业的 IT 支出总额接近 6200 亿美元，同比增长 4.9%。在中小型企业的 IT 支出中，个人计算设备、外围设备和手机等硬件设备仍然是最大的技术支出类别，达 1150 亿美元；^③ 企业资源管理、内容应用程序和客户关系管理等应用程序是第二大开支类别，支出 990 亿美元，其余以商业服务交付形式支出。

（五）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加速扩张

数据中心是企业管理 IT 基础设施与应用、提供基础设施与应用服务的重要平台。随着云计算、大数据、虚拟化等新兴技术的落地，数据中心流量和带宽成指数级增长，全球范围内数据中心的投资规模和市场规模不断扩张，以亚马逊、谷歌为代表的数据中心布局推动了全球数据中心业务的发展。经过 10 多年的扩张，全球数据中心的建设进入了较为稳定的发展阶段。

总体上看，全球范围内数据中心建设在数量上逐渐缩减，但单体建设规模不断加大。Synergy 调研数据显示，2018 年全球超大规模数据中心^④达到 430 个，增幅 11%，还有 132 个大型数据中心处于规划或建设阶段。这些超大规模数据中心主要由云服务提供商、社交网络公司和高科技公司使用 and 运营。Synergy 统计，2018 年亚马逊、微软、谷歌和 IBM 等全球最大的云服务提供商，平均每家拥有超过 55 个数据中心。^⑤

从地区分布看，除亚马逊、微软、谷歌和 IBM 等云服务提供商外，美国还拥有全球数量最大、技术实力最强的社交网络公司和高科技公司，脸书、推特、苹果、雅虎、甲骨文等，这些公司集中了全球 40% 的超大规模数据中心；中国的高科技公司，阿里巴巴、百度、腾讯等则拥有全球 8% 的超大规模数据中心，排名第二；其后依次是日本（6%）、

①数据来源：IDC，Worldwide IT Wallet 2019，IT 支出包括软件、硬件、服务、电信设备和员工。
②雇员在 1000 人以下的企业。
③IDC 预测，硬件设备的地位将在 2019 年和 2021 年分别被软件和 IT 服务取代。
④一般指拥有 10 万台以上服务器的数据中心。
⑤Synergy 的研究基于全球 20 家主要的云和互联网服务公司的数据中心，包括 SaaS，IaaS，PaaS，搜索，社交网络，电子商务和游戏领域的最大运营商。

英国（6%）、澳大利亚（5%）和德国（5%）等（图 1）。据统计，这些公司的营业收入年增速 24%，资本支出增长则超过 40%，其中大部分用于建设和装备数据中心以为企业未来的业务扩张做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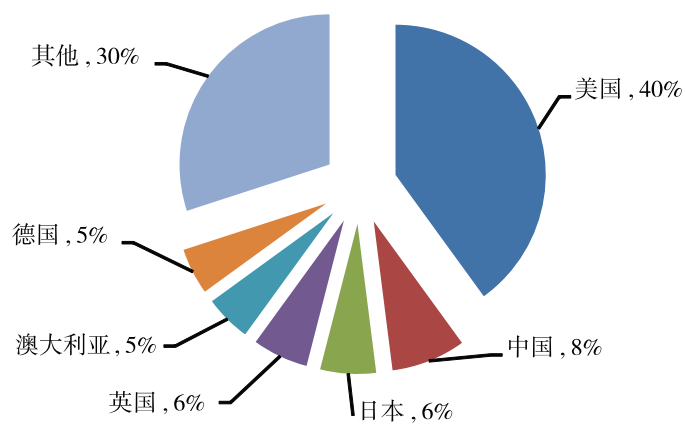


图 1 全球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区域分布

数据来源：Synergy，2018 年 12 月。

二、全球软件贸易的发展状况与特征

（一）全球软件贸易规模稳定增长

全球 IT 支出稳步上升，信息技术投资市场容量巨大，软件贸易规模稳定扩张。联合国贸发会（UNCTAD）数据显示，包括通讯、计算机服务和信息服务在内的全球软件贸易持续稳定增长。2005—2017 年，全球软件出口总额由 2027.60 亿美元增长至 5273.40 亿美元，年均增速达 21.7%。其中，计算机服务占比最高、增速最快，由 1227.10 亿美元增长至 3816.10 亿美元，年均增速 25.9%（表 2、图 2）。

表 2 2005—2017 年全球通讯、计算机及信息服务贸易

单位：亿美元（现价）

年份	通讯服务	计算机服务	信息服务	总额
2005	679.50	1227.10	121.00	2027.60
2006	790.20	1432.80	139.00	2362.00
2007	919.80	1760.90	154.30	2835.00
2008	1053.10	2114.30	168.90	3336.30
2009	1018.80	2018.10	161.30	3198.20

续表 2

年份	通讯服务	计算机服务	信息服务	总额
2010	996.30	2147.90	163.90	3308.10
2011	1103.20	2581.60	168.30	3853.10
2012	1126.60	2801.60	178.80	4107.00
2013	1166.50	3055.50	215.00	4436.90
2014	1202.90	3383.40	250.60	4837.00
2015	1129.10	3401.50	251.50	4782.20
2016	1135.30	3504.20	272.80	4912.60
2017	1153.70	3816.10	303.60	5273.40

数据来源：UNCTAD 数据库。
注：以出口额统计，在计算机服务中包括软件和硬件两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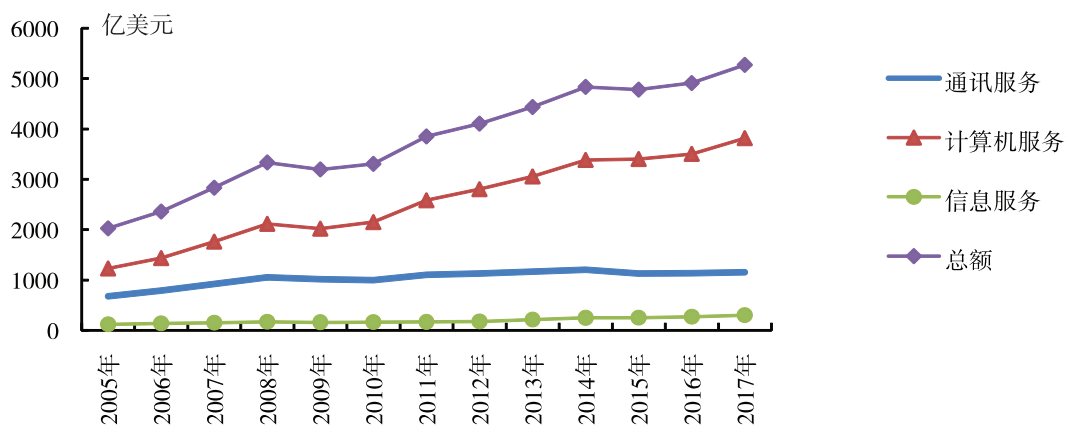


图 2 2005—2017 年全球通讯、计算机及信息服务贸易

数据来源：UNCTAD 数据库。

从区域构成看，发达经济体仍然是主要出口来源国。2017 年，发达经济体占比高达 70.43%，发展中经济体占比为 27.31%（表 3、图 3）。但发展中经济体的发展速度显著快于发达经济体。2005—2017 年发达经济体年均增速 18.7%，发展中经济体年均增速 34.5%；2017 年，在发展中经济体中，亚洲、美洲、非洲的出口额分别约为 1293 亿美元、86 亿美元和 60 亿美元，亚洲是占比最高和发展最快的区域，以南亚的印度和东亚的中国贡献最大。

表 3 2005—2017 年全球通讯、计算机及信息服务出口区域构成

单位：亿美元（现价）

年份	发达经济体	发展中经济体	总额	年份	发达经济体	发展中经济体	总额
2005	1657.60	347.70	2027.60	2012	2972.60	1059.30	4107.00
2006	1871.00	464.40	2362.00	2013	3204.10	1142.00	4436.90
2007	2209.40	586.10	2835.00	2014	3467.20	1270.60	4837.00
2008	2529.40	753.90	3336.30	2015	3345.30	1342.00	4782.20
2009	2416.40	731.30	3198.20	2016	3418.10	1394.80	4912.60
2010	2425.80	828.10	3308.10	2017	3713.90	1440.30	5273.40
2011	2805.70	981.90	3853.10				

数据来源：UNCTAD 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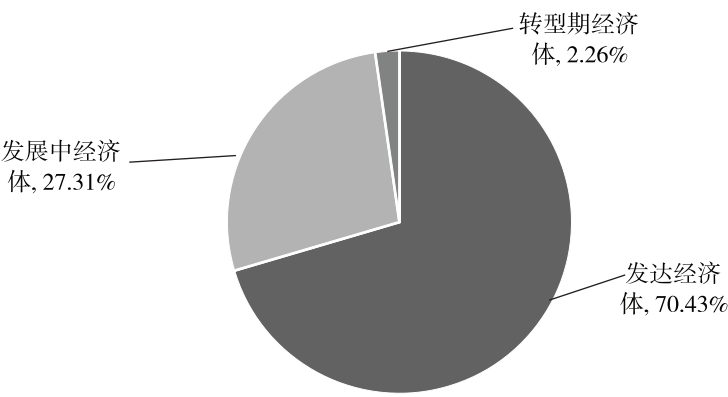


图 3 2017 年全球通讯、计算机及信息服务贸易区域构成

数据来源：UNCTAD 数据库。

在全球市场上，软件贸易的主要参与国以信息技术产业基础雄厚的发达国家为主，只有印度、中国、菲律宾、俄罗斯等少数发展中国家在一些细分领域具备竞争优势。2017 年，全球软件产品出口排名前 5 的国家和地区分别是欧盟、印度、美国、中国和瑞士。印度和中国依托不同产业及资源优势成为全球离岸软件外包中心。印度拥有在工程、产品研发、制造业领域的投资吸引力，以及房地产、劳动力方面的相对便利性等长期积累下来的软件外包优势；中国则主要依托高速发展的信息技术产业、营商环境改善和金融市场自由化改革等优势。软件产品进口需求最大的国家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和地区，排名前 5 位的分别是欧盟、美国、中国、瑞士和日本（表 4）。

表 4 2017 年全球通讯、计算机及信息服务主要贸易国

单位：亿美元（现价）

排名	出口		进口	
1	欧盟 28 国	2891.85	欧盟 28 国	1525.59
2	印度	548.63	美国	402.21
3	美国	389.36	中国	191.76
4	中国	277.67	瑞士	167.45
5	瑞士	131.93	日本	136.76
6	新加坡	113.09	新加坡	126.43
7	以色列	116.55	印度	60.68
8	加拿大	78.05	俄罗斯	53.15
9	阿联酋	64.53	加拿大	50.06
10	菲律宾	57.62	挪威	38.47

数据来源：UNCTAD 数据库。

（二）新兴市场国家软件外包服务综合实力提升迅速

全球软件外包产业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推动着新兴市场国家软件外包服务业迅速发展。作为主要离岸外包的接包国，这些国家在金融财税支持、IT 基础设施建设、技术人才方面的优势越来越突出，IT 生态环境不断优化，IT 竞争力指数不断提高。国际外包专家协会（IAOP）发布的 2018 年“全球外包服务 100 强”企业中，来自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外包企业占 40 席，比 2015 年增加 4 席。2017 年，IDC 对全球软件外包服务综合实力的国家排名中，前 10 位国家分别是印度、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巴西、越南、菲律宾、泰国、智利和哥伦比亚，大部分为新兴市场国家（表 5）。

表 5 2017 年全球软件外包服务综合实力排名

排名	国家	财税吸引力	技术人才	商业环境	综合得分
1	印度	3.3	2.63	1.14	7.07
2	中国	2.37	2.69	1.26	6.31
3	马来西亚	2.92	1.47	1.72	6.11

续表 5

排名	国家	财税吸引力	技术人才	商业环境	综合得分
4	印度尼西亚	3. 25	1. 53	1. 2	5. 99
5	巴西	2. 65	2. 02	1. 27	5. 93
6	越南	3. 31	1. 39	1. 22	5. 92
7	菲律宾	3. 13	1. 57	1. 17	5. 87
8	泰国	3. 06	1. 38	1. 43	5. 86
9	智利	2. 54	1. 33	1. 88	5. 76
10	哥伦比亚	2. 85	1. 45	1. 43	5. 73

数据来源：IDC。

（三）发展中国对软件产品和服务存在巨大需求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及信息化水平分化巨大。根据 2018 年国际电信联盟（ITU）公布的不同类型国家的信息化渗透率看，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水平各分项指标均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下，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表 6）。从现实需求看，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信息化程度低，数字鸿沟大，在数字经济不断纵深发展的大背景下，随着信息化建设的推进和国民收入的稳步提高，对软件产品和服务的巨大需求将加速释放。UNCTAD 数据显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信息通信技术（ICT）产品的进口量逐年攀升，2009 年开始进口规模超过发达国家，成为全球 ICT 贸易规模扩张最重要的拉动力（表 7）。

表 6 2018 年分国家类型的信息化渗透率

项目/国家类型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最不发达国家	世界平均水平
固定电话	36. 7	7. 5	0. 8	12. 4
移动电话	128. 0	102. 8	72. 4	107. 0
移动宽带活跃用户	111. 2	61. 0	28. 4	69. 3
固定宽带	32. 7	10. 4	1. 4	14. 1
家庭电脑拥有率	83. 2	36. 3	8. 5	48. 3
家庭上网率	85. 3	48. 3	17. 8	57. 8
个人上网率	80. 9	45. 3	19. 5	51. 2

数据来源：ITU。

表 7 2005—2017 年各类型经济体 ICT 产品进口额

单位：亿美元（现价）

年份/国别类型	世界	发展中国家	发达国家	最不发达国家
2005	14000.09	5917.14	7964.87	26.55
2006	15849.71	6856.33	8824.15	32.73
2007	17046.04	7932.48	8879.66	54.28
2008	17681.39	8360.68	9048.97	41.89
2009	14900.97	7444.75	7284.65	49.02
2010	18914.48	9517.41	9137.81	55.10
2011	19937.32	10223.21	9416.08	57.94
2012	20507.58	11183.49	8991.64	56.50
2013	21405.39	12114.56	8974.99	52.22
2014	21846.11	12332.08	9206.47	54.98
2015	21113.93	12099.62	8784.21	78.43
2016	20866.38	11986.69	8653.05	44.71
2017	22166.41	12361.91	9512.65	31.24

数据来源：UNCTAD 数据库。

发展中国家通过信息化建设可以为本国创造更大的商业机会。华为在《2018 全球联接指数（GCI）报告》中对全球 79 个国家的 ICT 基础设施的成熟度及 5 大赋能技术（宽带、数据中心、云、大数据和物联网）与 GDP 增长的关联性进行了全面分析。按照得分情况，79 个国家被分为领跑者、加速者和起步者三类。结果显示，领跑者均为发达国家，加速者和起步者则以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为主。在这些国家中，菲律宾、埃及、中国是进步最快的，通过积极部署 ICT 基础设施建设，大幅提高了本国的数字经济水平。比如，埃及通过制定国家宽带计划，提升本国互联网和智能手机使用率，推动电子商务发展，吸引了大量海外资本投向本国的电子和 ICT 行业，国家数字化转型得以加速推动。

（四）数字贸易规则制约软件贸易自由化发展

在全球市场上，作为一种新型的国际贸易形式，数字贸易发展与传统的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下的货物贸易及服务贸易规则之间产生了不协和冲突，由此给软件贸易的自由化发展带来了全新挑战。一是数字贸易规则制定滞后于贸易发展实践。主要体现

在多边层面上WTO框架下数字贸易规则缺失，以及区域层面数字贸易规则碎片化。二是数字隐私与保护标准难以达成共识。目前，全球尚无统一的与数据隐私及保护相关的法律条文，不同国家与不同行业间关于数字保护的法律条例具有显著的“自我监管”特征，相互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三是各国监管重点不同导致政策分化严重。以美欧中三个全球最大的数字经济体为例，美国的政策主要侧重于数字信息的全球自由流动以及对源代码、企业数字机密等的保护；欧盟的政策主要是为了打破欧盟境内的数字市场壁垒，一方面强调区域内数据的自由流动，另一方面也强调隐私保护与数据本地化；而中国的政策则着重于跨境电子商务，注重对国家安全和消费者权利的保护。四是数字贸易的发展壁垒和法规制度障碍。目前，多边及区域贸易协定中的关注重点主要包括强制本地化义务、市场进入限制、数据及个人隐私保护措施、消费者权益维护、知识产权保护、平台业者法律责任不明确、内容审查及数字贸易环境不健全等。

三、全球软件市场的发展趋势

（一）市场规模持续增长

尽管 2018 年全球经济出现英国脱欧、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等重大变局，但并未根本改变全球软件产业供需双向扩张的格局。全球经济增长越来越倚重信息技术的支撑，对信息技术稳定而持续的需求，为全球软件市场持续增长提供了内在动力。

供给层面，许多国家将发展软件产业作为战略优先。发达国家为保持在软件产业上的先发优势，必将进一步于全球市场确立在软件产业规则制定中的垄断地位，通过不断挖掘和向外输出新的软件市场需求，从而在全球范围内构建软件行业和相关技术标准。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经过多年的持续积累，在软件产业的某些细分领域已经具备相当规模和技术优势，在国家政策的支持和引导下，将与发达国家错位竞争，持续对外输出优势软件产能。

需求层面，当前全球经济处在秩序重建和结构性增长的关键时期，但是数据显示，经济增长并没有明显放缓的迹象，全球宏观经济环境总体好转，主要国家经济增长表现强劲。美国经济增速几乎翻倍，俄罗斯经济增长创 6 年来新高，印度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领导者，越南经济增速创 10 年新高进一步确立世界工厂的地位，巴西 GDP 增速引领拉美经济复苏，中国经济增速（6.6%）仍然远超发达国家处于全球前列。在此背景下，无论是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还是产业结构升级调整，都将释放大量与软件需求相关的项目，带动软件贸易规模的扩大。

（二）数字经济为全球软件贸易持续发展提供强劲的创新驱动力

数字技术正在改变全球经济的增长方式。数字化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加速成长，将不断释放对软件市场的强大需求，为扩大全球软件贸易创造巨大市场机会。物联网、3D 打印、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正在改变全球商业、创新以及国际贸易的运作方式。据 WTO《2018 年世界贸易报告》预测，到 2030 年全球贸易将会因为数字技术增加 34%。数字贸易正在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主要贸易方式。过去十几年间，数字贸易从数量到价值都呈现指数级爆炸式增长，成为全球经济中最具活力和发展潜力的新业态。据统计，全球服务贸易中有 50% 以上已经实现数字化，超过 12% 的跨境实物贸易通过数字化平台实现。软件贸易是数字贸易的主要形式，同时数字贸易带来的交易平台化和服务平台化，也将为全球软件贸易拓展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并成为推动全球软件贸易增长的强劲动力。

（三）全球软件市场高端人才需求缺口进一步扩大

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指数式增长，既为人类提供了前所未有之生产生活便利，同时也颠覆式地取代了大量低效率劳动。但是决定 IT 产业发展水平和潜力的内核仍然是人才。知识和技术密集的特征决定了软件产业能够迅猛发展的关键是拥有一定数量、结构和质量的 IT 技术创新人才。软件企业的竞争优势以人才为根本。以人工智能领域为例，全球人工智能领域人才分布的不平衡性加剧了企业对高端人才的争夺。腾讯研究院发布的《2017 全球人工智能人才白皮书》数据显示，目前全球人工智能领域人才约 30 万人（高校 10 万人、产业界 20 万人），全球 367 所具有人工智能研究方向的高校，每年可输出毕业生约 2 万人，远远无法满足百万量级的市场需求。作为新兴产业部门，短期内全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构建完善的人工智能高级人才支持体系和高端教育体系。可以预见，全球对人工智能领域的高技能人才需求仍将延续倍数级增长。

（四）信息安全、用户数据和隐私保护力度持续加强

信息安全、用户数据和隐私保护是围绕软件产业发展的世界性核心议题。全球用户数据安全保护亟需提高。各国个人数据保护立法的碎片化及数据管理的差异导致个人数据安全风险不断提高。金雅拓（Gemalto）发布的数据泄露水平指数^①显示，自 2013 年以

^①数据泄露水平指数（The Breach Level Index）是一个全球数据库，可跟踪数据泄露时间并从数量、数据类型、违规来源、数据使用方式以及数据是否加密等多个维度衡量其严重程度。

来全球有近 150 亿条数据泄露。仅 2018 年上半年，就有 45 亿条信息被泄露，^① 平均每天超过 2500 万条数据遭到入侵或泄露。信息泄露事件严重程度不断提升。特别是社交媒体领域，占受害记录总数的 56%。信息安全和用户隐私保护问题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极大关注。产业层面，信息安全是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关键因素，强大的信息安全保障能力是未来软件企业的核心竞争力。Gartner 数据显示，企业用于信息安全方面的支出居高不下。2018 年，全球企业在信息安全产品及服务上的支出达 1140 亿美元，同比增加 12.4%。预计 2019 年，信息安全市场规模将继续扩张 8.7%，达 1240 亿美元。网络用户隐私保护意识不断提高，还催生了如隐私咨询服务等新兴行业。

国家层面，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美国、欧盟、中国等都致力于加强个人数据和隐私保护的法律法规。如，2018 年 5 月 25 日欧盟颁布《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被视为全球最严格的个人数据和隐私保护立法。

参考文献：

1. 石静霞：《国际服务贸易规则的重构与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中国法律评论》2018 年第 5 期。
2. 王晓红、李蕊：《把握数字经济机遇，提升中国软件出口竞争力》，《全球化》2018 年第 11 期。
3. 汤婧：《国际数字贸易监管新发展与新特点》，《国际经济合作》2019 年第 1 期。
4. 马述忠、房超、梁银锋：《数字贸易及其时代价值与研究展望》，《国际贸易问题》2019 年第 2 期。

责任编辑：李蕊

^①共涵盖 945 次全球性信息泄露事件。

全球高技术产业发展趋势与经验启示

赵春哲 李 丹

摘要：进入新时代，高技术产业在我国经济社会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从高技术产业呈现的趋势来看，数字信息技术开始主导全球产业体系变革，智能化、融合化和纵深化技术成为各国高技术产业重点发展的对象，新兴经济体也纷纷加入了关键核心领域的角力。在此背景下，美国、德国、法国、日本和以色列作为传统科技强国和关键小国，不断强化高新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以推动本国高技术产业向前发展。梳理和提炼五国在高科技产业领域的产业政策，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高技术产业 数字技术 技术创新 先进制造业

作者简介：赵春哲，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产业规划部副处长、助理研究员；

李 丹，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产业规划部助理研究员。

一、全球高技术产业发展新趋势

（一）数字场景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场景

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核心是智能化与信息化。在此背景下，数字技术蓬勃发展，逐渐融入各个产业。信息化和工业化的深度融合已成为正在兴起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显著特征，包括利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实现传统产业的信息化、智能化升级，以及数字技术在新材料、新能源、现代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发展。

数字技术不断颠覆和重构全球产业体系，孕育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以大数据、云计算、下一代通讯网络、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不

断取得突破。人工智能、3D 打印、无人驾驶运输、超宽带、精确定位等尖端技术，将人、机器、应用系统和信息互相连接，出现越来越多的智能工厂和供应链，重塑了工业经济的流程和生态。电子商务正在使零售、消费业态发生巨变。分享经济将海量闲置资源整合，满足多样化的社会需求。融合人工智能、互联网、新材料的新一代工业技术正赋能于制造业各环节，加速推进其深度转型。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制造业向服务化迈进提供了条件。制造业的生产将从提供传统产品制造转变为制造业服务化和提供整体解决方案，设计、研发、生产与售后的边界越来越模糊。

数字场景下，全球资源跨境整合、无缝连接，大幅降低供应链成本，极大提升供需对接效率。数字经济下，全球供需主体得以在同一网络上进行线上对接，供应链由线下移到线上，信息、资金、服务等资源交互依托数字网络，效率更高、范围更广，极大降低了生产供应组织的成本，提升资源流动效率和效果，实现生产供应与消费需求的全球整合和收益全球共享。与此同时，线下经济活动必须与时俱进的升级发展，并实现线上和线下的协同发展。

（二）智能化、融合化、纵深化技术成为各国重点发展对象

当前，学科、技术与产业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产生新的业态、模式、工具，不断提升人类对自然界的认知水平，增强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化学与生物学融合产生合成生物学，使“人造生命”成为可能。以互联网、增强现实、虚拟现实、量子技术、物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推进，催生无人驾驶、车联网等产业，使异地实时同步研发成为现实。军民融合技术不断向深空、深海、深地、深蓝领域拓展，开辟人类认知和利用资源的新领域。超深水钻井平台、深海空间站、水下机器人等海洋技术，深地钻探技术、地质勘探技术等，显著提高能源勘探和利用能力，改变全球能源供需格局。新型材料和储能手段的发展使太阳能利用效率大大提升，极大缓解了能源瓶颈制约。空间站、载人航天器、天基反导武器等成为各国军事竞争关键领域。

从发达国家高技术产业布局重点来看，美国重点支持机器人、3D 打印、人工智能、新一代数字技术的研发及应用，新兴领域的石墨烯、金属材料、新型核能反应堆、人工智能系统、工程生物、航空航天、半导体、先进医疗器械等。英国注重国家制造业创新体系的总体布局，在材料集成、流程创新、先进制造等重点领域，建设一批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使之成为英国重振制造业创新和增强国家制造业竞争力的平台和载体。2010—2014 年，英国政府投资 2 亿英镑集中用于高价值制造业、细胞疗法、数字经济、智慧城市、卫星应用、运输系统、能源系统、精准医学、药物发现、化合物半导体应用

等领域，未来计划在机器人和自治系统、低碳交通、基因组学、合成生物物质等领域展开布局。日本针对老龄化、人口减少等挑战，提出日本产业创新的重点发展方向是超智能产业，包括实现人类知觉、控制的扩展，人工智能硬件和软件创新，数据保密技术，信息交换设备和高效率网络，新一代制造系统等。此外，还包括绿色产业、生命产业，涉及超显微测量、新机能材料、新机能设备、合成技术创新、生理构造解析、生物芯片与健康可视化等。韩国发布《第四次产业革命时代下扶持新产业发展政策课题》，将电动及无人驾驶汽车、新能源、新一代半导体、尖端新材料、智能船舶、新一代显示器、人工智能技术、机器人、生物养生、航空及无人机、物联网家电、高端消费品等列为国家未来重点发展产业。

（三）发展中国家的创新角色日益重要

发展中国家受益于数字技术的外溢性和规模效应，依托巨大的市场空间和消费潜力，不断夯实创新实力，在世界经济体量和创新格局中的份量越来越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数字经济呈现快速增长之势。根据《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 2018》蓝皮书，2017 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 27.2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3%，规模位居全球第二。从电子商务角度看，全球四大电子商务市场中有三个在亚洲（日本、中国和韩国）。亚太地区出现了规模较大且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电子商务平台，如中国的阿里巴巴、印度的 B2C 零售商 Flipkart 等。

从全球各国研发投入看，发达国家投入规模仍占绝对优势，而以中国、印度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研发投入规模迅速增加。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的报告显示，美国每年投入研发资金达到 4960 亿美元，占全球研发投入的 26%。据日本发布的“科学技术研究调查”报告，日本每年科技研发投入占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3.42% 左右。2017 年，日本研发投入达到 1670 亿美元；中国则达 1.76 万亿人民币，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2.13%，全球占比约为 21%，仅次于美国。关键小国以色列是高技术产业享誉世界的研发中心，2017 年该国研发投入约 160 亿美元，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4.5%。

从企业研发投入情况看，欧盟委员会 2017 年发布的全球研发投入 2500 强公司排名中，美国排名第一，有 822 家公司上榜，研发投入占总额的 39%；欧盟第二，有 567 家公司上榜，占总额的 26%；日本排名第三，有 365 家公司上榜，占总额的 14%；中国排名第四，有 376 家公司上榜，占总额的 8%。

从独角兽企业数量看，截至 2018 年 8 月，全球有 260 家独角兽企业，估值总额接近 8400 亿美元。美国的“独角兽”企业为 121 家，占 47%，居全球第一，但比例较 2017 年

降低了 7%；中国独角兽企业数量占比从 23% 上升至 30%；印度独角兽企业占比为 4%；以色列为 2%。从独角兽企业估值情况看，美国和中国是估值总额最高的国家，总额分别为 4197.9 亿美元、2873.2 亿美元。

（四）创新领域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角力加剧

在新科技革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传统发达国家凭借已有优势和强大的基础科学、研发实力，牢牢把握创新前沿技术和关键核心领域技术，在新兴产业占据有利位置，同时出台支持政策和发展战略，以此强化其产业领先地位和对创新资源的控制权。如英国出台的产业战略白皮书，提出将英国建设成为“全球最具创新能力”的经济体，将研发资金占 GDP 比重提高到 3%，设立“产业战略挑战基金”，计划成立新的科技催化基金，并计划 3 年内投资 3 亿英镑吸引关键领域杰出人才。德国发布《德国工业战略 2030》，提出确保或重夺所有相关领域在国内、欧洲乃至全球的经济技术实力、竞争力和工业领先地位，并提出在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量子计算等领域要寻求突破性创新。

与此同时，后发国家利用数字经济规模化、网络化、外溢性、低成本等特点，加大研发力度以掌握创新技术，加速布局新兴产业，在应用技术创新领域取得丰厚成果，在部分前沿领域也取得突破性进展。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逐步由完全“跟随”向个别领域“领跑”转变，推动国际创新格局的改变，同时也引发发达国家加重对新兴国家的遏制。近期的中美贸易争端，突出表现为美国对我国创新发展的打压。

（五）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的高新技术成为发展重点

随着技术的迭代升级，各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资源与环境压力也在加大。这在创新后发国家表现尤为突出。面对高速发展带来的生态环境压力，各国纷纷将绿色制造作为发展重点。如欧美提出“绿色供应链”“低碳革命”、日本提出“零排放”，通过发展低碳节能的先进制造业，逐步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循环发展、绿色发展。在满足后发国家，特别是人口大国居民消费需求的同时，必须充分考虑资源和环境压力受限问题，布局对资源节约利用、循环使用、节能降耗、效率提升、减少物理资源消耗等领域技术的投入，及早开展前瞻性、基础性研发，形成基础科学支撑、二次研发有力、应用技术转化顺畅的科研体制。

二、发达国家发展高技术产业的主要做法

（一）美国

1. 政府通过巨额投入实现战略引导

制定科技发展计划是美国迈向世界科技最发达国家的重要路径之一。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是美国制定和调整导向性科技政策的国家机构，引领国家科技发展方向，将国家的经济、科技、安全发展的长远目标与战略、现实需求相结合，并突出强调当前国家科技发展的研发重点（如针对反恐的国家安全和国防科技）。

2. 政府以应用为导向的产业政策

美国多届政府曾通过制定中长期计划以扶持新兴产业，直至今日。以人工智能为例，为保持美国在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主导地位，2018年“美国产业人工智能峰会”成功举办，美国政府在会上提出，在政府协调和指导下，整合产学研力量。随后，“国家量子计划”正式公布，该计划由美国众议院科学、太空和技术委员会起草，目标是增强政府与企业及科研主体的资源共享，增加对量子信息科技的投资。

3. 非常重视风险投资对高技术产业创新

风险投资成就了美国高技术产业，推动了美国高科技成果的转化，促进了高新技术企业的迅猛发展，对美国产业结构的高端化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风险投资的主要方向集中在信息产业、医药保健产业、生物技术产业等领域，它对20世纪50年代的半导体硅材料、70年代的微型计算机、80年代的信息技术以及生物工程等的最终商业发展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4. 积极培养和引进国际顶尖人才

美国充分利用世界创新人才、创新成果，进而保持世界领先的地位。从着力发展公立大学体系，到在欧洲抢夺科技顶尖人才，到推进教育信息化等，美国历届政府均将培养和吸引国际一流人才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构成。在引进国际科创人才的同时，创新体制机制，营造有利于国际人才集聚和发展的生态。并通过美国科学基金会为持美国绿卡或护照者设立各类奖励，进而吸引并鼓励中青年科研人员来到美国进行创造发明。

（二）德国

1. 制定科技创新战略引领产业发展

自19世纪后期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以来，德国一直将科技基础上的产业发展置于国家发展核心位置，在科技和经济上不断追赶英美等领先国家。德国科技创新的路径与美国

激进创新的路径不同，政府创新战略实施和创新政策制定上强调连续性、渐进性和系统性。德国联邦政府根据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发展水平制定科技发展的战略目标及实施计划，列出高科技领域的发展项目，并根据需要适时调整。其总体、综合的部署在国际上被称为“优秀的研发系统治理模式”，成为促进研究与创新的典范。

表 1 1998 年以来德国发布的创新与高技术产业发展战略一览

时间	法规与政策	方向和内容
1998 年	《INFO2000：通往信息社会的德国之路》白皮书	推动德国信息产业的发展
2004 年	《研究与创新协议》	规定大型研究协会（马普协会、弗朗霍夫协会等）的研究经费每年保持至少 3% 的增幅
2006 年	《2006—2009 年德国高技术发展战略》	首次从国家层面系统提出高技术发展战略，确定了旨在加强德国创新力量的政策路线
2010 年	《德国 2020 高技术战略》	立足于开辟未来市场，并确定能源、生物技术、纳米技术、交通、航空、健康研究等新的重要关注领域，并确定了具体的行动方针
2012 年	《高技术战略行动计划》	计划从 2012—2015 年投资约 84 亿欧元，推动《德国 2020 高技术战略》框架下 10 项未来研究项目的开展
2014 年	《新的高技术战略——创新为德国》	将高技术战略发展成为全面的跨部门创新战略，旨在把德国建设为世界领先的创新国家
2018 年	《研究与创新为人民——高科技战略 2025》	新的高科技战略报告涵盖了健康和护理、可持续及气候保护、能源、零排放智能化交通等 7 个重点领域，以及“国家 10 年”抗癌计划等 12 项任务，为德国未来 7 年高科技创新制定了目标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文献整理而得。

2. 分工明确的科研体系为产业赋能

德国长时间居于世界制造大国和强国地位，源于其完善的科技支撑体系。德国政府认为技术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因此科技体系中产品导向型的应用研究和产品研发占重要地位，能够有效支撑产业发展。如图 1 所示，德国的科技研究机构从下到上由承担不同的职责和功能的具体部门组成，形成一个结构完整、配置合理的科技体系，从结构上呈金字塔型排列。最底层的是前瞻性基础研究机构，如海尔姆霍尔茨联合研究中心，该中心由 16 个大型研究机构组成，其资金来源 90% 来自联邦，10% 来自各科研机构所在地的州政府。第二层是创新型基础研究机构，主要包括各类高等学校。高等学校主要从事基础研究，尤其是基础理论项目的研究，研究范围覆盖全部学科。第三层是技术



图 1 德国金字塔型科研机构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绘制而得。

型应用研究机构。弗朗霍夫协会是这类研究机构的中坚力量，是促进科研成果在产业中转化的重要纽带。顶层是产品导向型应用研究机构，主要根据市场需求进行技术和产品的判断、预研和开发，使新产品更具实际应用性。

3. 不断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投入力度

为了保持科技和产业的竞争力，德国一直给予科研机构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如图 2 所示，21 世纪以来，德国研发支出占 GDP 的比重一直远高于经合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自 2011 年起，德国这一指标均保持在 2.8% 以上，超过美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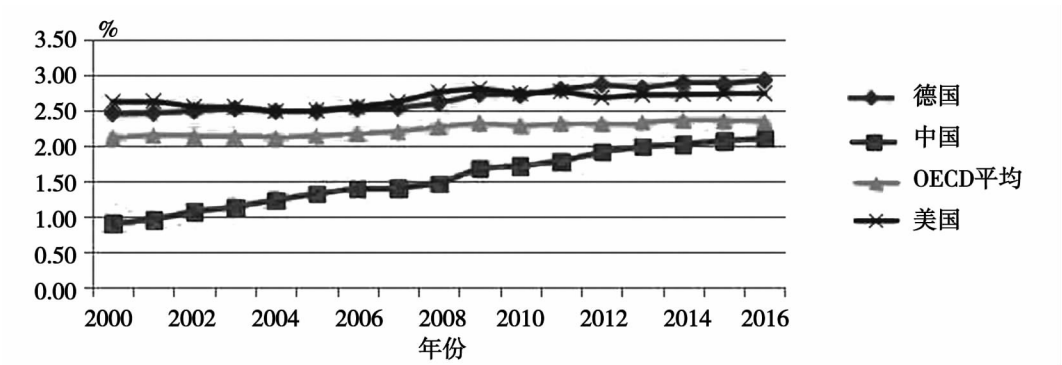


图 2 2000—2016 年德国、中国、美国和 OECD 国家研发支出占 GDP 比重的平均水平

数据来源：WIND 及 OECD 数据库。

德国联邦政府将大量的资金用于教育和基础科研，重点资助那些具有前瞻性的研究项目，且经费连年增加。此外，本土企业也普遍重视在产品研发方面投入。企业保持对研发的密集持续投入是保持产品先进性及市场竞争力的关键。

4. 支持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创立和成长

德国有 10 万家创新型中小企业，这是德国保持产业竞争力的生力军。德国联邦政府十分注重培育中小企业，从改善融资条件、吸引风险投资、鼓励新企业创业等方面入手，

给中小企业以强大支持。主要有以下做法：一是出台“改革股份有限公司法”，规定创立股份有限公司所需资本金降至 1 万欧元；二是为初创企业提供资金、打开市场，德国为此设立了高技术创业基金，专门为初创高技术企业提供部分启动资本，并为技术所有者与大公司牵线搭桥创造合作机会；三是简化基金会设立条件，修改基金会法案，简化设立程序，以促进更多的基金会参与科研领域。

5. 确立企业和学校紧密结合的职业教育体系

德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是依靠企业和学校紧密结合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培养了一支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队伍。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是指将专门学校的专业学习与在企业的职业培训或实践紧密融合在一起的教育模式，它同时包括学校和企业两个学习地点，即所谓的“双元”。充分发挥企业在学校学生培养中的重要作用，让企业的技术专家进入课堂，让学生和教师走进企业缩短人才培养进程。使企业成为招生主体，学校专业设置、课程规划和教学方案等方面紧跟市场需求，从本质上解决了“毕业就失业”这种知识与技能脱节的问题。

表 2 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

个体受教育阶段		大学学习形式	
		双元制	传统大学
初次培训	带有职业培训	与职业培训相融合	与职业培训并行
	带有实践环节	与企业实践相融合	与企业实践并行
进修培训	带有职业岗位	与职业岗位相融合	与职业岗位并行
	带有实践环节	与企业实践相融合	与企业实践并行

资料来源：德国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

（三）法国

1. 优化税收政策促进创新型企业成长

科研退税政策自 2004 年起就被法国政府定为一项永久有效的支撑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政策。科研退税主要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固定部分，即研发经费的 10%；第二部分是可变部分，是当年研发经费与前两年研发经费平均值差额的 40%。同时，享受科研退税的中小企业还可以免交地方的土地税和职业税，参与研发的科研人员的社会保险金也可免除。

2. 给予企业有力的科研融资支持

法国政府对企业研发给予多种形式的融资支持，包括：给予利率为 0 的启动资金贷款，金额可达研发总额的 50%，在项目成功后予以返还；在项目可行性研究和实施阶段，

给予项目 75% 融资、1.5 万~5 万欧元补助，对雇佣高中毕业 2 年以上人员，补助 50% 工资和上限为 1.3 万欧元的社会保险金；提供 4 万~40 万欧元的研发专项贷款；设立研发项目担保基金，为发放研发贷款的银行和提供自由资金的机构提供担保。

3. 开展“竞争力极点”项目

2005 年，法国国土整治和区域发展部际委员会授予全国 67 个项目“竞争力极点”称号，并从第二年起在 3 年时间内提供十几亿欧元的资金支持，旨在提高法国本土产业和技术的国际竞争力。“竞争力极点”是指在一定范围内，由企业、培训中心和研究部门在一个共同平台建立合作，发挥相互之间的协同作用，共同开发以创新为特点的项目。其主要特点是，企业、培训中心和研究机构构成合作主体，伙伴关系、共同的合作项目和追求国际影响力又将合作各方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入选“竞争力极点”的项目必须在这些核心因素方面具备比较优势。这项政策通过加强科研创新能力，以提升特定地区的经济，从而从整体上提升法国工业和经济的国际竞争力。这些项目被称为法国“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发动机”。

（四）日本

1. 出台《科学技术基本法》

1995 年 11 月，日本政府正式出台了《科学技术基本法》，通过此纲领性法律推进日本科技创新与发展，并提出了五大基本方针：侧重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相互融合，突出政府应为知识创新营造良好氛围，强调基础研究在科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通过科技创新实现多方和谐共处使产学研三者有机结合，加强国家实验研究机构与高等院校和企业研究机构之间的协同合作。同时，指出科学技术创新以立国强国的思想，明确了日本高技术发展的主要思路，并提出制定《科学技术基本计划》，计划周期为 5 年。

2. 发布鼓励企业科技创新政策

科技创新企业的发展需要相应政策的积极鼓励和引导，《外汇及对外贸易管理法》《小规模企业者等设备引进资金助成法》等政策应运而生，相继发布，从而有效地鼓励了日本科技创新企业努力创新，并营造了良好的创新氛围。此外，还包括为鼓励新兴领域技术创新而制定的《产业竞争力强化法》，为促进各主题开展基础创新和研究的《基础技术研究顺利进行法》，为鼓励中小企业创新的《日本小型企业投资法》《中小企业支援法》等。

3. 加强产学官一体化政策

日本出台了一系列突破性政策，旨在加强日本政企学研间的相互配合。《第五期科学

技术基本计划》在 2016 年发布，明确提出企业对大学等科研机构的研发投入要在 2025 年提高 2 倍，即超越 OECD 成员国的平均水平。随后，《关于大学等技术研发成果向民间产业转移促进法》《加强产学研合作研究方针》《产业技术力强化法》等系列政策措施相继发布，鼓励政企学研之间的技术交流。

（五）以色列

1. 政府主导构建创新体系

首先，政府逐步加强对技术创新的资金供给，为了保障高校和企业的创新资金供给，先后出台了多项研发资助的专项计划。其次，政府通过设立双边科研支持基金会、签订双边科技创新合作协议、参与区域性研发框架计划等方式，逐步与包括美国、德国、法国、印度等 40 多个国家全面推进科技创新合作。再次，政府设立负责各领域创新项目运行的以色列国家技术与创新总局（NATI），专职负责科创项目的管理、指导、统筹，以确保政府对创新相关工作指导的时效性与灵活性。

2. 军民融合助推创新发展

以色列实行全民服兵役制度，军队成为以色列科技创新架构中的重要一环，与市场间有一扇非常有效的“旋转门”。国防军像一所大学，着重对在役青年进行高技术相关知识的培训，大批掌握专业军事知识的退役军人流入市场，为其创造“无缝对接”的有利条件，使军队的专业技术学习与市场需求有效匹配。在企业对接方面，以色列整体高新技术产业体系的形成，主要得益于军事高科技的转化推动，民用产业从军工技术发展中受益。

3. 高技术企业集群化发展

通过政府长期的创新政府扶持和引导，以色列最终形成了耶路撒冷、海法、贝尔谢巴、特拉维夫－赫兹利亚等四大产业集群，以及近 30 个覆盖各行各业的高技术科创园区，大量外资企业进驻，高校技术也在此转移并产业化，从而在此凝聚了以色列创新驱动的中坚力量。其中，特拉维夫仅次于美国硅谷，拥有 5000 家初创企业。现在，包括谷歌、美国高通在内的 270 余家大型跨国企业在以色列设立了 320 多家研发中心。

三、发达国家发展高技术产业的共性启示

对美国、德国、法国、日本和以色列等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比较研究表明，各国都力图强化政府在高技术产业发展中的作用，巩固或提高高技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以争夺在未来新兴技术创新和工业发展中的全球主导地位，维护国家安全和本国经济利

益。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对其市场经济下的产业竞争理念做出修正，“再工业化”的力度不断加强，欧美大国加快推出一系列雄心勃勃的高技术产业发展规划，以适应科技变革和国际产业竞争发展新形势的需要。上述国家发展高技术产业的政策措施，对我国支持高技术产业发展具有以下共性启示。

（一）重视研发及基础研究，掌握技术标准和关键技术

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未来产业发展制高点，大力加强基础研究，不断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为核心技术突破提供坚实的科学基础。一是持续支持重大基础科学设施平台建设。加强战略研究，谋划推进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发展中长期规划工作，完善规划布局和体系建设。二是加快新型研究机构建设。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组建若干科研任务与国家战略紧密结合、创新链与产业链有机衔接的国家实验室和创新研究院，探索政产学研开放协同、共同参与的新型治理架构。面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行业、区域发展的独特需求，通过与地方及行业共建、科教融合等多种方式，做强一批特色鲜明、规模适度的特色研究所。三是健全科技决策咨询机制。加强统筹规划，集中资源要素，瞄准世界科技发展前沿，突出原始创新。在国家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部际联席会议机制下，成立基础研究战略咨询委员会，研判基础研究发展趋势，开展基础研究战略咨询，提出我国基础研究重大需求和工作部署建议。四是构建高效的知识生产和应用体系。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对接融通，促进科研院所、高校、企业、创客等各类创新主体协作融通，把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等打造成为融通创新的重要载体。

（二）做好科技成果转化

健全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一方面，加快高科技成果市场化转化机制建设。加强科研成果的市场导向，在科研立项标准、科研成果评价体制等方面，引入市场标准，切实推进科研成果的市场化；改变和拓宽科研院所经费来源结构，增强其市场竞争意识，鼓励科研机构主动对接市场，推动科研资源与产业和市场资源的整合及流动交换，加快实现科研成果市场化导向。另一方面，加快构建科技成果转化的动力机制。按照市场导向、产业牵引、技术驱动、利益共享原则建立企业与科研平台之间合作机制，建立完善企业与科研机构之间的技术成果和经济利益分享机制，强化科研成果向经济利益转化内在动力。此外，深入推进高技术产业军民融合发展，构建军民高技术成果双向转移转化平台。加快布局军民融合高技术产业园区、基地等产业化转移转化平台。积极推动民用高新技术在军事领域应用，提高国防军事高技术水平；积极引导国防军事高技术成果在民用领域应用，带动高技术产业快速发展，推动军民高技术成果双向转移转化，实现军民

高技术产业相互促进发展。

（三）政府引导支持

要补齐核心技术短板，除一般性科技金融支持体系，也需要聚焦重点，通过多种举措，完善高效率、导向性的支持方式。一是研究制定以研发为核心的激励政策体系，推动经济向创新驱动转变。应制定具体的税收激励措施，允许企业按照营业收入的一定比例提取研发基金，在税前抵扣。按照税制改革的方向与要求，对包括天使投资在内的投向种子期、初创期等创新活动的投资，统筹研究相关税收支持政策。二是设立国家基础工业共性技术创新基金。将分散在不同部门的基础工业共性技术创新资源统一起来、优化配置，设立“国家基础工业共性技术创新基金”，用于持续、稳定、集中地支持国家共性技术创新研究院及行业共性技术创新基地开展重大产业共性技术创新活动。三是完善支持自主创新的政府采购制度。探索建立科技创新财政资金综合投入机制，建立各部门联动投入、协调合作机制。加大财政资金用于基础研究、创新人才、知识产权等软投入的比重，提升项目单位科研经费使用自主权、支配权和收益权。探索支持自主创新与国际采购规则兼容的政府采购模式，积极实施商业化前采购、远期采购等方式，探索推进在高技术产业领域的公私合作（PPP）模式发展。

（四）官产学研用协同

在国家层面（国家科技领导小组）构建高科技协同创新网络，编制出台协同创新相关支持引导政策，建立政产学研用五位一体的协调机制，加快构建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系，完善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配套支撑体系，协调创新网络各个主体的创新活动，强化各个主体的协同能力，激发各个创新主体的活力，提升各个创新主体的动力，推动高技术成果快速转化。探索在高技术重点领域采取企业主导、院校协作、多元投资、军民融合、成果分享、利益分成、风险分担模式，打造高技术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中心或集群。尽快立法明确创新成果转化的责任和权利。促进知识产权的高效有序转移和商业化。完善我国《关于国家科研项目研究成果知识产权管理的若干规定》《关于加强国家科技计划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的规定》。

（五）培养人才，优化环境

加快建设高技术领域领军人才队伍。一方面，打造高技术领域领军人才队伍。围绕高技术重点领域和项目培养造就一批世界级科学家、高技术领军人才、工程师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出台相关政策支持高校、科研院所和高技术企业通过培养、引进等多种方式

吸收更多世界一流的高技术人才。遵循科技创新创业人才成长规律，拓宽高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渠道，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视野、了解国际前沿科学和国际规则的中青年科技研发及管理人才。另一方面，充分调动领军人才的积极性。加快培养和选用高技术产业重点领域“高精尖缺”领军人才，赋予他们更大的自主选择权，全面加强对高技术产业领军人才服务保障，提高高技术产业领军人才的政治待遇、经济待遇和社会待遇。切实保障领军人物在科研项目申报、科技项目管理和实施等方面的自主权，切实保障领军人才知识产权和创新成果收益，为充分发挥高技术领军人才在高技术产业创新中的重要作用创造良好的环境。

参考文献：

1. 沈坤荣、赵倩：《创新驱动发展的国际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学习与探索》2015 年第 11 期。
2. 魏爱苗：《德国高科技产业的“综合性解决方案”》，《每周经济观察》2011 年 1 月 24 日。
3. 臧红岩：《二战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德国引进高技术的国际经验》，《科技中国》2018 年第 8 期。
4. 刘春芝、王海峰：《日美法高技术产业政策比较及启示》，《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 2 期。
5. 石光：《典型国家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主要特征及启示》，《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8 年第 2 期。
6. 史飞：《法国支持高技术企业的新政策与举措》，《全球科技经济瞭望》2001 年第 7 期。
7. 吴翌琳、谷彬：《创新支持政策能否改变高科技产业融资难问题》，《统计研究》2013 年第 2 期。
8. 郑婧渊：《我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科学管理研究》2009 年第 5 期。
9. 邱丹逸、袁永：《日本科技创新战略与政策分析及其对我国的启示》，《科技管理研究》2018 年第 38 期。
10. 张倩红、刘洪洁：《国家创新体系：以色列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西亚非洲》2017 年第 3 期。
11. 刘琳：《德国高技术战略为什么能够成功》，《决策探索》2013 年第 9 期。

责任编辑：李 蕊

中国数字贸易发展现状及策略选择

夏友仁

摘要：交易是否通过数字化信息交换来实现，是判定一项经济活动是否属于数字贸易的关键。相比于传统贸易，数字贸易具有虚拟化、平台化、集约化、普惠化等突出特征。目前，跨境电子商务已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数字出版收入稳步增长，数字贸易成为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新趋势。但中国发展数字贸易还面临综合竞争力不足、基础设施和人才缺乏、有关法规制度不健全和国际话语权不强等问题。基于庞大的潜在市场，伴随着 5G 等技术的推广应用、国家系列政策的支持和相关制度规则的完善，中国数字贸易大有可为。

关键词：数字贸易 数字经济 跨境电商 服务贸易

作者简介：夏友仁，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产业规划部助理研究员。

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全球的贸易增速明显高于生产总值（GDP）增速，为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动力。然而从 2012 年开始，全球的贸易增速却连续 6 年低于 GDP 增速。有观点认为，全球化进程已到强弩之末。^① 但麦肯锡研究院认为，全球化进程不仅没有停止，反而进入了一个由传递信息、创意以及创新数据流所定义的新时代。^② 根据中国商务部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秘书处共同发布的《2018 年世界贸易报告》，全球服务贸易占贸易总额的比重将从当前的 21% 上升至 2030 年的 25%。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

^①David Smick. Could Globalization Crack Up? *International Economy*, fall 2012. Jeffrey Rothfeder. The Great Unraveling of Globalization. *Washington Post*, April 24, 2015.

^②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数字全球化：全球信息流的新纪元》，2016 年。

背景下，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数字贸易发展迅速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拉动力量。

一、数字贸易的内涵

（一）数字贸易的定义

目前，对数字贸易的认知多停留在现象描述阶段，还没有被普遍认可的内涵和外延，尚未形成公认的对数字贸易的定义。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于 2013 年 7 月在其报告《美国与全球经济中的数字贸易 I》中提出，数字贸易是通过互联网传输而实现的产品和服务的商业活动。既涵盖经由互联网实现的国内商业活动，也包括由此产生的国际贸易。在这个定义里，贸易活动中涉及的实体货物是被排除在数字贸易范围之外的，即使该实体货物具备了数字方面的特征，也不属于数字贸易的产品范围。

这一把具有数字特点的物品产品排除在外的定义有一定的狭隘性，并且与实际经济相背离，很快就被它的定义者修订。2014 年 8 月，USITC 在《美国与全球经济中的数字贸易 II》中对数字贸易的界定纳入了实体货物，把数字贸易定义为通过数字技术而实现的贸易，即互联网和互联网技术在订购、生产以及递送产品及服务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国内商业活动和国际贸易活动。数字贸易交易的具体商品包括：通过数字技术订购的产品和服务，如经由互联网购买的实体货物；通过数字技术生产的产品和服务，如计算机软件、音乐、电影的 CD 和 DVD；通过数字技术递送的产品和服务，也就是 USITC 在上一年的报告中界定的内容。对数字贸易更广泛的界定也与其他机构相一致。2017 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在其报告《数字贸易的主要障碍》中认为，数字贸易不仅包括基于互联网销售的消费品和在线提供的数字化服务，还涵盖生产环节中支撑智能制造的服务、构成全球价值链的数据流和其他数字化平台及应用。数字贸易的具体领域可以分为数字内容、社会媒介、搜索引擎和其他服务四类，见图 1。

根据以上定义，判定一项经济活动是否属于数字贸易，关键就是看它是否通过数字化信息交换来实现，交易内容仍然是传统概念下的商品，即物品或服务。有些交易活动，从预订到送达的全过程、交易的全部内容，都能够通过数字化传输实现。如个人消费者可以通过某一家网站购买电子书并在其提供的网络阅读器上阅读，还有网上购买的计算机软件、数字化音乐制品等。数字技术影响更为广泛的是为传统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提供数字化支撑，提升了贸易便利化。货物贸易方面，催生了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如 B2B 和 B2C 商业模式。服务贸易上，一些传统方式下的产品研发、设计以及其他信息，可以经过数字化加工进行网上传输，能够有效提高制造业的整体效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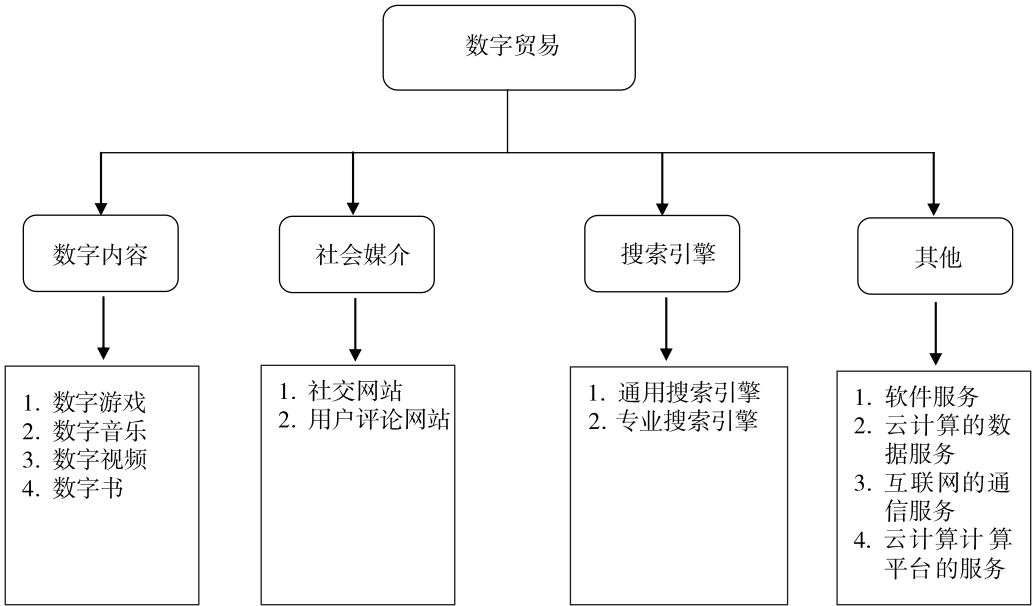


图 1 数字贸易涵盖的具体领域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而得。

（二）数字贸易的特征

相较传统贸易，数字贸易有几个突出特征。^①

一是虚拟化。相较传统贸易，虚拟化是数字贸易的显著特征，具体表现为要素虚拟化、交易虚拟化和传输虚拟化三个方面。首先，数字贸易产品或服务使用数字化知识与信息进行资源配置、组织生产；其次，数字贸易的交易过程在虚拟化的互联网上完成，结算方式也可使用虚拟化的电子支付；第三，数字贸易所交易的产品与服务的传输也可以通过虚拟化方式进行。目前，交易虚拟化特征在中国日常交易中已十分普遍。2018 年，全国网上零售总额突破 9 万亿元，其中实物商品零售额 702 亿元，同比增长 25.4%，贡献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的 45.2%，势头迅猛。

二是平台化。在数字贸易领域，互联网平台的作用比传统贸易环境下更为凸显。作为市场化的经济资源协调机构，互联网平台既是供给方汇集经济数据、整合经济要素和创造价值的枢纽，也是消费者发现需求、满足需要的便捷场所。平台化的数字贸易已经具备市场的功能，成为一种新的市场形式。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终端的普及，这种平台化的市场形式扩展迅速，一些电子商务平台正在替代传统商业模式而成为商务潮流。

三是集约化。依托数字化快速传输信息，厂商能够实现从研发、设计、采购到营销、

^①马述忠、房超、梁银锋：《数字贸易及其时代价值与研究展望》，《国际贸易问题》2018 年第 10 期，第 16～30 页。

售后服务各环节的集约化管理，从而对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要素进行集约化配置。特别在交易环节，卖方更方便把有关自己企业、产品的信息集中发布在网络平台，消费者也可以通过成为会员等方式将自己的信息发布给对方，以争取优惠的机会。这有助于消除信息不对称，提高市场效率。

四是普惠化。数字贸易这一商业形态的普惠化主要来自于数字技术的普遍应用。互联网的普及不仅增加了小微企业、自然人和各类消费者的交易机会，在全球范围内拓展交易空间，还能让他们通过信息沟通提高市场能力，从而得到在传统交易下难以获得的盈利空间。根据阿里研究院的数据，2018 年国家级贫困县在阿里的平台网络销售额超过 630 亿元，超过 100 个贫困县的网络销售额达到或超过 1 亿元。

五是个性化。数字贸易的普惠化特征大大增加了处于弱势的市场行为主体参与市场和获利的机会，也让在传统交易条件下受到抑制的个性化需求获得越来越多关注，而那些大批量、标准化的生产方式和以产定销的推销方式更加式微。由于信息的可获得性增加，厂商也更有条件为数量众多的最终消费者提供个人定制化的产品，定制化生产成为厂商组织生产的发展趋势，也构成厂商竞争力的关键内容。如长尾选品（销量小但种类多的产品或服务）的销量增长明显。《2017 中国互联网消费生态大数据报告》显示，色彩丰富的商品比单一色系的商品更受消费者的青睐。此外，随着消费者个性化需求日益提升，定制市场高速发展，消费者人数和金额近两年均保持两位数高速增长，在互联网购物发展的背景下可定制物品也越来越丰富。

六是生态化。数字贸易要求各利益相关方遵循契约精神，相关的平台、卖方、买方、第三方服务以及政府部门等，要形成平等协商、沟通合作、资源共享、互利共赢的经济生态体系。

二、中国数字贸易发展现状

2019 年 5 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数字中国建设发展报告（2018 年）》显示，2018 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 31.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1%，占 GDP 的 34.8%。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数字贸易的迅速发展为中国经济贡献了巨大的价值。2019 年 3 月 22 日，全球化智库（CCG）与韩礼士基金会（Hinrich Foundation）发布的《数字革命：中国如何在国内外吸引数字贸易机会》报告指出，数字贸易通过数字技术提高员工生产力、降低成本、创造新收益。同时，报告指出数字贸易在中国国内已创造了高达 3.2 亿元（4660 亿美元）的经济效益；若不考虑国内外数字贸易壁垒的影响，到 2030 年，这一数字将达到 37 万亿元（5.5 万亿美元）。

2017 年，中国数字出口约 1.6 万亿元（2360 亿美元），成为中国第二大出口行业；到 2030 年，这一数字将达 5 万亿元（7260 亿美元）。若将数字商品和服务视为一个行业，它将成为中国出口的第二大行业。因此，数字贸易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重要，其中构成数字贸易重要内容的电子商务、数字出版业和数字技术发展迅速。

（一）电子商务成为数字贸易最集中的表现形式

近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电子商务发展，不断推动创新和深化改革，为电子商务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深入实施“互联网+流通”行动计划的意见》，商务部、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会同有关部门推出《电子商务“十三五”发展规划》《促进电子商务发展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16—2018 年）》，财政部、海关总署和税务总局联合出台《关于完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等相关政策文件，为发展电子商务提供方便和动力。特别是《电子商务法》的正式实施，对维护电子商务持续健康发展、鼓励竞争创新及合规经营和保护消费者权益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商务部数据显示，2018 年中国电子商务交易规模达 31.63 万亿元，较 2017 年增长 8.5%（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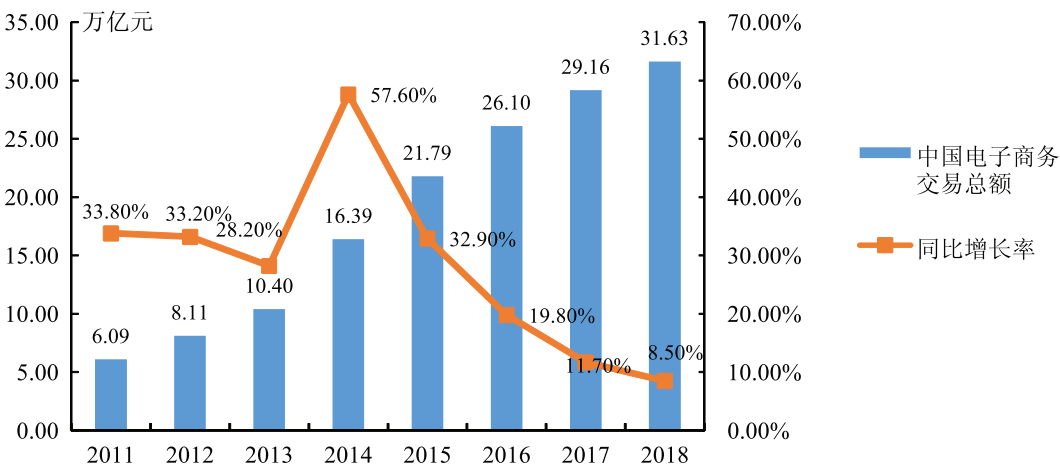


图 2 2011—2018 年中国电子商务交易总额及增长率

数据来源：商务部，《中国电子商务报告 2018》2019 年 5 月 29 日；《2018 年全国电商交易额增长 8.5%》，《中国信息报》2019 年 2 月 21 日。

同时，跨境电子商务在对外贸易中占重要地位。根据海关总署统计数据，2018 年中国跨境电子商务进出口总额 1347 亿元，其中进口额为 785.8 亿元，出口额为 561.2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49.27%、38.86%和 66.78%。2015—2016 年，尽管中国的货物进出口总额下降，但跨境电商却在逆势增长（图 3）。2016 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 24.33 万亿元，

同比下降了 0.9%；其中，跨境电商交易总额（包括 B2B 和 B2C）为 6.30 万亿元，较 2015 年的 5.10 万亿元增长 23.53%，占货物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从 20.77% 增加到 25.89%。此外，2017、2018 年虽然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额的增速有所下降，但仍高于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的增速，跨境电商已经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增长的重要内容与动力。由于中国制造业在成本和规模上具有比较优势，“世界工厂”的地位决定了目前中国跨境电商以出口为主。跨境电子商务出口的主要目的国包括美国、俄罗斯、法国、英国、巴西以及加拿大等国家。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推进，中国跨境电商势必迎来更多机遇。“一带一路”沿线 60 多个国家占全球总人口的 43.4%，贡献了全球 16% 的 GDP，贸易总额占全球贸易总额的 21.7%。“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口基数大，随着沿线网络和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形成，势必使得沿线国家的数字贸易大幅度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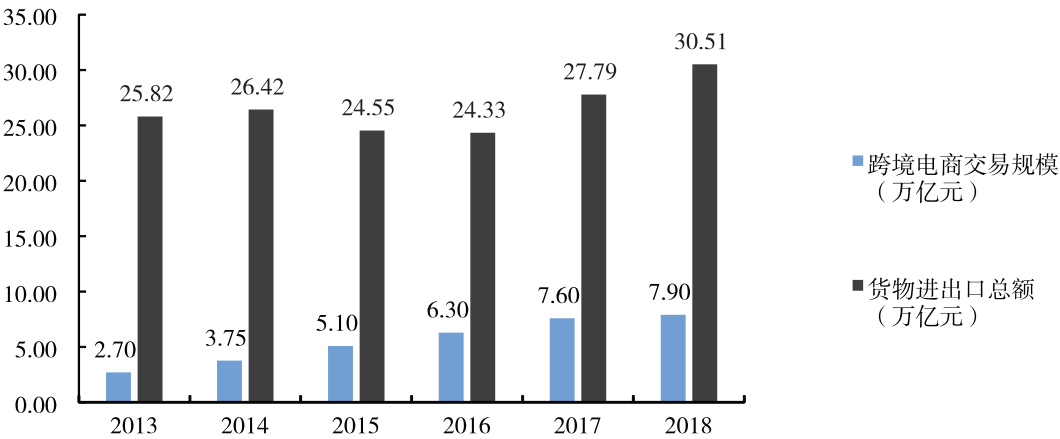


图 3 2011—2018 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跨境电商交易额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电子商务交易平台调查公开资料整理而得。

（二）数字出版收入稳步增长

根据《2017—2018 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的数据，中国数字出版行业规模稳步增长，2018 年收入超过 7000 亿元，其中收入最高的三个行业是互联网广告、在线教育以及网络游戏。首先，互联网广告增长迅猛。据中关村互动营销实验室发布的《2018 中国互联网广告发展报告》，2018 年中国互联网广告总收入达到 3694 亿元人民币，增长 24.2%，占 GDP 比重约为 4.2%，上升 0.6%。这显示了互联网创新营销不仅为广告主找到了更有利于增长的发展模式，还引领着新消费需求的崛起。其次，数字学习发展快速。在线教育或称远程教育、在线学习，一般指一种基于网络的学习行为，与网络培训概念相似，是通过应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科技实现内容传播及快速学习的方法。近几年，中国在线教育行业的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据艾瑞咨询的《2018 年中国在线教育行业发展研

究报告》，2014 年中国在线教育行业市场规模仅 998 亿元，2018 年已增长至 2046 亿元，其年复合增长率达 20%。再次，数字游戏规模快速扩张。2018 年中国游戏产业生态进一步扩大，业务收入达 1948 亿元。截至 2018 年 12 月，中国网络游戏的用户规模达到 4.84 亿人，占整体网民的 58.4%，同比增长 4224 万人；手机网络游戏的用人规模达到 4.59 亿人，同比增长 5169 万人，占手机网民的 56.2%。

（三）依托数字技术的数字贸易成为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新趋势

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传统服务业的深度融合，能够显著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提高传统服务业的可贸易性。以往服务贸易主要凭借从业人员的经验来判断客户需求，现在可以凭借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分析客户行为，实现精准营销。随着服务业可数字化程度的提高，数字贸易已成为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新特色、新趋势。根据商务部研究院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 2018》，随着中国网络游戏行业的崛起，越来越多企业开始走出国门，或与脸书、谷歌商店等海外机构建立了稳定的国际合作框架，或通过自建平台、收购等方式开展海外布局。数据显示，2018 年中国自主研发的网络游戏在海外市场销售收入 95.9 亿美元，同比增长 15.8%（图 4）。与此同时，在线出境游、数字音乐等新业态出口规模也在迅速扩大。2018 年，中国在线出境游市场规模达到 11345 亿元（图 5），增长 36.92%。数字音乐方面，据国际唱片业协会（IFPI）的《2019 年全球音乐产业报告》，中国继 2017 年首次进入全球前十大音乐市场后，2018 年排名攀升至第 7 位，实现了短期之内的快速增长。报告同样显示，在全球音乐产业收入中，数字音乐收入占据 58.9% 的份额。而中国音乐市场的繁荣也离不开数字音乐的助推力，根据艾瑞咨询所发布的《2019 年中国数字音乐产业研究报告》，20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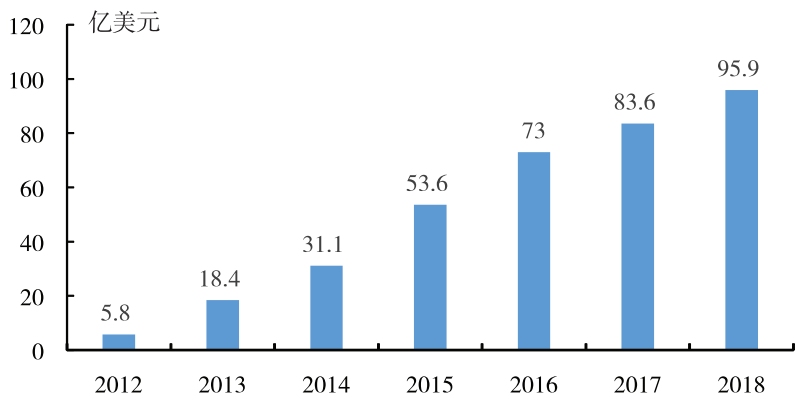


图 4 2012—2018 年中国自主研发网络游戏海外市场规模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中商产业研究院研究结果整理而得。

年中国数字音乐市场规模已达 76.3 亿元，同比增长接近 60%，是市场商业化复兴的体现（图 6）。因此，可以预见，受技术进步推动，未来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空间将更加广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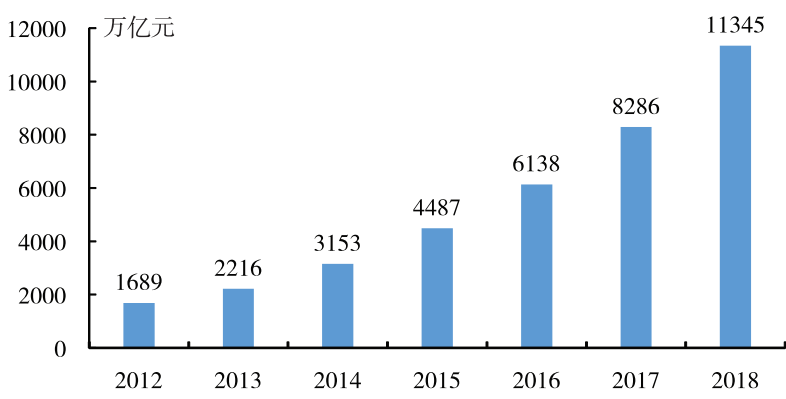


图 5 2012—2018 年中国在线出境游市场交易规模

数据来源：国家文化和旅游部、艾瑞咨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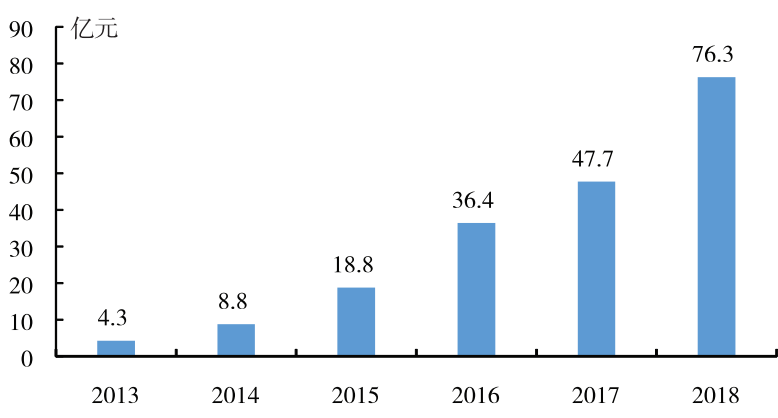


图 6 2013—2018 年中国数字音乐市场总收入规模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中商产业研究院公开资料整理而得。

三、中国数字贸易发展面临的问题

第一，目前中国数字贸易的发展水平不高，综合竞争力较弱，因此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较弱。相比于美国的数字贸易发展水平，中国尚处于起步阶段。具体而言表现为：中国的数字贸易企业并未形成以主导产业为领军的高质量发展状态，存在从事数字贸易的企业规模大而业务小的发展矛盾；数字贸易各个领域存在失衡现象，数字化内容、搜索引擎、社会媒介和其他数字产品发展参差不齐，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在核心技术发展方面仍有较大的短板和缺陷。目前，中国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多基于对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改造，核心技术和核心零部件、核心装备基本受制于人。受高

端芯片等核心技术和零部件制约，中国数字贸易发展面临一些不确定性。由于国际竞争力较弱，中国在全球数字贸易中只能被迫适应国际规则。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关注数字贸易并对其进行界定和制定规制的国家。目前，美国和欧盟等发达经济体已签订或在协商签订双边（多边）数字贸易协定。中国在电子商务领域具有一定优势，但把国内标准上升为国际规则的工作还任重道远。

第二，支撑数字贸易发展的基础设施和技术、人才相对缺乏。一方面，中国电信基础设施建设仍需加强。多数边远贫穷农村区域的互联网尚未推广和普及，村民也未普及互联网知识；而城市互联网虽普及率高，但互联网速度的提升、互联网信号的稳定性和服务硬件及软件的升级等方面还有较大改进空间。另一方面，相关人才缺失明显。数字贸易需要一批掌握技术创新能力和管理知识的新型人才，而中国在这一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此外，在政策支持力度方面也存在较大的拓展空间，有关数字贸易发展所需的技术资金投入、配套财税政策和技术创新机制等都欠有所欠缺。

第三，有关数字贸易领域的法律监管和规制措施尚需健全。数字贸易的产品服务最突出特点是通过互联网虚拟化的方式达成交易，在本质上存在无形的特性，个人及企业之间可以非常容易地通过国际互联网达成数字贸易的交易，但这个过程的相关行为监管和法律规范却难以同步跟进。目前，中国在数字贸易有关领域的法规体系不够完善、健全。关于数据收集、整理和数字产品的生产、存储、传输、使用等环节，以及隐私、商业秘密和知识产权保护等的相关法律法规多有不足。同时，在数据存储、处理等方面与美欧日等国家的规则也有不同，增加了参与数字贸易相关国际规则协商的难度。数字贸易领域的规制非常重要。一方面，数字贸易和服务贸易都发展迅速，20 年后世界贸易将形成 1/3 货物贸易、1/3 服务贸易、1/3 数字贸易的格局，需要及早布局，抢占发展制高点；另一方面，数字贸易涉及国家安全，要有底线思维和风险防范措施，无论制定国内规则还是参与国际谈判，都不能忽视数据流动尤其是跨境流动带来的潜在风险。

第四，国内关于数字贸易的统计制度有待完善。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对数字贸易统计方面都做了细致划分，对数字贸易相关的经济数据统计也做到了及时追踪和更新。相比之下，中国的数字贸易统计工作还需要提高重视程度。国内并没有按照国际标准将数字贸易的四种类型进行明确的统计归类，相关统计数据的追踪和更新严重缺失，基本不存在具体的数字贸易四大类口径的统计数据。由于数字贸易的统计数据还存在内容划分不清、职责不明确和数据连续性不强等问题，难以形成系统性、权威性的准确数据，造成对数字贸易的具体情况难以把握和判断，更不易进行宏观管理。

四、促进中国数字贸易发展的有利因素

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5G 时代已经来临，全球信息呈指数性扩张，行业竞争更趋激烈，传统商品大量过剩。在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新时代，数字经济以其高速增长、快速创新的鲜明特征，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数字贸易的突飞猛进已引起中国相关行业的普遍关注，三次产业都受到数字化的深刻影响。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等利益相关方都参与到这一场变革中来。

在国家层面，政府重视数字贸易的发展，利好政策相继出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相继出台《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和《“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等重要战略规划，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高速进展，数字中国建设成效显著。截至 2018 年底，中国光缆长度 4358 万公里，全国所有地市基本建成光网城市。用户规模稳居世界第一，截至到 2018 年年底，中国境内互联网用户达到 8.29 亿人，互联网网络的普及率达到 59.6%（图 7、图 8），互联网用户规模和普及率都得以稳定增长。同时，在网络用户中使用移动手机用户的比例在 2018 年年底达到 98.3%（图 9），随着移动 5G 网络的普及，将使得人们日常上网形式进一步向移动端集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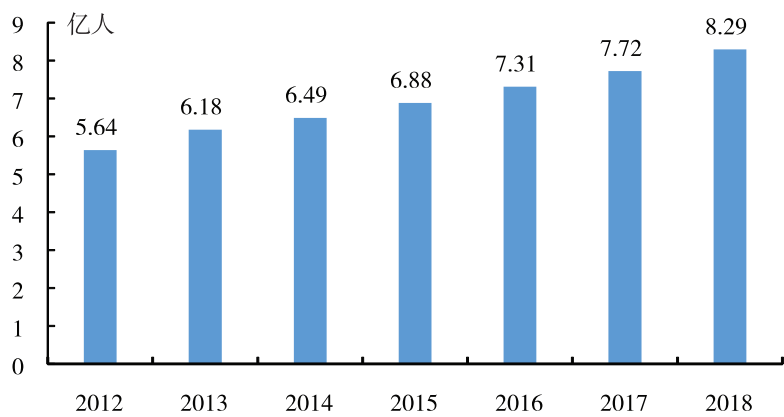


图 7 2012—2018 年中国网民数量变化

数据来源：《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与此同时，国务院相继出台《中国制造 2025》《关于进一步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持续释放内需潜力的指导意见》《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国家有关管理部门共同出台《关于促进分享经济发展的指导性意见》等政策文件。日益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和国家大力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为信息通信技术与传统产业的加速融合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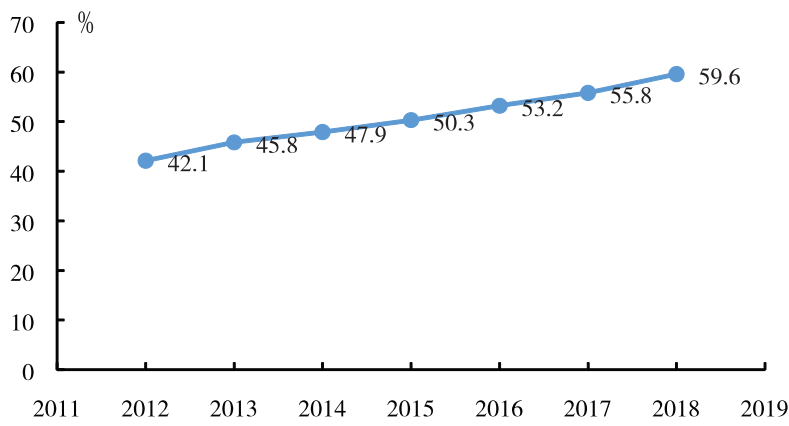


图 8 2012—2018 年中国互联网普及率变化

数据来源：《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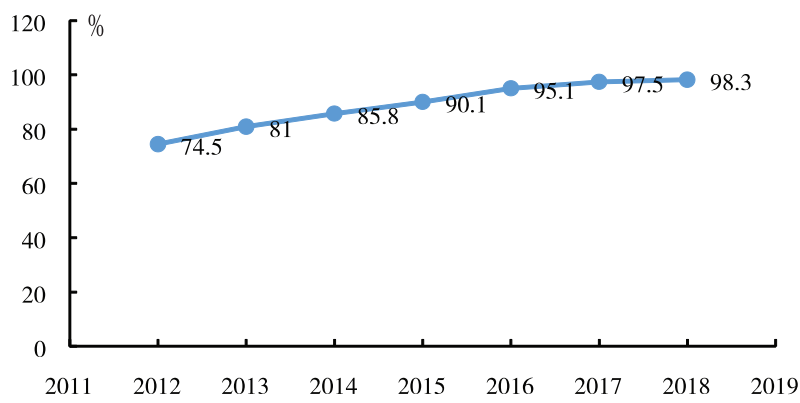


图 9 2012—2018 年移动网络占总网络比例变化

数据来源：《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由于数字贸易发展时间短、速度快，加之发展模式多样，使得社会各界对数字贸易的认识不一。目前，中国较为关注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互联网和移动通讯设备不断普及，加上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为包括跨境电商在内的数字贸易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广阔的发展空间。数字贸易的发展，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是基础，企业用户和个人用户是交易主体，数字贸易拓展的内容和范围与互联网用户密切相关。由此可见，庞大的互联网用户尤其是移动用户规模为中国数字贸易的发展提供了良好健全的平台和载体。

五、中国数字贸易发展的策略选择

首先，政府部门需像重视传统贸易一样，高度重视数字贸易的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相比，中国数字贸易在核心技术创新、企业业务规模和主导产业形成等方

面还存在较大差距，整体发展水平落后于世界水平。应加大支持力度以使数字贸易形成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数字产业并产生相关的主导产业部门；同时，需加快制造业、服务业各领域与数字技术进一步融合，逐步提升经济的数字化水平，通过数字技术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抓住新一轮科技进步实现高质量发展。

其次，加大对数字贸易的政策支持，为数字贸易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优良的土壤环境。具体而言：一是应把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与传统基础设施同样重要的基建公共品，在农村广泛推广普及互联网，在城市注重提升互联网的速度、及时升级改造互联网服务硬件及软件。二是研究制定针对数字贸易企业的优惠政策，包括财税政策、技术创新政策和人才政策，国家支持对核心技术、核心零部件和关键设备的研发，提升数字贸易企业技术创新和技术应用能力。三是支持对外开放平台如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港和服务贸易创新试点城市以及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积极探索发展数字贸易的路径和模式，先行先试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并将较为成熟的经验逐步向全国推广。

再次，逐步完善对数字贸易的监管措施。以法律形式规范数字贸易技术标准和相关规则，同时纳入海关监管范围，使中国数字贸易有序快速发展。力争做到相关监管措施既能对数字贸易的国际发展形成保护功能，又要对数字贸易中存在的暗黑违法行为给予有效监督和严厉打击，杜绝数字贸易过程中出现的例如洗钱、侵犯知识产权等违法行为。

参考文献：

1. 世界银行：《2016 年世界发展报告：数字红利》，世界银行官网，2016 年 1 月 13 日。
2.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数字全球化：全球信息流的新纪元》，2016 年。
3. 夏杰长：《数字贸易的缘起、国际经验与发展策略》，《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5 期。
4. 来有为、宋芳秀：《数字贸易国际规则制定：现状与建议》，《国际贸易》2018 年第 12 期。

责任编辑：李 蕊

· 宏观经济 ·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的制度障碍与政策建议

王佳元

摘要：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是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也是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创新的重要推动力。随着两业融合范围不断扩大、程度不断加深，在市场准入、信息共享、行业标准和监管及政策设计等方面也暴露出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为加快推进两业的深度融合，本文在分析比较制造业与服务业政策差异的基础上，探讨了两业融合发展所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并提出了搭建两业融合发展平台、优化相关制度环境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先进制造业 现代服务业 两业融合 制度障碍

作者简介：王佳元，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服务业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随着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等广泛应用于服务业和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出现了明显的渗透、互动、融合等现象。这种产业间以及产业内部行业间的融合发展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新的趋势之一，并成为产业结构升级及产业创新的重要推动力。我国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拓展的范围越来越大，融合程度不断加深，在新产业成长、新业态新模式发育、人才培育、技术创新、治理体系优化等方面均取得较大进步。但由于思想认识、制度安排、发展路径、政策设计等多方面原因，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政策仍存在较大差异，两业深度融合也面临着一些体制机制障碍，需要用改革开放创新的举措加以破解消除。

一、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差异

概括而言，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政策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

（一）财税政策

我国是制造业大国，现行的财税制度设计仍带有浓厚的工业经济色彩。“营改增”前服务业重复征税的现象比较多，税负相对较重；“营改增”后，现代服务业由于缺少进项抵扣，享受到的财税优惠相对有限。一是普惠性的减税政策现代服务业受益不明显。现代服务业大多人力、智力资源密集，“轻资产”现象比较普遍，“营改增”后部分成本和进项无法抵扣，客观上会加大综合成本。因此，尽管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出台了《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规定“自2019年4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允许生产、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加计10%，抵减应纳税额”，但调研中发现，会计、法律、租赁、保理、研发设计、信息服务等智力密集型服务企业仍普遍反映减税力度不够，税赋还是偏高。二是现代服务企业获取财税优惠的难度较大且方式较为单一。针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偏向于工业企业，对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的认定需同时符合多方面的条件，标准偏高，导致大批服务企业难以享受优惠政策。现代服务企业也较难享受延期纳税、投资抵免、提取投资准备金等税基式间接优惠方式，税收政策基本局限在税率降低、税额减免等直接优惠方面。目前，按照我国税法规定，个人独资企业可以不交企业所得税和分红税，只缴纳个人所得税。这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享受核定征收所带来的税收优惠政策，但是对合伙制等智力密集型服务业激励力度还明显不够。

（二）用地供给政策

我国城市建设用地标准未单独设立生产性服务业用地门类，没有国家层面的规划用地技术标准体系对生产性服务业做出详细的概念界定与用地类型划分，也没有建立既体现公正公平土地受让原则，又鼓励支持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土地出让价格测算标准。因此，在实际操作中生产性服务业项目的用地类型往往根据用途、位置等因素确定为工业用地或商服用地，其出让价格则参照相应类型执行。一是按照商服用地获取土地的生产性服务业项目，其土地价格远高于工业用地。根据自然资源部数据，2019年第一季度全国主要监测城市商服用地价格为7665元/平方米，工业用地价格仅为841元/平方米，商服用地与工业用地价格比为9:1。服务业各行业产出效益差异较大，不少行业盈利能力并不高，相差9倍的工业和服务业用地价格导致部分服务行业的土地价格与盈利能力极不匹

配。二是按照工业用地获取土地的生产性服务业项目又往往受限于设计规范。受制于开发强度控制、建筑空间设计、配套设施建设等规范要求，难以满足相关生产性服务业的实际需求。三是生产性服务业用地优惠不易兑现。2014 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指导意见》提出，经依法批准，对提高自有工业用地容积率用于自营生产性服务业的工业企业，可按新用途办理相关手续。但目前经营性用地用途调整一般需由政府进行土地收购储备，按照新规划的用途和指标以招拍挂方式重新公开出让。这种方式对于一些自身已具备转型发展服务业要求的企业来说，面临土地招标竞争导致的高额土地出让金付出或失去项目土地使用权的风险，使得许多存量工业用地事实上通过各种变相形式自行改变用途发展服务业，扰乱了正常土地市场秩序。

（三）融资政策

与工业企业相比，生产性服务业中小企业缺乏融资手段，融资能力较差，融资方式和有针对性的金融产品更加有限。从企业自身融资能力看，绝大多数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规模较小，自有资金较少，自身积累不足，抗风险能力较弱，且行业性质决定了其“轻资产”的特征，企业资产更多表现为无形资产，加之信息不对称、资信水平较低等原因使其缺乏长期融资担保，难以满足商业银行信贷标准的要求，也难以在股票、债券等资本市场获得融资。从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看，经过多年实践，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企业土地或厂房等固定资产价值的评估方法已比较成熟，程序也比较规范，但对服务业企业，特别是智力密集型服务企业无形资产价值评估的创新不足，至今缺乏合理的价值评估体系，导致适应生产性服务行业特点的金融产品较少，难以满足企业融资需求。

（四）水电价格政策

2007 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进一步推进服务价格体制改革，完善价格政策，对列入国家鼓励类的服务业逐步实现与工业用电、用水、用气、用热基本同价。经过多年的价格管理体制和形成机制改革，我国服务业与制造业要素成本差距过大的问题得到很大程度缓解，商业用水、用电、用气价格已大致与工业并轨，但不少地方一般工商业用电仍高于大工业用电。如北京城区和郊区用电除了低谷时段，在其他不同电压等级、不同时段情况下，一般工商业电价还显著高于大工业用电。在水价方面，除特种行业外，商服用水和工业用水同属于非居民用水，大多享受同一个价格标准。气价方面，除居民用气和供热用气外，其余同属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气类别，也是同一个价格标准。

二、两业深度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经过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近年来我国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制度壁垒大幅消减，但在市场准入、信息共享、行业标准和监管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体制机制障碍，制约着两业的深度融合。

（一）显性隐性市场壁垒依然存在

我国服务业开放仍然不足，在经合组织（OECD）发布的外商投资限制指数的 68 个国家中，2017 年我国排第 4 位，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外资准入限制较严格的主要是银行、保险、证券、电信、医疗、教育、文化等服务行业。部分领域依然存在行政性垄断，对外资和民企采取准入资格、股权比例、业务范围等限制性措施，市场化机构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受到挤压，造成相关行业服务价格虚高而服务质量却不能满足消费者需求。在政府补贴方面，国企相对于民企和外资也处于优势地位，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市场公平竞争。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2018 年我国营商环境跃升至 46 位，进步巨大，但在办理施工许可、获得信贷、纳税、执行合同、破产办理、劳动力市场监管等方面与发达经济体还有一定差距。

（二）数据信息垄断和条块分割严重

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发展引领的两业融合后所产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数据越来越有价值，并成为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的核心资源及生产要素。但受行政体制、条块分割、利益分配、法律法规等因素影响，目前普遍存在数据信息不能流通共享、信息资源碎片化严重、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不充分等问题。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信息资源市场不完善，拥有数据资源的单位与企业视数据资源为自己的“垄断资本”，数据公开和共享的动力不足，大量信息系统中的历史数据长期闲置。由于数据不能共享流通，也导致“各起炉灶”、各搞一套、重复建设现象严重，造成很大财力物力浪费和规则标准混乱，这又进一步阻碍了信息资源的整合利用，制约了两业融合深度发展。

（三）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多头管理与监管真空并存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催生了许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这些新经济在发展初期，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难以保证，产业化、商业化的基础不够牢固，与之相匹配的社会环境、法律制度环境、伦理道德环境尚未形成，而其内涵和内容在不断变化，

新的经济形态和新的需求会不断产生，往往使得管理部门难以及时回应或反应过度，给行业管理和市场监管带来挑战。一方面，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容易造成监管缺位。近年来，在服务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领域出现了一系列负面事件，市场摩擦争端加剧，公共事件频发，与管理缺位和不到位有很大关系。另一方面，现有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有时又会导致政出多门、多头审批、交叉执法等现象，监管过度使得处于萌芽阶段的新生态缺少成长“观察期”，妨碍其发展壮大。

（四）行业标准及规范建设相对滞后

法律法规方面，部分生产性服务行业存在国内标准与国外标准、国家标准与地方标准不能对接，甚至相互矛盾的问题。一些行业规范和标准内容过于简单，对企业约束力不够，特别是针对日新月异、快速发展的新产业、新业态，更是普遍缺乏与之适应的监管方式和政策体系，与行业发展需要不相适应。信息化方面，众多企业由不同系统服务商建设了大量信息化业务系统，但缺乏相应的接口标准和规范，导致相互之间无法进行信息共享和业务集成，不能满足跨界融合、创新发展的需要。信用体系方面，相关法律法规比较零散，失信惩戒和守信激励机制不够健全，各类失信行为的失信成本偏低，尤其是互联网、电子商务、快递等领域个人隐私保护力度不足，隐私信息泄露问题严重。

（五）统计评价体系有待完善

随着技术不断进步及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数字经济、共享经济、智能经济、创意经济、绿色经济等加速发展，成为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促进两业深度融合、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各地为抢抓发展先机，纷纷出台政策措施强力推动，如成都重点发展共享经济、数字经济等六大新经济产业形态，杭州力推“数字经济”发展，上海、天津、重庆聚焦智能制造产业等。这些由技术进步和两业融合形成的新经济作为新生事物，技术迭代快，跨界性、复合型特征明显，对其内涵和外延的认识不尽一致，目前还未能建立统一的分类体系和规范的统计标准，导致各地数据难以比较，容易造成分析研究和政策导向偏差。国家层面，尽管统计部门已建立了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三新”经济的统计调查制度，并发布了有关测算数据。但是由于时间较短，尚未形成连续的统计数据，尤其是按此标准的各地统计数据比较缺乏。

三、推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深度融合发展的改革思路和政策建议

目前，全球科技革命正在掀起新一轮产业变革浪潮，我国大力推动新旧动能转换，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得到空前重视，应尽快优化相关制度环境，搭建两业融合发展平台，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向更广领域、更深层次融合发展。

（一）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第一，建立平等、规范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全面实施并完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适时调整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进一步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推动落实“非禁即入”。允许外资先进制造企业和现代服务企业依法平等进入负面清单以外的业务。弱化事前管理，减少审批事项，优化审批流程，规范审批行为。加大服务业领域开放力度，减少结构性政策，推行普惠性政策，特别是要打破金融保险、电信通讯、铁路运输、信息等生产性服务业进入的壁垒。除涉及国家安全外，各类服务领域对各种所有制企业开放，促进生产和服务要素自由流动，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健全非营利性医疗、养老等机构出资人合理回报制度，对不能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的民办非企业单位要以奖励或合同规定的固定收益等方式允许出资人获得合理回报，彻底解决“准入不准营”和“准入不准盈”问题。

第二，破除两业融合发展中的各类显性隐性障碍。对现有审批和许可事项逐一深入论证，清理废除妨碍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各种规定及做法，适度放宽相关的许可证制度，突破一些不利于产业融合的有形无形的行政性垄断和区域壁垒，吸引社会资本发展专业化、高端化现代服务业。对一些以备案、登记、行政确认、征求意见等为名的变相审批和许可事项，要尽快加以整改。着力打破现有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对金融保险、电信、部分交通运输等垄断性服务业，重点推进准入方式、监管体制等体制机制方面的综合配套改革。清理规范各类前置审批和事中事后管理事项，明确确需保留事项的审批主体、要件、程序和时限，并向社会公开。继续推进商事制度改革。除特殊规定外，禁止设置限制服务企业跨地区发展、服务跨地区供给的规定，纠正各种形式限制、歧视和排斥竞争的行为。

第三，促进两业融合发展的政策融通。进一步推进制造企业主辅分离，放宽制造企业、拓展服务业务的准入门槛，探索以主营许可等方式解决跨行业经营的资质问题。鼓励产业、行业业务交叉和延伸发展，消除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在用地、税收、科技创新、金融、要素价格等方面的不合理政策差异，完善优化财税制度政策。涉及城市发展和公共服务的现代服务业用地，可以列为城市公共服务或公共设施用地，将用地规模、比例及布局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市空间规划等，合理划定用地比例和年度用地指标。允许制造业企业现有存量土地使用类型变更为促进产业融合发展的服务业用

地，并享受工业用地的相应政策，打通融合发展梗阻。鼓励制造企业将非核心业务流程外包，支持骨干、龙头制造业企业向服务型制造转型，发展成系统方案解决的总承包、总集成供应商。深化事业单位改革，加快研发、教育、培训、法律咨询等单位改制，支持具备条件的科技企业孵化器、检验检测认证、生产力促进中心等机构与行政部门脱钩、转企改制，推动建立一批第三方的研发机构、物流企业、节能环保企业等。鼓励在规模、信誉和服务质量上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性服务企业实施跨行业甚至跨地区兼并重组，拓展延伸产业链，发展个性化定制服务、网络精准营销、融资租赁、全生命周期管理等商业模式，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实现良好互动契合。

第四，创新政府监管方式手段。对于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采取包容审慎监管态度，给予其发展成长“观察期”，既不一上来“管死”，又严守安全底线。探索由细则性、事后处罚式、行业归属性监管向触发式、事前指导式、功能性监管转变，并在分类监管、柔性执法、多元治理等方面探索创新，以建立容错机制，包容属于发展初期的新生业态。只要不触及安全底线，就采取包容态度；一旦出现坑蒙拐骗、假冒伪劣、侵犯知识产权等行为，就坚决依法严管。适当放宽新经济领域的准入条件和企业设立门槛，建立健全基于大数据的科学决策、社会治理和市场监管机制，构建审慎包容的数字经济治理新模式。加强人工智能、生命科技、大数据等领域的相关伦理和社会问题研究，探索建立符合未来科技产业发展规律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监管体系。

（二）进一步扩大开放合作

加快建立开放合作平台，鼓励龙头企业、骨干企业、平台企业等“走出去”，将一些业务流程转移到海外，建立面向全球的开放式制造服务网络，在全球范围内优化布局研发中心、生产基地、物流基地、营销中心，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合作。把握国际服务产业转移的机遇，引导制造企业和服务企业增强核心竞争能力，取得国际认可的生产和服务资质，积极承揽国际工程项目，承接跨国公司外包的业务流程，带动中国装备、技术、标准、认证和服务“走出去”，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在开放竞争中拓展空间、提升水平。搭建多层次国际交流平台，发挥重点行业优势，大力发展电子商务、现代物流、工业设计、科技服务、节能环保等产业，积极开展招商引资、引智推广融合发展模式。通过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产业布局，实现跨境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从而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合作共赢，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

（三）支持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

第一，加大资金扶持。设立由政府引导、多方参与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

融合的专项基金，对融合发展的重大项目、重点工程、载体平台、品牌标准、改革试点等给予支持。加大对融合发展的重大共享关键技术和产品研发的支持力度，重点突破一批服务型制造核心技术，让优质的生产要素流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形成良好的融合生态。细化深化专业分工，鼓励生产制造企业改造现有业务流程，推进业务外包，加强核心竞争力，同时加快从生产加工环节向自主研发、品牌营销等服务环节延伸，降低资源消耗，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实现专业化细化分工条件下的两业融合发展。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畅通科技成果转移和转化渠道，加快研发成果转化为产业和实际运用的步伐。充分发挥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内部实验室的科技优势，鼓励支持应用高新技术、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着力破除制约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的技术瓶颈。

第二，强化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在两业融合中的应用。当前，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科技手段更加深刻地影响着我国两业融合发展。近期应积极推动先进制造业生产模式、组织模式、商业模式、管理模式等转变，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推动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工业互联网、工业物联网、智能制造的快速发展，大力发展数据驱动型服务、大规模个性化定制服务、产品全生命周期服务。加强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特别是对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创新保护，以适当的激励机制引导权利人共享创新成果，构建科学合理而有效的现代化知识产权制度。

（四）促进数据、产能、平台的开放共享

支持建立一批适合融合发展的共性技术研发平台、公共服务平台、大数据平台，搭建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对接平台”，优化服务体系，创新服务手段，促进产业融合。推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检验检测机构等各类创新平台对外开放，提升科研平台社会化程度。大力推动政府部门数据共享、公共数据资源开放、公共服务资源分享，建立数据开放共享和交易机制。鼓励企业、高校、科研机构成立产业联盟，通过共同研发、成果转化、共有品牌、统一营销等方式，分享人才智力、仪器设备、实验平台、科研成果等创新资源与生产能力，形成资源共享、信息互通、优势互补的互动发展格局。支持企业产能共享，鼓励传统制造企业利用共享经济开放资源和产能，打造协同生产或服务平台。

（五）建立适应融合发展的人才供给体系

第一，构建面向两业融合发展的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

合是建立在信息技术和知识基础上的融合，中高级人才资源对两业深度融合发展特别重要。应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培育壮大复合型、创新型人才队伍。适应两业融合发展趋势，促进教育改革、事业单位改革与产业融合衔接配套，激发事业单位活力，提高教育服务质量和效率。鼓励高等院校和职业院校面向市场需求增设交叉学科，特别是两业融合发展急需的专业。建立人才培养专业动态调整机制，适时调整优化相关课程体系设置，系统构建两业融合发展的人才培养方案，尽快培养大批具有融合战略观念、跨行业驾驭能力、较强综合素质的复合型人才。支持产业融合教学研究，探索建立以创新创业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机制，鼓励教师进行教学改革项目研究。引导国内外高端专业培训机构定向培训通晓国际商贸理念和规则、具有先进制造业背景的高级现代服务业商务人才。完善企业与高等院校联合培养人才的机制，建立相关领域应用人才实训基地，注重人才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培育，有针对性的培养掌握专门技术和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

第二，进一步创新人才引进、激励和评价机制。实施更积极、开放的人才政策，构建完善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引得进、留得住、流得动、用得好的政策体系。建立两业融合创新人才库，制定、完善人才吸引政策，广纳海内外优秀人才，特别是两业融合所必须的各类高端领军人才。鉴于高端人才往往以大量的培养培训投入为支撑，探索对高端人才实行培养培训费用加计扣除政策，鼓励人力资本投资，促进人才结构升级。突破现有人才管理评价制度，创新构建既能包容产业融合发展、又行之有效的人才评价机制。研究制定复合型人才职称评审绿色通道等政策，为两业融合、新产业新业态等人才群体提供专场评审。建立开放共享的高层次人才信息交流平台，通过联合办学、联办课程、参观互访、研讨交流等多种形式，加强复合型、创新型人才互动交流与合作，定期发布重点行业引才目录，实现两业融合人才供需信息的高效互通，为两业融合发展提供人才支撑保障。

（六）健全标准、统计、法律法规体系

按照国际惯例和通行法则，结合我国两业融合发展实际，制定适应融合发展领域的技术、流程、管理等标准，鼓励融合发展领域的龙头企业、骨干企业等主体参与相应行业应用标准制定。完善生产性服务行业标准体系，提高行业的专业化、规范化水平，扩大服务标准的覆盖范围，建立开放式的服务标准化格局。

第一，改革完善统计制度，制定、完善两业融合统计指标体系。进一步加强两业融合企业认定方法和指标体系研究，设计出台突出反映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如制造企业的服务业收入（房地产收入除外）占总收入的比重、生产性服务业增长率等

指标,拓展完善两业融合统计调查指标和分析评价指标。建立健全两业融合统计分类,创新两业融合调查方式方法,完善两业融合统计调查体系,探索开展服务型制造等概念术语、参考标准和评价体系研究制订及应用推广。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生成两业融合统计数据,将部门行政记录和大数据作为两业融合统计数据的重要来源。构建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的、科学合理的生产性服务业统计指标和评估指标体系,提供可靠、可比的官方统计数据。实施两业融合发展形势定期分析报告制度,定期进行统计监测和动态跟踪,为引导各级政府决策、建立考核体系等提供依据。

第二,健全完善促进两业融合发展的法律法规。推进两业融合发展的立法进程,加快制订修订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建立健全与两业融合发展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和公民诚信体系建设,建立健全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和联合惩戒机制,加强信用信息的公开与共享,积极推进诚信体系建设制度化。研究制定电子商务、互联网、大数据等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引导、规范、保障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

参考文献:

1. 财政部、税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商务部、卫生健康委:《关于养老、托育、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税费优惠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网站,2019年6月28日。
2. 国务院:《关于印发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的通知》,中国政府网,2016年8月8日。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2018年3月28日。
4. 安筱鹏:《制造业服务化路线图:机理、模式与选择》,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5. 王晓红:《对“三零”国际经贸规则的认识》,《国际贸易》2019年第6期。
6. 董崇黎:《发展现代服务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长江丛刊》2016年第15期。
7. 韩建飞、秦海林:《力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中国经济时报》2019年4月3日。
8. 沈岩:《互联网经济的政府监管原则和方式创新》,《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
9. 王小波:《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解构——基于行业差异比较视角》,《求索》2016年第12期。
10. 李俐娟、王剑锋:《生产性服务业用地规划管理的应对策略》,《规划师》2015年第5期。
11. 胡晶:《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互动融合发展分析》,《新经济》2015年第22期。

责任编辑:李蕊

· 名人观察 ·

怎样认识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回落

李德水

从 2010 年第四季度开始，我国经济出现增长速度逐季回落的现象。2011 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从 2010 年两位数 10.6% 回落到 9.5%，从 2012 年至 2016 年逐年回落，分别是 7.9%、7.8%、7.3%、6.9%、6.7%，2017 年略有反弹为 6.9%，2018 年又回落到 6.6%，2019 年上半年为 6.3%。为什么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跌跌不休”？发展趋势怎样？是国内各界和国际社会都十分关注的问题。这里谈三点粗浅的认识。

一是经济增长速度回落的必然性。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冲击，危机前的许多重大问题都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又爆发了美国国债危机和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世界经济处于艰难的调整期，美、欧、日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普遍增速回落，有的甚至处于负增长状态。这必然使我国也受到影响。从国内来看，即便是外需不存在问题，也不应继续维持能源、其他资源的高消耗和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高速增长。适度放缓增长速度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客观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上升的动力与下行的压力剧烈博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产业增长速度虽然比较快，但由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较低，尚不足以完全冲销经济下行的压力。据国家统计局分析，2018 年我国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增长速度高达 12.2%（现价），但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比重仅为 16.1%。加上 2018 年 3 月以来，美国挑起了中美经贸摩擦，必然给我国经济造成一定影响。比如 2019 年 7 月，2.9 万家对美出口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同比仅增长 1.5%，比上月回落 4.0 个百分点，企业对市场

前景有悲观情绪。

二是我国经济有条件实现长期平稳较快发展。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本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虽然 1979—2018 年年均增长 9.4%，但也出现过 1981 年只增长 5.1%、1989 年增长 4.1%、1990 年更是仅增长 3.8%的低谷。经过 70 年的发展，我国已经积累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和驾驭宏观经济的丰富经验；我国目前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工业化总体上由中级向高级阶段加速发展的时期，城镇化正在加快，乡村振兴战略大有可为；服务业发展方兴未艾；二、三线城市和县城的迅速成长必将迸发出巨大的消费潜力；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越来越突出，随着 5G 技术的推广和普及，数字中国和智慧社会的建成必将使劳动生产率及社会财富得到极大的提高。最重要的是，我们已经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坚信，中国经济一定能够保持长期平稳较快发展。

三是一个经济体的增长速度未必会随着规模的不断增大而逐渐减缓。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和质量好坏，与经济规模的大小没有必然联系，关键因素在于增长的动力和发展方式。例如，用 1 匹马拉小车，上面坐着 1 个人，可能跑得轻松愉快，但若坐上 4 个人，即总量翻了两番，还是用这匹马去拉，也许就跑不起来，只能慢慢行走了。如果用 4 匹马去拉，情况就不一样，或者索性改乘中国的复兴号高铁，即改变动力和运输方式，那么几百个人坐在上面却能跑出 350 公里/小时的速度，而且运行十分平稳，坐得非常舒服，从北京到上海只需 4 个小时，极大提高了效率和舒适度。这就是科技进步和转变发展方式的神奇力量。由此可见，一个经济体的增长速度未必会随着规模的不断增大而逐渐减缓，至少这不是一条铁的规律。那种情况只有在增长动力和发展方式都不变的情况下才能成立。

（作者为国家统计局原局长）

责任编辑：李蕊

抓住“一带一路”建设新机遇 打造内陆改革开放新高地

韩永文

自习近平总书记首倡和亲自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以来，在短短的六年时间里，世界各国响应者、参加者越来越多，“一带一路”建设迅速推进，发展成果令世人瞩目，在国际上所产生的影响始料未及。“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成为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新窗口和助推器，而且也成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携手共进，实现共赢共享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桥梁纽带，“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了新空间，为国际贸易投资搭建了新平台，为完善全球治理拓展了新实践”。

2019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指出，面向未来我们要聚焦重点、深耕细作，共同绘制精谨细腻的“工笔画”，推动“一带一路”沿着高质量发展方向不断前进。这为“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和工作着力点，要求将“一带一路”建设做细、做实、做精致，为中国的持续发展、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建设与发展、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新的空间和舞台。

我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 40 年。40 年的实践充分证明，改革开放是我国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十分重要的动力之源。推进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特别是推进高质量发展，更需要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之路。中国将会在全面巩固已有改革开放的基础上，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推进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更高层次的、协调性更强的开放，进一步创新区域协调开放的体制机制，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与区域开放发展有机融合，实现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

这里，谨就抓住“一带一路”建设新机遇，打造内陆改革开放新高地，谈几点观点和思考。

第一，统筹规划，综合协调，科学引导分布各类园区功能要素。西安市和全国许多

重大城市一样，拥有经开区、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咸新区、自贸区等，并且拥有欧亚经济综合园区，如何统筹协调、科学合理配置这些园区的经济和技术功能要素，发挥好各类生产要素配置的聚合效用与效率，形成各具特色的比较优势，是需要系统思考与谋划的。统筹规划、综合协调，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长足发展的特色，也是政府引导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成功经验。发挥好各类园区的特色，需要区分不同园区的功能定位，合理规划产业分工布局，推动形成内在有机联系、要素合理配置流动、公共资源共享、生产协同互补的契合式发展格局，避免规划孤立、体系分割、要素错配，以及竞争无序、交叉重复配置资源的情况。要通过统筹推进体制改革、机制创新，建立健全运行有效、遵从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协调机制，戒除脱离实际、主观盲动、分割内在经济联系以及画地为牢的自我发展；形成不同经济体之间经济功能互补，生产、流通、销售、服务分工互补，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契合发展的园区发展体系；建立公共信息共享、经济信息分享、公共资源平台共用的集约运营协调机制，打破阻滞要素流动，割据发展，无序纷争要素资源和盲目竞争的藩篱。

第二，统筹推进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打开国门搞建设已经形成我国改革开放的大势，更是我国融入国际市场政治经济舞台的必由之路。但是，相比之下我国的对内开放还有很多不足，在国内市场内部还存在要素流动不畅、地域间招商引资不良竞争等现象，通过非经济手段阻隔地区间投资活动和市场生产经营活动等问题还时有发生，这显示出国内市场对内开放还很不够。西安欧亚经济综合园区和其他产业园区距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较近，是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扩大开放的重要关节点，一头连接沿线国家的市场，一头连接国内东南西北市场。在这个关节点上，对外开放十分重要，对内开放同样十分重要。在深化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要统筹兼顾推进双向开放，坚持内资外资一视同仁，对外要放开市场准入，对内更要打破地区封锁，通过更高水平的对内对外开放，既吸引沿线国家和海外其他地区的各类要素资源进入中国市场，又吸引和聚集国内其他地区的要素资源流向陕西省、流向西安市、流向欧亚经济综合园区。比如，要研究如何用好西安市的陆航交通综合枢纽，“一带一路”商贸、物流中心枢纽和欧洲班列货物集散编组的区位优势及成本优势，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吸引东部和其他地区的企业投资，建设输欧商品出口生产加工基地和服务贸易基地等等。从而形成从单向开放转为双向开放，从区域性碎片式开放转为整体协同式开放。

再比如，在促进产能合作上，不能简单地将外需、内需隔离对立起来。应该树立开放统一的供给观和需求观，使内需外需发展相互促进，畅通内外要素资源，通过内外联动的市场化机制，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向沿线国家转移国内产能相对饱和但生产

技术、环境保护手段并不落后的产能，又在国内依托园区和教育、技术研发资源优势，加强新产品开发、技术研发基地建设等等。要进一步破除体制机制政策障碍，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进一步促进内外贸深度融合，鼓励外向型企业眼睛向内，开拓国内市场，积极引入国际先进的商业业态组织。

第三，加强产业支撑，发展高层次开放经济。对一个区域的经济的发展而言，没有产业和产业发展作支撑，没有高素质和较大数量人口集聚作为先进生产力的支撑，是很难具有可持续发展生命力的。经济发展需要产业发展支撑，而产业发展与布局又必须考虑承载体内外的经济联系和有效的合作分工。因此，区域发展规划、园区发展规划，都应该高度重视理清、理顺不同功能区域的经济的发展定位以及重点节点区域的经济联系和功能定位，引导市场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与合作链条，以及合理的产业链、供应链布局。

欧亚经济综合园区已经逐步形成了以会展、金融、旅游、文化创意为主导的现代服务业产业体系。以现代服务经济为主导，协同发展数字经济、水岸经济；积极承接国际高端服务业落地，促进园区服务业向高端化、现代化转型升级；促进数字经济提质升级，完善云计算、大数据生产流通和应用服务，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服务平台等发展构想也很好。应该说，这些都是立足于发展现代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战略思考及安排。但是，服务业的发展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是需要与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相衔接、相联系的，如果失去与实体经济发展的配套衔接，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将会缺乏支撑。因此，欧亚经济综合园区的进一步发展，应该顺应经济全球化、国际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发展趋势与要求，在进一步完善现代服务业发展思路、科学布局现代服务业发展体系的基础上，谋划布局一批在本地区、本园区具有一定比较优势的新兴战略性新兴产业，或者是具有较高附加值、科技含量高又能吸纳高技能劳动人员就业的轻型现代制造业。这样既能够保持与上下游产业链、供应链密切联系，又能比较好地发挥园区内的要素资源禀赋，同时还可以配套发展科技研发、技能教育培训等产业。

第四，持续不懈地优化营商环境。营商环境关系到投资主体和市场经营主体的积极性与市场活跃程度，关系到经济要素的流动性与资源聚合程度，关系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成长性与创新活跃程度。这于进一步扩大开放，拓展供给与需求市场空间都十分重要。可以说，营商环境也代表着生产力、体现着竞争力，是决定经济运行状况和增长态势的综合基础。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下，在国家与地区间竞争及合作日益发展的大背景下，在国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的大环境下，区域经济发展和园区建设都应该立足地区实际，借鉴学习、自我创新，持续不断地改善和优化营商环境。首先，要十分重视强化法制环境，保障市场公平竞争。要以保护产权、履行契约、促进市场统一、维护

平等交换、保护公平竞争为基本导向和重点内容，加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通过建立健全责任机制等有力有效举措，形成制度性规范化的及时执法、严格执法和公正执法机制。其次，要十分重视健全信用制度，有效维护信用制度。坚持法治约束和道德规范、教育引导相结合，提高全社会的信用意识、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要通过健全和完善信用体系及社会信用奖惩约束机制，推动保障市场活动诚实守信、经济运行循规有序。再次，要十分重视健全、完善营商服务链条。加强营商链条服务网络建设，形成前后端生产环节和相关服务体系无缝连接配套的良好环境；加强教育、卫生、文化等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优化生态宜居环境，推动形成良好的生活服务保障系统。

第五，贯彻实施好《国务院关于推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提升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2019年5月，《意见》公布实施。《意见》就着力推进国家级经开区开放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提升对外合作水平，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提出了新要求，并且有不少针对性很强的具体政策。这为欧亚经济综合园区的创新发展提出了新要求，也指引了方向。陕西省、西安市，特别是欧亚经济综合园区应利用好“一带一路”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的条件和优势，利用好国家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所具有的龙头地位优势，发挥好国家级经开区对外开放平台的作用，抓住机遇，深化改革，贯彻落实，不断提高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对外投资的数量和质量。在集聚知识、技术、信息、数据等生产要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产业升级等方面，不断拓展发展新空间。在优化管理体制、优化激励机制，营造更加有利于产业发展，有利于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等方面，不断地进行改革创新，培育形成提升对外开放和合作水平，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竞争力的势能与动能。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责任编辑：李蕊

走好制造强国“三步棋”

魏建国

引言

最近一段时期，美国政府挑起并不断升级对我国经贸摩擦，并要求美国公司撤出中国。贸易前景的日益不确定性确实让不少美国企业界人士“吃不消”。例如，美国在华企业“简单乐趣”玩具公司首席执行官杰伊·福尔曼近期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他们的公司总部设在佛罗里达，但 90% 的产品在中国生产。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让美国企业撤出中国的想法太离谱了。首先，美国本土没有足够的劳动力，而其他国家又没有足够的生产能力。其次，公司即使真的将供应链撤出中国，转移到类似印度、越南等国家，但是美国政府政策朝令夕改，说不定什么时候又将矛头对准这些国家。福尔曼说，美国政府毫无合理性的贸易政策让公司根本无法做长远打算，企业遇到了一些无解的难题，感到十分困惑。

一、现在是中国迈向制造强国的最好时期

第一个理由，从全球制造业格局的演变看，历史上制造业中心大体经历了四轮大规模转移。第一轮发生在 18 世纪 60 年代，工业革命的爆发使英国成为全球主要的制造中心，其制造业产值曾占全球制造业产值的 30% 左右；第二轮发生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美国制造业产值曾占全球制造业产值 50% 以上；第三轮发生在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日本、德国和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日本制造业产值曾经占到全球制造业产值的 16%；第四轮发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地区）和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地区），将劳动力密集型和低技术、高消耗产业转移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中国与美德日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新的所在地。可以预见，这个格

局今后仍将持续很长一段时期，未来 10 年是中国制造业的关键期。

第二个理由，从 16 世纪初至今约 500 年的时间里，世界科技中心先后在意大利、英国、德国、法国和美国之间转移，大约 100 年转移一次。世界科技中心的每次转移，都大大推动了大国的崛起和世界格局的深刻变革。美国成为世界科技中心是在 20 世纪 40 年代左右，至今已有 80 年。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风起云涌，世界科技中心也快到了转移的时候。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科技发展与应用正在加速经济和制造业发展方式的转变。

第三个理由，我国正在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制造业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着力点。2019 年是我国制造业政策密集出台的一年，培育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政策文件正在研究制定中，先进制造业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广东、湖北、四川、上海、江苏等地，已经建成或即将筹建、施工一批先进制造业项目。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中心，应极力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等有利条件，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多采用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实施制造业高质量、高效益、高效率发展。

二、中国制造强国建设要走“三步棋”

第一步棋，增强产业基础能力，提升产业链水平。纵观世界制造业历史，可以得出产业基础能力是打造制造业强国的前提这个结论，美国如此，德国、日本也是如此。中国有着全球门类最全、布局合理、规模最大的制造业，能否在未来 5 年内超过日本和德国，要从三个优势抓起，进行产业基础能力建设，分类施策。一是发挥政府的制度化优势，采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方式，集中突破一批“卡脖子”短板项目。二是强化政府和市场相结合的优势，加大力度持续推进工业强基工程，形成长效政策机制。第三，坚持发挥庞大的工程师和熟练工人队伍的优势，以培养一大批专精特的“世界隐形冠军”企业和龙头企业为抓手。

第二步棋，依托城市群建设加快高端制造业的产业布局。未来世界的竞争不是单个城市的竞争，而是城市群的竞争。当前，高端智能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一批制造业重大项目即将迎来建设高峰期，这需建设好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综观东京大湾区等世界城市群的制造业快速发展，无一不是中心城市带动周边一批城市，打造出一批优势互补、共同发力的城市，而不是我们常见的同质竞争、相互抵销的城市群。因此，要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齐头推进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形成以龙头城市为核心、周边城市群

产业配套的国内制造业高端集群。同时，配套建设生产性服务业，包括联手打造创新中心、资讯中心、绿色发展中心、金融中心、法律和仲裁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专业服务中心等综合服务体系。由此，牢牢把握制造业强国方向不动摇，以城市群为依托打造世界一流制造业集群。此外，要加快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发展。

第三步棋，发挥我国现有创新优势，通过数字技术提升制造业能级。数字技术与当代产业发展结合是当务之急。应利用数字技术推进供需对接，特别是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提高消费者多元化偏好与企业柔性生产能力的匹配度，构建数字技术支撑的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

走好以上三步棋，人才队伍是关键，这是我们与美欧日等制造强国的差距。“守着金饭碗要饭吃”曾是不少国内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写照。集聚了大量人才和海量成果，但由于限制多、管得死、缺少有效激励，科研人员对科研成果产业化积极性不高，大量科研成果在实验室里“沉睡”。因此，要尊重知识产权，加快推进知识产权收益激励改革，推动科研创新及成果转化。其次，在美国等国家对我国实施人才封锁的情况下，要注重引进国际人才，更要加大“本土人才”培育力度，加强基础教育，培养创新意识，形成试错机制激励科研人才创新，在实践中培育本土人才。再次，全面发力加快推进人才培养、评价、流动、激励、引进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为人才发展注入强大动能。与此同时，要利用“一带一路”建设契机支撑制造业由大变强。当前中美经贸摩擦导致不少制造业企业转移到印度、越南等国家，应使产业转移与“一带一路”建设结合，推动形成产业向外转移与产业国内转型“双转”相得益彰的新优势。渐次推进企业有序“走出去”，实现原产地多元化、出口市场多元化和资产组合多元化布局，击破美国设置的壁垒。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打造“走出去”创建全球供应链的新优势。加快企业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布局供应链。这是主动解决产业转移、产能过剩和贸易摩擦不断加剧的最好选择。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责任编辑：李蕊

《新中国 70 年经济社会发展回顾与思考》 重大课题研究成果发布

李 娣

2019 年 9 月 18 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办第 122 期“经济每月谈”，主题为“《新中国 70 年经济社会发展回顾与思考》重大课题研究成果发布”。会议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执行局主任张晓强主持，邀请了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大卫、副理事长韩永文、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德水、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秘书长任珑、《求是》杂志社经济部原主任李建军及课题组成员，就新中国 70 年经济社会发展谈了感受。课题组组长、中心博士后站主任王宪磊，课题组副组长、中心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李娣分别发布了主报告和分报告的主要研究成果。

一、开展《新中国 70 年经济社会发展回顾与思考》 研究的重大意义

张晓强指出，201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 70 华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人民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人民从此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从此开始了新纪元。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 70 年的历史，总结创造的成就和经验，思考留下的宝贵启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现实、把握未来，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为“两个百年”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二、专家点评与主要观点

张大卫认为，主报告仅用了 1.7 万字全景式地展示中华人民共和国 70 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伟大成就与宝贵经验，内容丰富、气势磅礴，是一份质量很高的报告。

我们个人的成长和国家发展过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与祖国始终是血脉相连、生死相依、荣辱与共的，在这里结合自己的成长历程谈几点体会。

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70 年能取得伟大成就，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这个伟大光荣的党。70 年来，我们党始终把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幸福作为使命和追求目标，在党的宗旨、章程、行动纲领以及每一项重大部署中都把这两个目标紧密结合起来，在争取祖国富强、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使人民群众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从而凝聚了人心，形成了共识，激励起亿万人民群众为之而奋斗。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用 70 年走到今天，取得伟大成就的实践证明，我们所走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

二是我们党始终坚持制定清晰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任务。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同时，全体人民脚踏实地、砥砺前行，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美好的明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然后“二五”计划，“三线建设”调整经济布局，1964 年提出“四个现代化”，坚持一个五年计划贯彻执行，逐步建立了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把解决人民群众温饱问题作为重要的战略目标，20 世纪 80 年代初又把实现小康社会作为我们党的奋斗目标。在 2000 年基本实现小康以后，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又一个 20 年过去，2020 年我们将如期向全世界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们党求真务实、矢志不渝，围绕“小康”一干就是 40 年。当今世界没有哪一个政党是这么干的。这是我们国家用 70 年时间就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重要原因。

三是中国共产党是个善于学习和创新的党。在领导中国建设发展进程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不断弘扬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使国家到处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现在改革开放创新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在各地的调研中，处处都能看到推动改革发展所做的努力。改革开放成为我们的时代精神和民族品格。从全球来看，没有哪个国家是这样的。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后，就一直在用自己的勤劳、智慧改变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生活，也在改变着这个世界，这种强大力量势不可挡。

四是我们党始终奉行和平发展的指导思想。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与有关国家一起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那时起中国就向世界、向周边释放了很大的善意，中国是一个与人为善、以邻为伴的国家。70 年来，我们始终坚持和平发展的外交路线，始终坚持互惠互利发展经贸合作。习近平总书记 2013 年又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这是中国政府向世界奉献的新公共产品。此后，又提出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

新理念，中国的期望是携手各国共同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五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同时，不断纠正自己的错误。70年来，我们走过弯路，出现过偏差，错过了一些发展机会，但是我们党发现后，直面自己的不足，不断补齐短板，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正是因为我们民族、我们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我们对中国未来发展充满着信心。

总体讲，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历程，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只不过是短短一瞬，但这70年为中国未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讲我们正处在最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越是靠近这个目标，我们越有可能面临更多的风险和挑战。我们要和面临的挑战和困难进行不懈斗争，要齐心协力为实现伟大梦想而努力，我们党提出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一定会更好地实现，中国的前景更加辉煌灿烂。

韩永文认为，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生的中国公民，能够切身感受到中国70年的发展和变化，能够亲历中国的建设、发展和改革历程，感到无比自豪，也很光荣。回顾中国70年发展历程，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经历了各种艰难困苦。我们党在艰难曲折的条件下，带领全国人民百折不挠，一步一个脚印地使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一穷二白、十分落后的农业国，逐步走向工业现代化、城市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技教育现代化强国，这一切来之不易。

新中国成立初期，接收的是一个因长期战乱破坏严重、经济贫苦落后、民不聊生的烂摊子。在内生条件极差的背景下，面对美国等西方发达大国的围堵，党和国家首先要解决的是使人民吃得上饭、吃得饱饭和不受战争威胁的问题，以保证国家能够长久站立。其时发展战略选择有两个：一是发展农业，另一是发展国防和重工业。在当时十分艰难的条件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独立自主方针，勇敢地走上了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道路。尽管早期只是建立了初步的、比较粗放的、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建设过程也极为痛苦和艰难，国家勒紧裤带推进建设，但毕竟迈开了由落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步伐，为改革开放后的腾飞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后，为适应经济发展大局需要，我们在战略选择上做了调整，对国民经济发展也做了调整，这是正确的。改革开放后，我国农业、工业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先从农村改革开始，到了1984年基本上解决了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同时，开始推进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给企业部分经营自主权，实行价格双轨制，调动了生产者的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推动我国经济建设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总结和回顾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有几点感受和体会：一是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思想路线。二是各时期的重大战略选择一定要体现全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正是因为我们党始终以为人民谋幸福、使人民富起来的思路来推进改革开放，推进经济发展，得到了全体人民的支持与拥护，进而领导全体人民不断实现一个又一个既定的发展目标，使党和国家为实现人民美好愿望有了不竭的奋斗动力。三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实体经济发展尤其是制造业的发展。新中国初期走的就是以产业立国之道，今天仍然要坚持。中国拥有巨大的人口规模，有劳动力供给的市场，只有发展实体经济才能保证人民收入不断增长、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中美贸易摩擦大背景下，中国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东南亚国家转移。当然，产业转移本身是市场主体追逐利益的客观规律所致，但应该采取一些措施减少或延缓产业转移进程，毕竟中国还有很多低收入劳动力和贫困人口，解决他们的收入、就业和提高生活水平依然是个大问题。要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必须推动技术创新，这就要求我们始终坚持科教兴国战略。70 年来，中国传统工业在产业规模迅速扩大的同时，不断地升级改造、技术创新，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强国的道路。当前，美国加强在科技领域遏制中国发展，这也提醒我们技术创新依然要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此外要重视解决好经济中脱实向虚问题。美国经济过分依赖金融产业，导致了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吸取美国的教训，应该重视在推进经济和产业结构协调、合理发展基础上，坚持发展第二产业，特别是发展制造业；要坚持立足于发展服务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业，加快推进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相适应的现代生活服务业发展。四是要高度重视粮食安全。要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讲的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总之，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我们要继续发扬中华民族勤劳致富的优良传统，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把中国建设得越来越好。

李德水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儿童入学率只有 20%，全国 80% 以上是文盲，中国持续开展了全国性的扫盲活动。经过 70 年努力，九年制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 94.2%，2018 年中等职业学校、普通高中、普通本专科在校学生分别达到 1555.2 万、2375.4 万和 2831 万人，中国有着全世界最为雄厚的人才后备力量。据国外学者统计，目前中国从事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工作的劳动者已占全世界同类劳动者总数的 1/4，拥有熟练技术工人的数量将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总和，企业研发支出以每年 20% 的速度增长。这些数字说明，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创新正成为我国发展第

（下转第 124 页）

国际权威机构观点综述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2019年9月中旬以来，国际权威机构对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对世界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

（一）世界银行：全球经济增长将进一步放缓

世界银行行长戴维·马尔帕斯2019年9月17日在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发表演讲时表示，受投资疲软、债券收益率低迷等多重不利因素影响，全球经济增长将进一步放缓，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预计将低于此前预估的2.6%。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都有不同程度的放缓，而欧洲部分地区则处于衰退或接近陷入衰退状态。马尔帕斯还对当前全球债券收益率低迷深感担忧，目前有价值超过15万亿美元的零利率或负利率债券，这意味着未来低增长前景。随着当前资本存量恶化、枯竭，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会继续放缓。多重不利因素还可能导致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不减反增，世行的减贫目标将难以达成。他呼吁推行结构性改革，包括提高债务透明度、参与全球价值链、确保货币市场稳定等，以促进经济增长。

马尔帕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年度会议之前发表讲话时指出，在英国脱欧充满不确定性、贸易局势紧张以及欧洲经济滑坡之际，全球经济前景正在恶化。这是他对全球增长再次发出的警告，而眼下投资者正在关注10月可能处于关键时刻的几个重大问题。美中重启高级别贸易谈判，此后一轮计划中的关税升级在10月15日生效；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此前承诺，如有必要，会带领英国在10月31日无协议脱欧。与此同时，欧洲经济指标正在发出警示，因为制造业下滑对于本地需求的影响越来越大。马尔帕斯再次表达了对约15万亿美元零或负收益率债券的批评，将其描述为“冻

结的资本”，正在将资源从经济增长中转移，并令债券持有人和发行人受益。

（二）经合组织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

经合组织 2019 年 9 月 19 日发布经济展望报告，下调 2019、2020 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报告把对 2019 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 5 月份预测的 3.2% 下调至 2.9%，这将是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的最低增速；同时，将 2020 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 3.4% 下调至 3%。

报告预测，2019、2020 年美国经济增长将分别为 2.4% 和 2%，比 5 月份预测值分别下调 0.4 和 0.3 个百分点。欧元区 2019、2020 年经济增长将分别为 1.1% 和 1%。其中，德国预计增长 0.5% 和 0.6%；法国预计增长 1.3% 和 1.2%；英国经济增长预计分别为 1% 和 0.9%，远低于 2018 年 1.4% 的增速。报告对中国 2019、2020 年的经济增长预期分别为 6.1% 和 5.7%，比 5 月份预测值分别下调 0.1 和 0.3 个百分点。

经合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洛朗丝·博纳称，考虑到中美经贸摩擦、英国“脱欧”和日韩关系紧张等因素，全球经济增长存在“结构性放缓”的风险。经合组织称，贸易保护主义造成全球商业贸易明显走弱，贸易紧张局势持续。此外，英国“脱欧”、企业不良债务增长和国际油价上扬为世界经济增长带来诸多不稳定因素，导致企业推迟投资。

博纳建议，充分利用宽松货币政策，加大公共投资，振兴经济活力。经合组织预测，2019—2030 年，全球基础设施道路建设预计每年需要 2 万亿美元投资，通讯设施建设预计每年需要 6000 亿美元投资。博纳认为，这些投资不仅可以刺激短期需求，也能促进长期增长。

（三）IMF：贸易争端显著影响全球经济

IMF 新任总裁格奥尔基耶娃 2019 年 10 月 8 日在 IMF 总部发表上任以来首次公开演讲时表示，贸易争端给全球经济增长造成显著损失，到 2020 年全球经济或将损失约 7000 亿美元，相当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0.8%。

格奥尔基耶娃指出，两年前全球经济同步回升，全世界将近 75% 的地方经济都在加速增长。如今，世界经济的很多领域都在发展，但经济增长却在不断减速。据预计，2019 年全球接近 90% 的地方经济增长都将放缓，这一普遍减速意味着 2019 年的经济增长率将跌至本世纪初以来的最低水平。造成经济增长放缓的根本原因是“裂痕”的出现。其中，由于贸易紧张局势等原因，全球的制造业活动和投资力度已大大减弱，服务业和消费可能很快也会受到影响。此外，英国脱欧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也在抑制经济潜力。

她认为，在当前形势下，释放贸易潜能尤为重要。此外，明智运用货币政策、部署财政工具、实施结构性改革，以及接受国际合作也是应对经济放缓的关键措施。如果全球经济放缓幅度大大高于预期，各国更加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财政应对措施，共同抵御经济衰退的风险。

（四）亚洲开发银行：贸易和投资势头减弱影响亚洲经济前景

亚洲开发银行 2019 年 9 月 25 日在其年度旗舰报告《2019 年亚洲发展展望更新》中指出，尽管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依然强劲，但随着贸易和投资势头减弱，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前景黯淡，且各经济体面临的风险不断上升。除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北等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外，预计 2019、2020 年该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将为 6.0%。报告预测，45 个亚洲发展中国家 2019 年的经济增速为 5.4%，到 2020 年微增至 5.5%。经济增速预测下调反映出国际贸易前景堪忧，以及发达经济体和中国、印度、韩国、泰国等亚洲发展中国家大型经济体的增速放缓。亚行首席经济学家泽田康幸认为，全球主要经济体面临的形势可能比目前预测的更加艰难，亚洲地区的主要问题是贸易衰退、投资下滑，政策制定者必须密切监测此类问题。

亚洲发展中国家次区域的增长前景各不相同。鉴于全球贸易放缓以及电子产品生命周期大幅缩短，对中国以及东亚和东南亚更开放的经济体的预测有所下调。报告预测，2019、2020 年中国经济的增速分别为 6.2% 和 6.0%，东亚整体增速将分别达到 5.5% 和 5.4%，而东南亚则分别增长 4.5% 和 4.7%。在 4 月至 5 月大选之前的投资疲软和信贷收紧，对 2019 年印度的增长前景构成压力，预计 2019 年印度 GDP 将增长 6.5%，到 2020 年可增至 7.2%。预计 2019 年和 2020 年整个南亚地区的增速分别为 6.2% 和 6.7%。受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公共支出刺激的影响，报告预计 2019、2020 年中亚地区经济增长分别为 4.4% 和 4.3%。与此同时，巴布亚新几内亚地震后的复苏有助于推动 2019 年太平洋次区域的经济增长 4.2%，但 2020 年该次区域的经济增长率可能放缓至 2.6%。

（五）世界银行：东亚太平洋地区经济增速将放缓至 5.8%

世界银行 2019 年 10 月 10 日发布的东亚太平洋经济半年报指出，全球需求疲软导致出口和投资增长下滑，考验着东亚太平洋地区的韧性。预计该地区经济体 2019 年增速将从 2018 年的 6.3% 放慢至 5.8%，预计 2020 年和 2021 年增速分别为 5.7% 和 5.6%。

报告称，在货币和财政政策支持下，该地区（中国除外）消费增长虽比 2018 年同期略有放慢，但仍保持稳定，较小型经济体增长依然强劲。报告指出该地区面临的一些风险点。贸易紧张局势对经济增长构成长期威胁，虽然有些国家希望从全球贸易格局重构

中获益，但全球价值链缺乏灵活性限制了东亚地区各国的上行空间。

报告警告称，该地区增长前景面临的下行风险加剧。鉴于高度的不确定性，贸易紧张局势将会继续损害投资增长。欧元区和美国增长减速超过预期，以及英国无序“脱欧”，都有可能进一步削弱对东亚地区出口商品的外部需求。一些国家的债务水平高企且不断上升，也限制了他们采用财政和货币政策缓解增长放缓影响的能力。此外，全球金融环境的改变有可能提升东亚地区的借贷成本，从而抑制信贷增长，进一步挤压私人投资，拖累经济增长。

为了应对日益增大的风险，报告建议，拥有足够政策空间的国家采用财政和货币措施来帮助刺激经济，同时保障财政和债务可持续性。东亚国家也可以从坚持贸易开放和深化区域贸易一体化中受益。东亚地区各国还需要采取有利于提高生产率和促增长的改革措施，包括进行监管改革以改善贸易和投资环境，从而吸引投资以及促进货物、技术和专业知识的流动。

二、对中国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

（一）世界银行：中国是营商环境改善度最高国家之一

世界银行于 2019 年 10 月 24 日发布《2020 年营商环境报告》，将中国列为过去一年世界上营商环境改善度最高的 20 个国家之一。世界银行对各国营商便利度的总体评分来自 10 个方面，要在 3 个方面实施改革才能被列入 20 个国家的名单之列，而世界银行的评估显示，中国在 8 个方面都有实质性的改善。

在 2018 年公布的报告中，中国营商环境大幅提升到 46 名，而且在营商环境改善排名第三位，报告称赞中国的领域改革快速且有效，认为中国在开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证、获得电力、纳税、保护小投资者、注册资产、跨界贸易等 7 个类别改革中取得突出进展。

世界银行本是评估 10 个营商环境改善度最高的国家，2019 年增加到了 20 个，而这 20 个国家大多数都为发展中国家，包括印度、巴基斯坦、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塔吉克斯坦、阿塞拜疆、缅甸等国。

（二）联合国报告：在数字平台领域，中国打破了美国的绝对垄断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近期发布的《2019 年数字经济报告》显示，全球 70 家最大数字平台企业中，68% 来自美国，22% 来自中国。在这 70 家数字平台企业中，有 7 家是最顶级和最重要的。其中，排名前五的是美国企业（亚马逊、微软、谷歌、苹果和脸书），另外两家是中国企业（阿里巴巴和腾讯）。这些巨头主宰着世界的现在和未来。

报告指出，仅在 15 年前，美国在数字平台领域还处于垄断地位。美国的这种绝对优势得益于它领导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革命（分别在 1865—1973 年和 1973—2004 年期间）。但突然之间，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自 2004 年以来）中，中国发起了挑战，而这是美国迄今面临的巨大挑战。2008 年以来，中国将发展重点转向了国内消费和数字经济（到 2020 年将占其 GDP 的 40%），这种发展以两家大型数字平台企业（阿里巴巴和腾讯）为龙头。中国的高科技企业联合体在 21 世纪的一个决定性技术领域掀起了爆炸式增长和创新浪潮，这个领域就是对新工业革命至关重要的人工智能技术。再加上物联网和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将在这段历史中成为决定世界权力归属的核心。

站在这 70 家最大数字平台企业对面的是当今全球 39 亿名互联网用户（占世界人口的 51.2%）。其中，中国用户有 8.1 亿人，这一数字比美国人口的两倍还要多。到 2027 年，所有中国互联网用户都将使用应用 5G 技术的智能互联网设备（如智能手机等）。美国和中国合计拥有区块链技术所有相关专利的 75%、全球物联网支出的 50%、云计算市场的 75% 以上，以及全球 70 家最大数字平台企业市值的 90%。

（三）《2019 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在多个领域表现突出

世界经济论坛 2019 年 10 月 9 日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在全球竞争力综合排名中，中国位列第 28 位，在市场规模、创新能力和技术通信领域有较为突出的表现。报告指出，全球金融危机已过去十余年，尽管各国已采取一系列的刺激政策，但全球经济仍处于生产率增长缓慢或持平的周期中。在来自全球 141 个经济体的竞争力综合排名中，新加坡凭借 84.8 分的成绩跃升为首位。中国则保持了 2018 年的成绩，位列榜单第 28 位，在金砖国家中表现最好。

世界经济论坛经济学家蒂埃里·盖格尔称，中国大陆的表现非常不错，分数有所提升。我们看到中国在某些领域达到发达经济体的水平，创新能力发展得非常快。他指出，中国的国际贸易体系还是很好的，虽然需要再完善一些内容，但是以规则为基础的体系是大方向。增加关税的做法是没有益处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保护主义是不好的，紧张局势会引发不确定性，会影响商业情绪，加剧全球经济长期放缓的形势。

报告再次强调了开放的重要性。此外，专家们还指出，更大力度的教育投资、技能培训以及更加平衡具有包容性的发展模式，都将助力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

（四）瑞士 BPDG 投资银行：中国创投环境理想

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的 BPDG 投资银行副行长菲奥伦佐·曼加涅洛，近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今天的中国拥有非常理想的创新投资环境。在中国，企业家精神

受到众多孵化器和风险投资基金的鼓励，这使得许多新思想和新资本向中国聚拢。他说：“中国已经在人工智能、物联网和机器人技术等许多领域处于世界前沿。中国电商在 B2C 领域广泛采用新技术令人印象深刻。同时，我也看到 B2B 领域有更多潜在机会，特别是在制造业、农业技术和物流领域。”他认为，中国市场拥有很多优势，随着“独角兽企业”数量以及硕士、博士生人数的不断增加，中国在高新技术领域已经拥有相当雄厚的实力。

他在谈到欧洲投资者对中国风投未来的看法时说：“未来几年，许多技术公司将寻求首次公开募股。许多公司即将进入成熟期，这使得风险投资者可以管控风险并缩短投资期限。”“欧洲投资者还可以将自己定位为中国公司的战略投资者，不仅提供资本，还可以将中国的技术带到欧洲，加上对欧洲市场的了解，让自己的公司获得更大发展。”

责任编辑：李 蕊

(上接第 118 页)

一动力，将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李德水讲述了“不应被遗忘的一段往事——三线精神”。“三线建设”是党中央、毛主席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是中国经济史上一次大规模的工业迁移过程，是在当时国防局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为加强战备逐步优化中国生产力布局的一次由东向西转移的战略大调整。更重要的是连续 16 年用 2000 多亿元的投资进行建设，这是巨大的政治智慧，对整个国家和人民来说其经济效应也是无法估量的。在庆祝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我们不应忘记那些为“三线建设”献出了青春甚至生命的建设者们，应当向他们致敬。

任珑认为，总结过去，使我们更加坚定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和文化的自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再用 30 年的时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希望新时代年轻人深刻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 70 年来走过的路、形成的宝贵经验和精神财富，把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70 年作为未来实现中国梦的巨大动力。

责任编辑：李 蕊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一、世界经济

表 1 世界经济增长率(上年=100)

单位:%				
	2017 年	2018 年 估计值	2019 年 预测值	2020 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9 年 10 月)				
世 界	3.8	3.6	3.0	3.4
发达国家	2.5	2.3	1.7	1.7
美 国	2.4	2.9	2.4	2.1
欧元区	2.5	1.9	1.2	1.4
日 本	1.9	0.8	0.9	0.5
发展中国家	4.8	4.5	3.9	4.6
印 度	7.2	6.8	6.1	7.0
俄罗斯	1.6	2.3	1.1	1.9
巴 西	1.1	1.1	0.9	2.0
世界银行(WB,2019 年 6 月)				
世 界	3.1	3.0	2.6	2.7
发达国家	2.3	2.1	1.7	1.5
发展中国家	4.5	4.3	4.0	4.6
英国共识公司(Consensus Forecasts,2019 年 10 月)				
世 界	3.2	3.2	2.5	2.5
美 国	2.4	2.9	2.3	2.1
欧元区	2.7	1.9	1.1	0.9
日 本	1.9	0.8	1.0	0.2
印 度	7.2	6.8	6.0	6.8

注:(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世界及分类数据按照购买力平价方法进行汇总,世界银行和英国共识公司按汇率法进行汇总。(2)印度数据指财政年度。

表 2 世界贸易量增长率(上年=100)

单位:%				
	2017 年	2018 年 估计值	2019 年 预测值	2020 年 预测值
世 界				
出 口				
发达国家	4.7	3.1	0.6	2.6
发展中国家	7.0	3.8	1.5	3.9
进 口				
发达国家	5.0	3.5	1.0	2.8
发展中国家	7.8	5.0	0.4	4.7

注: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9 年 7 月预测。

表 3 消费者价格涨跌率(上年=100)

单位:%				
	2017 年	2018 年 估计值	2019 年 预测值	2020 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9 年 10 月)				
世 界				
发达国家	1.7	2.0	1.5	1.8
发展中国家	4.3	4.8	4.7	4.8
英国共识公司(ConsensusForecasts,2019 年 10 月)				
世 界	2.5	2.9	2.7	2.7
美 国	2.1	2.4	1.8	2.1
欧元区	1.5	1.8	1.2	1.2
日 本	0.5	1.0	0.6	0.7
印 度	3.6	3.4	3.5	4.0

注:印度数据指财政年度。

表 4 消费者价格同比上涨率

单位:%

年份	月份	世 界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2018 年		2.5	1.7	3.0
	9 月	2.4	2.0	3.0
	10 月	2.5	2.2	3.1
	11 月	2.2	2.0	2.6
	12 月	2.0	1.6	2.2
2019 年				
	1 月	2.0	1.5	2.2
	2 月	2.0	1.5	2.4
	3 月	2.1	1.7	2.7
	4 月	2.1	1.8	2.7
	5 月	2.3	1.7	2.7
	6 月	2.0	1.6	2.4
	7 月	2.0	1.5	2.6
	8 月	1.9	1.4	2.4
	9 月	2.0	1.2	2.5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表 5 工业生产

年份	月份	工业生产指数 同比增长率(%)			JP 摩根全球制造业 采购经理人指数		
		世界	发达 国家	发展中 国家	全球 PMI	产出 指数	新订单 指数
2018 年		3.6	2.1	4.9			
	9 月	3.6	2.2	4.5	52.1	52.3	51.9
	10 月	3.6	2.4	5.3	52.0	51.8	51.8
	11 月	1.8	0.7	3.9	51.9	51.8	51.8
	12 月	1.8	0.1	3.5	51.4	51.9	51.2
2019 年							
	1 月	2.4	1.1	3.3	50.7	50.8	50.1
	2 月	2.4	0.5	3.1	50.6	50.6	50.0
	3 月	3.0	0.0	5.4	50.5	50.3	49.9
	4 月	1.2	-0.1	3.5	50.4	50.6	50.1
	5 月	1.8	0.2	3.6	49.8	50.1	49.5
	6 月	1.2	-1.1	3.5	49.4	49.5	49.0
	7 月	1.8	-0.7	3.4	49.3	49.4	49.2
	8 月	1.2	-1.3	3.1	49.5	50.0	49.0
	9 月				49.7	50.1	49.4

注:(1)工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率为经季节调整的数据。(2)
采购经理人指数超过 50 预示着经济扩张期。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和 Markit 公司。

二、美国经济

表 6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17 年		2.4	2.6	0.7
	3 季度	3.2	2.4	-0.1
	4 季度	3.5	4.6	2.4
2018 年		2.9	3.0	1.7
	1 季度	2.5	1.7	1.9
	2 季度	3.5	4.0	2.6
	3 季度	2.9	3.5	2.1
2019 年		1.1	1.4	-0.4
	1 季度	3.1	1.1	2.9
	2 季度	2.0	4.7	4.5

表 7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7 年		4.2	3.5	4.7
	3 季度	1.4	4.4	1.3
	4 季度	8.7	10.1	14.0
2018 年		4.6	3.0	4.4
	1 季度	5.5	0.8	0.6
	2 季度	5.2	5.8	0.3
	3 季度	0.7	-6.2	8.6
2019 年		2.7	1.5	3.5
	1 季度	3.2	4.1	-1.5
	2 季度	-1.1	-5.8	0.1

注: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折年率计算(表 6、表 7)。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 6、表 7)。

表 8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17 年		2.4	2.6	0.7
	3 季度	2.4	2.4	0.5
	4 季度	2.8	2.9	0.8
2018 年		2.9	3.0	1.7
	1 季度	2.9	2.8	1.4
	2 季度	3.2	3.2	1.7
	3 季度	3.1	3.4	2.2
2019 年		2.5	2.6	1.5
	1 季度	2.7	2.5	1.8
	2 季度	2.3	2.7	2.2

表 9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表 11 进出口贸易									
单位: %					单位: 亿美元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年份	出口额	环比增长 (%)	同比增长 (%)	进口额	环比增长 (%)	同比增长 (%)	出口额减进口额
2017 年		4.8	3.5		4.7		2018 年	25329		3.0	34530		4.5	-9200
	3 季度	3.5	2.3		4.1		8 月	2078	-0.5	6.2	2626	0.6	9.8	-549
	4 季度	5.1	5.5		5.6		9 月	2097	1.0	5.8	2658	1.2	10.0	-561
2018 年		4.6	3.0		4.4		10 月	2101	0.2	5.4	2668	0.4	9.0	-567
	1 季度	4.6	4.1		4.7		11 月	2080	-1.0	2.5	2616	-1.9	3.8	-536
	2 季度	5.2	5.2		3.9		12 月	2057	-1.1	-0.5	2665	1.9	3.7	-608
	3 季度	5.0	2.4		5.7		2019 年							
	4 季度	3.5	0.4		3.2		1 月	2070	0.7	2.2	2602	-2.4	2.2	-531
2019 年							2 月	2091	1.0	1.7	2598	-0.1	0.1	-507
	1 季度	2.9	1.2		2.6		3 月	2109	0.9	0.4	2635	1.4	2.5	-526
	2 季度	1.4	-1.7		2.6		4 月	2058	-2.4	-1.5	2577	-2.2	0.2	-520
注: 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表 8、表 9)。														
资料来源: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 8、表 9)。														
表 10 劳动力市场														
单位: %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失业率	非农雇员人数环比增加(万人)									
		环比折年率	同比											
2018 年		1.3		3.9	267.9									
	9 月	1.2	1.2	3.7	10.8									
	10 月			3.8	27.7									
	11 月			3.7	19.6									
	12 月	0.1	1.0	3.9	22.7									
2019 年														
	1 月			4.0	31.2									
	2 月			3.8	5.6									
	3 月	3.5	1.7	3.8	15.3									
	4 月			3.6	21.6									
	5 月			3.6	6.2									
	6 月	2.3	1.8	3.7	17.8									
	7 月			3.7	16.6									
	8 月			3.7	16.8									
	9 月			3.5	13.6									
注: 除年度数据以外,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增长率。														
资料来源: 美国劳工统计局。														

表 12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 亿美元														
年份	季度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7 年		2773			3004			-231						
	3 季度	646			703			-57						
	4 季度	374			608			-234						
2018 年		2536			-906			3442						
	1 季度	528			-481			1009						
	2 季度	6			-1209			1215						
	3 季度	1239			560			679						
	4 季度	763			224			539						
2019 年														
	1 季度	817			-156			972						
	2 季度	617			729			-113						
资料来源: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三、欧元区经济

表 13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17 年		2.4	1.7	1.2
	3 季度	0.8	0.6	0.6
	4 季度	0.8	0.3	0.3
2018 年		1.9	1.4	1.1
	1 季度	0.3	0.5	0.1
	2 季度	0.4	0.1	0.3
	3 季度	0.2	0.2	0.2
	4 季度	0.3	0.4	0.4
2019 年				
	1 季度	0.4	0.4	0.4
	2 季度	0.2	0.2	0.3

表 14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7 年		2.6	5.2	3.9
	3 季度	- 4.7	1.3	- 2.3
	4 季度	0.9	2.3	1.6
2018 年		2.3	3.5	2.8
	1 季度	0.2	- 0.5	- 0.1
	2 季度	1.7	1.1	1.4
	3 季度	0.5	0.4	0.9
	4 季度	1.5	1.0	1.0
2019 年				
	1 季度	0.2	0.9	0.4
	2 季度	0.5	0.0	0.2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3、表 14)。

表 15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就业人数环比增加(万人)	失业率
		环比	同比		
2018 年		0.4		8.2	1338.7
	8 月			8.0	1312.9
	9 月	- 0.1	0.3	8.0	1310.4
	10 月			8.0	1310.4
	11 月			7.9	1295.7
	12 月	0.0	0.0	7.9	1284.8
2019 年					
	1 月			7.8	1278.5
	2 月			7.8	1270.1
	3 月	0.1	- 0.2	7.7	1255.2
	4 月			7.6	1248.8
	5 月			7.6	1240.1
	6 月	0.0	- 0.1	7.5	1230.8
	7 月			7.5	1228.4
	8 月			7.4	1216.9

注:除年度数据以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增长率;就业人数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环比变化。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6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17 年		2.4	1.7	1.2
	3 季度	2.9	2.0	1.6
	4 季度	3.0	1.7	1.5
2018 年		1.9	1.4	1.1
	1 季度	2.6	1.7	1.3
	2 季度	2.3	1.5	1.3
	3 季度	1.7	1.1	0.9
	4 季度	1.2	1.2	1.0
2019 年				
	1 季度	1.3	1.1	1.3
	2 季度	1.2	1.2	1.3

表 17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7 年		2.7	5.1	3.9
	3 季度	2.8	5.8	4.2
	4 季度	2.0	6.8	4.1
2018 年		2.3	3.5	2.8
	1 季度	3.9	4.4	3.3
	2 季度	- 2.0	4.3	0.6
	3 季度	3.4	3.3	3.8
	4 季度	4.0	1.9	3.3
2019 年				
	1 季度	4.0	3.4	3.8
	2 季度	2.8	2.4	2.6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6、表 17)。

表 18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欧元

年份	出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进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出口额
月份							减进 口额
2018 年	22782		3.8	20846		6.6	1935
	8 月	1928	2.1	1770	0.2	8.7	158
	9 月	1908	- 1.0	1773	0.2	7.8	136
	10 月	1936	1.4	1814	2.3	15.0	122
	11 月	1923	- 0.7	1777	- 2.0	5.5	146
	12 月	1933	0.5	1775	- 0.1	2.7	158
2019 年							
	1 月	1957	1.3	1782	0.4	3.6	176
	2 月	1947	- 0.5	1750	- 1.7	5.7	197
	3 月	1963	0.8	1791	2.3	6.4	172
	4 月	1926	- 1.9	1773	- 1.0	6.6	152
	5 月	1952	1.4	1769	- 0.2	5.2	183
	6 月	1937	- 0.7	1760	- 0.5	- 4.0	178
	7 月	1941	0.2	1766	0.3	2.7	175
	8 月	1948	0.4	1745	- 1.2	- 4.0	203

注:欧元区绝对数指欧元区现有范围,即 19 个成员国。贸易额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贸易额,为经季节调整后的数据。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9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欧元					
年度	月度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8 年		- 2780	- 2568	- 211	
	8 月	- 365	- 395	31	
	9 月	- 1037	- 1020	- 16	
	10 月	27	139	- 112	
	11 月	- 399	- 740	340	
	12 月	- 1578	- 2438	860	
2019 年	1 月	604	676	- 72	
	2 月	- 11	199	- 210	
	3 月	- 237	31	- 268	
	4 月	490	214	276	
	5 月	161	90	71	
	6 月	- 531	- 777	246	
	7 月	24	- 146	170	
	8 月	- 306	- 210	- 96	
	注:欧元区绝对数指欧元区现有范围,即 19 个成员国。欧元区外国直接投资额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直接投资额。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				

四、日本经济

表 20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民间最终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
2017 年		1. 9	1. 1	0. 3
	3 季度	0. 7	- 0. 7	0. 3
	4 季度	0. 3	0. 5	0. 1
2018 年		0. 8	0. 3	0. 8
	1 季度	- 0. 1	- 0. 1	0. 3
	2 季度	0. 5	0. 3	0. 1
	3 季度	- 0. 5	- 0. 1	0. 3
	4 季度	0. 4	0. 4	0. 7
2019 年	1 季度	0. 5	0. 0	- 0. 1
	2 季度	0. 3	0. 6	1. 2

表 21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 口	进 口
2017 年		2. 9	6. 8	3. 5
	3 季度	0. 4	2. 2	- 1. 0
	4 季度	0. 2	2. 0	2. 6
2018 年		1. 1	3. 4	3. 4
	1 季度	- 0. 1	1. 0	0. 6
	2 季度	1. 5	0. 8	0. 8
	3 季度	- 2. 1	- 2. 1	- 1. 2
	4 季度	1. 9	1. 2	3. 6
2019 年	1 季度	0. 2	- 2. 0	- 4. 3
	2 季度	0. 5	0. 0	1. 7

表 22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民间最终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
2017 年		1. 9	1. 1	0. 3
	3 季度	2. 2	0. 7	0. 4
	4 季度	2. 4	1. 2	0. 5
2018 年		0. 8	0. 3	0. 8
	1 季度	1. 3	0. 2	0. 5
	2 季度	1. 5	0. 1	0. 7
	3 季度	0. 1	0. 6	0. 7
2019 年	4 季度	0. 3	0. 5	1. 3
	1 季度	1. 0	0. 5	0. 9
	2 季度	1. 0	0. 9	2. 1

表 23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 口	进 口
2017 年		3. 0	6. 8	3. 5
	3 季度	3. 3	7. 1	2. 6
	4 季度	3. 0	6. 7	5. 1
2018 年		1. 1	3. 4	3. 4
	1 季度	1. 9	5. 2	3. 6
	2 季度	2. 4	5. 9	2. 9
	3 季度	- 1. 0	1. 7	2. 8
	4 季度	0. 9	1. 1	4. 1
2019 年	1 季度	1. 4	- 2. 2	- 1. 3
	2 季度	0. 8	- 2. 8	- 0. 4

资料来源:日本内阁府(表 20~表 23)。

表 24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度	月份	劳动生产率同比增长率	新增就业与申请就业人数之比	失业率
2018 年		0. 7	1. 61	2. 4
	8 月	- 0. 6	1. 63	2. 4
	9 月	- 0. 7	1. 63	2. 4
	10 月	3. 9	1. 62	2. 4
	11 月	- 0. 7	1. 63	2. 5
	12 月	- 0. 6	1. 63	2. 4
2019 年	1 月	2. 0	1. 63	2. 5
	2 月	- 2. 0	1. 63	2. 3
	3 月	- 3. 2	1. 63	2. 5
	4 月	- 0. 5	1. 63	2. 4
	5 月	0. 6	1. 62	2. 4
	6 月		1. 61	2. 3
	7 月		1. 59	2. 2
	8 月		1. 59	2. 2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和日本央行统计月报。

表 25 进出口贸易

单位: 亿日元

年份	出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进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年份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2018 年	814788		4.1	827033		9.7	-12245
9 月	67670	-1.7	-1.4	69621	-1.4	7.1	-1951
10 月	70110	3.6	8.2	73900	6.1	20.0	-3790
11 月	67717	-3.4	0.1	71874	-2.7	12.5	-4156
12 月	66776	-1.4	-3.9	68628	-4.5	1.9	-1852
2019 年							
1 月	62352	-6.6	-8.4	65266	-4.9	-0.8	-2914
2 月	66359	6.4	-1.2	66176	1.4	-6.5	183
3 月	65598	-1.1	-2.4	67474	2.0	1.2	-1877
4 月	65719	0.2	-2.4	67128	-0.5	6.5	-1410
5 月	62429	-5.0	-7.8	67623	0.7	-1.4	-5194
6 月	65541	5.0	-6.6	65852	-2.6	-5.2	-311
7 月	65325	-0.3	-1.5	66664	1.2	-1.1	-1340
8 月	63568	-2.7	-8.2	64735	-2.9	11.9	-1167
9 月	64451	1.4	-5.2	65424	1.1	-1.5	-972

注: 月度贸易额为季节调整后数据。

资料来源: 日本财务省。

表 26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 亿日元

年份	月份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8 年		28590	175788	-147198
	8 月	-356	13329	-13685
	9 月	5807	17588	-11781
	10 月	428	8197	-7769
	11 月	4223	27158	-22935
	12 月	1277	11285	-10008
2019 年				
	1 月	1078	71933	-70855
	2 月	2506	12932	-10426
	3 月	12726	27056	-14330
	4 月	3811	21532	-17721
	5 月	3840	19795	-15955
	6 月	111	15801	-15690
	7 月	2354	14715	-12361
	8 月	3385	23599	-20214

资料来源: 日本财务省。

五、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

表 27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加拿大	英国	南非	巴西	印度	俄罗斯
2017 年		3.0	1.8	1.3	1.0	6.7	1.6
	3 季度	3.0	2.0	1.6	1.4	6.8	2.2
	4 季度	2.9	1.6	1.4	2.2	7.7	0.9
2018 年		1.9	1.4	0.6	1.1	7.0	2.3
	1 季度	2.2	1.2	0.7	1.2	8.1	1.9
	2 季度	1.8	1.4	0.1	0.9	8.0	2.2
	3 季度	2.0	1.6	1.3	1.3	7.0	2.2
	4 季度	1.6	1.4	1.1	1.1	6.6	2.7
2019 年							
	1 季度	1.4	1.8	0.0	0.5	5.8	0.5
	2 季度	1.6	1.2	0.9	1.0	5.0	0.9

注: 印度年度 GDP 增长率为财年增长率。

表 28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韩国	墨西哥	中国 香港	中国 台湾	马来 西亚	印度尼 西亚
2017 年		3.1	2.0	3.8	3.1	5.9	5.1
	3 季度	3.9	1.6	3.6	3.4	6.1	5.1
	4 季度	2.8	1.5	3.5	3.5	5.7	5.2
2018 年		2.7	2.0	3.0	2.7	4.7	5.2
	1 季度	2.8	1.2	4.6	3.2	5.3	5.1
	2 季度	2.9	2.6	3.6	3.3	4.5	5.3
	3 季度	2.1	2.5	2.8	2.4	4.4	5.2
	4 季度	2.9	1.7	1.2	1.8	4.7	5.2
2019 年							
	1 季度	1.7	1.2	0.6	1.8	4.5	5.1
	2 季度	2.0	-0.8	0.5	2.4	4.9	5.1

资料来源: 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

表 29 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单位: %

年份	月份	加拿大	英国	南非	巴西	印度	俄罗斯
2018 年		5.8	4.1	27.1	12.3	4.1	4.8
	9 月	5.9	4.1	27.5	11.9	3.5	4.5
	10 月	5.8	4.1		11.7		4.7
	11 月	5.6	4.0		11.6		4.8
	12 月	5.6	4.0	27.1	11.6	3.5	4.8
2019 年							
	1 月	5.8	3.9		12.0		4.9
	2 月	5.8	3.9		12.4		4.9
	3 月	5.8	3.8	27.6	12.7	3.5	4.7
	4 月	5.7	3.8		12.5		4.7
	5 月	5.4	3.8		12.3		4.5
	6 月	5.5	3.9	29.0	12.0		4.4
	7 月	5.7	3.8		11.8		4.5
	8 月	5.7	3.9		11.8		4.3
	9 月	5.5					4.5

表 30 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单位: %

年份	月份	韩国	墨西哥	中国 香港	中国 台湾	马来 西亚	印度 尼西亚
2018 年		3.9	3.3	2.8	3.7	3.3	4.5
	9 月	4.0	3.6	2.8	3.7	3.3	5.3
	10 月	3.9	3.2	2.8	3.7	3.3	
	11 月	3.8	3.3	2.8	3.7	3.3	
	12 月	3.8	3.4	2.8	3.7	3.3	
2019 年							
	1 月	4.4	3.6	2.8	3.7	3.3	
	2 月	3.7	3.3	2.8	3.7	3.3	
	3 月	3.8	3.2	2.8	3.7	3.4	5.0
	4 月	4.1	3.5	2.8	3.7	3.4	
	5 月	4.0	3.5	2.8	3.8	3.3	
	6 月	4.0	3.6	2.8	3.7	3.3	
	7 月	4.0	3.7	2.9	3.7	3.3	
	8 月	3.1	3.7	2.9	3.7	3.3	
	9 月	3.4	3.8	2.9	3.7		

注: (1) 英国和中国香港月度数据为截至当月的 3 个月移动平均失业率。(2) 加拿大、英国、韩国和中国香港为经季节因素调整后的失业率。

资料来源: 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

表 31 进出口贸易							表 34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加拿大			英 国			年份 月份	韩 国			墨西哥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2018 年	4506	4704	-197	4868	6738	-1870	2018 年	6052	5350	697	4507	4766	-259		
8 月	387.3	410.3	-23.0	404.6	535.6	-131.0	9 月	506.5	410.3	96.1	377.0	390.1	-13.1		
9 月	373.4	384.8	-11.4	421.1	541.8	-120.7	10 月	548.6	484.8	63.8	413.6	454.5	-41.0		
10 月	397.6	406.2	-8.6	432.5	606.2	-173.7	11 月	514.8	468.1	46.7	386.1	420.0	-33.9		
11 月	372.8	383.3	-10.5	395.3	599.1	-203.8	12 月	482.1	440.3	41.8	375.5	366.5	9.0		
12 月	348.5	356.4	-7.9	334.1	507.2	-173.1	2019 年	1 月	461.8	451.1	10.7	326.2	383.0	-56.8	
2019 年	1 月	342.9	368.9	-26.0	371.5	596.0	-224.5	2 月	394.8	366.2	28.6	364.1	360.1	4.0	
2 月	324.5	358.3	-33.9	380.9	565.3	-184.4	3 月	470.1	419.9	50.2	390.2	385.1	5.0		
3 月	393.3	414.1	-20.9	448.0	638.1	-190.1	4 月	488.1	449.9	38.2	394.5	390.9	3.6		
4 月	372.1	397.4	-25.3	389.1	523.7	-134.6	5 月	457.1	436.7	20.5	418.3	418.6	-0.3		
5 月	414.3	413.8	0.5	403.7	522.8	-119.1	6 月	440.4	401.1	39.2	379.5	363.1	16.4		
6 月	384.4	390.4	-6.0	379.4	506.7	-127.4	7 月	460.8	437.4	23.5	393.0	414.8	-21.8		
7 月	371.8	389.6	-17.8	373.4	596.2	-222.8	8 月	440.8	424.7	16.1	404.3	407.0	-2.7		
8 月	370.6	398.4	-27.8	336.3	575.5	-239.2	9 月	447.2	387.4	59.8					
注:加拿大和英国数据经过季节因素调整。							表 35 进出口贸易								
表 32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单位:亿美元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南 非			巴 西			年份 月份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2018 年	940	933	6	2399	1886	513	2018 年	5685	6266	-582	3359	2863	496		
9 月	76.6	79.0	-2.5	191.9	147.1	44.8	8 月	505.8	559.1	-53.4	282.8	236.7	46.1		
10 月	84.2	88.2	-4.0	219.0	167.5	51.5	9 月	491.8	555.4	-63.7	296.2	252.5	43.7		
11 月	84.1	81.8	2.3	209.4	174.8	34.6	10 月	511.1	558.8	-47.7	295.5	261.6	33.9		
12 月	71.6	60.0	11.6	193.5	134.8	58.7	11 月	498.5	542.2	-43.8	277.8	231.1	46.7		
2019 年	1 月	64.0	73.6	-9.5	180.9	169.8	11.1	12 月	455.5	508.5	-52.9	285.6	238.9	46.7	
2 月	70.9	68.1	2.8	158.9	131.6	27.3	2019 年	1 月	474.9	472.3	2.6	273.0	264.0	9.0	
3 月	76.1	72.6	3.5	177.0	136.7	40.3	2 月	314.2	360.5	-46.3	204.0	154.6	49.3		
4 月	73.2	75.7	-2.5	194.4	141.8	52.6	3 月	467.3	526.5	-59.2	286.8	255.9	30.9		
5 月	79.0	77.9	1.1	206.4	155.7	50.7	4 月	440.6	474.3	-33.8	257.9	231.4	26.5		
6 月	74.0	71.1	2.9	180.8	135.3	45.5	5 月	455.5	499.7	-44.2	278.1	233.1	45.0		
7 月	80.3	82.5	-2.2	199.0	184.5	14.5	6 月	408.6	473.3	-64.7	285.3	246.5	38.8		
8 月	80.3	76.0	4.4	187.2	161.7	25.5	7 月	443.6	487.3	-43.7	281.2	244.6	36.5		
9 月				187.4	171.3	16.1	8 月	462.4	494.9	-32.5	287.6	227.7	59.9		
表 33 进出口贸易							表 36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印 度			俄罗斯			年份 月份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2018 年	3248	5145	-1897	4431	2487	1944	2018 年	2475	2176	299	1802	1887	-85		
9 月	279.5	419.3	-139.8	386.3	197.9	188.4	9 月	200.4	163.6	36.8	149.2	146.1	3.1		
10 月	269.8	441.1	-171.3	413.0	214.9	198.1	10 月	231.8	192.6	39.2	158.9	176.7	-17.7		
11 月	265.0	431.7	-166.7	402.5	212.7	189.8	11 月	202.9	184.1	18.8	148.5	169.0	-20.5		
12 月	279.3	410.1	-130.8	408.4	224.1	184.3	12 月	199.8	174.7	25.0	142.9	153.7	-10.8		
2019 年	1 月	263.6	410.9	-147.3	308.1	164.3	143.8	2019 年	1 月	207.5	179.5	28.0	139.3	149.9	-10.6
2 月	266.7	362.6	-95.9	347.0	182.5	164.5	2 月	163.4	136.3	27.1	125.6	122.3	3.3		
3 月	325.5	434.4	-108.9	369.9	209.7	160.2	3 月	206.2	171.0	35.3	141.2	134.5	6.7		
4 月	260.7	414.0	-153.3	366.9	221.3	145.6	4 月	207.1	180.8	26.3	131.1	154.0	-22.9		
5 月	299.9	453.5	-153.6	322.1	199.5	122.6	5 月	204.6	182.5	22.1	148.3	146.1	2.2		
6 月	250.1	402.9	-152.8	327.6	200.4	127.2	6 月	183.0	157.8	25.3	117.9	115.0	3.0		
7 月	263.3	397.6	-134.3	330.4	222.5	107.9	7 月	213.4	178.7	34.6	154.5	155.2	-0.7		
8 月	261.3	395.8	-134.5	338.4	218.3	120.1	8 月	194.3	168.2	26.1	142.8	142.0	0.9		
9 月	260.3	368.9	-108.6				9 月				141.0	142.6	-1.6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网站(表 27~表 36)。								

六、三大经济体指标对比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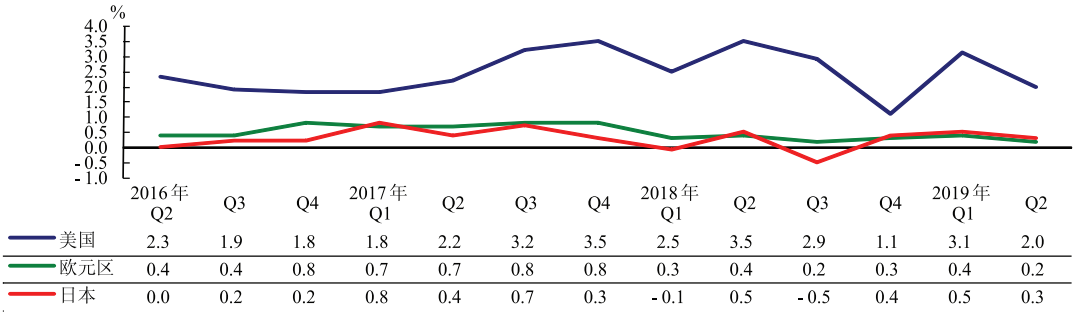


图 1 三大经济体 GDP 环比增长率 (%)

注：美国为环比折年率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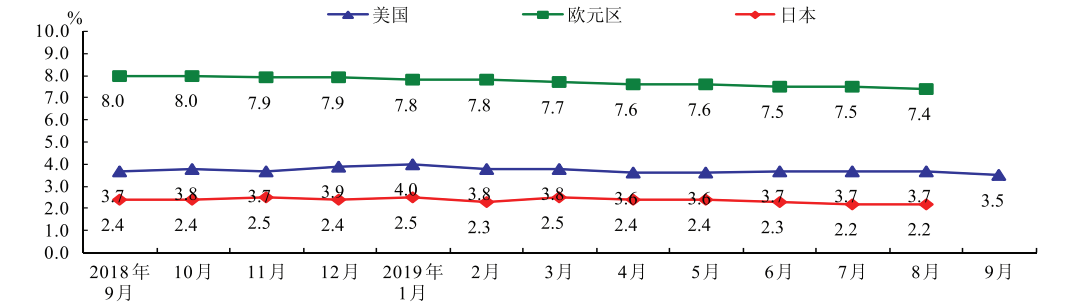


图 2 三大经济体失业率变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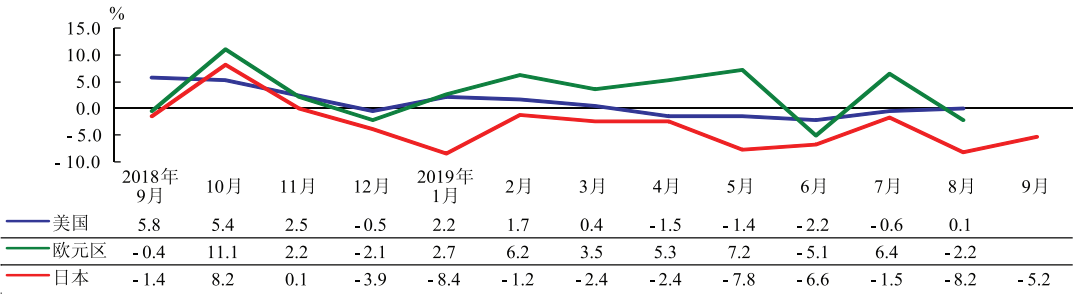


图 3 三大经济体出口额同比增长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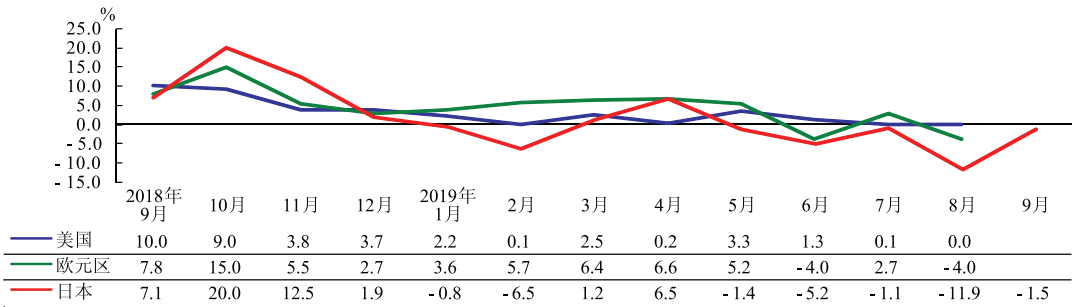


图 4 三大经济体进口额同比增长率 (%)

数据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图 1~图 4)。

ABSTRACTS

(1)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Foreign Economic Trade in the past 70 years of China

Zhang Yansheng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70 years ago,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outlook has undergone earth-shaking changes. In 2018, China’s GDP increased by 175 times compared with 1952, with an average annual growth rate of 8.1%. Among them, the average annual growth rate was 9.4% from 1979 to 2018, which was much higher than the average annual growth rate of 2.9% in the world economy. In the 7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e have experienced the period of “One world, Two systems”, experienced the period of “The Big Bringing in” and promoted “Foreign Leaps into Progress”, experienced the period of export-oriente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OEMs, It is also experiencing the period of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n open economic new system. In the past 70 years, the summary review and reflection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irst, openness brings progress, and closure is bound to lag behind. Second, the essence of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is to comprehensively deepen reforms. Third, the most important significance of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i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rth,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is a gradual ecosystem. Fifth, the crisis, challenges and pressures are the driving force for expanding the barriers to opening up and opening up the system. Sixth,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means opening up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The seventh is to expand th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effect of “Learning By Doing” brought by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Eighth,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has created an interdependent industrial chain, supply chain, and value chain, and built a community of global interests and destiny.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counter-globalization and trade protectionism,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orce to resist trade wars and continue to promote globalization. In the short period of 7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hinese economy has rapidly revived from the world’s poor and backward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e first hundred-year goal of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will be realized, and a new journey of building a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power will be launched.

(2)The Severe Prospects Faced by WTO Reform and China’s Countermeasures

Huo Jianguo

Due to the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pattern, competi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fierce, and international multilateral trade rules have been continuously affected and challenged, which has seriously affected the authority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Since 2018, members of the WTO,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the European Union, and Canada, have issued written opinions on reform issues and put forward their own ideas and suggestions.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Commerce has also published relevant documents and opinions on WTO reform, and is actively communicate and coordinate positions

with relevant members. In 2019, the G20 leaders Osaka Summit agreed to launch the WTO reform. However, from the current progress, the reform is still full of contradictions, the positions and demand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European Union, Japan and China are total different, and it is difficult to reach an agreement. China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progress and trends of WTO reforms, and clarify the real reasons for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plan ahead and strive for initiative.

(3)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lderly Care Service Industry

Song Qun, Yang Kun, Chen Xiao

China has entered the stage of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The health needs of the people are increasing every day. However, China's population is becoming more aging. The old-age care become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of current social concern. In 2018, the proportion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over 60 years old in China reached 17.9%, and the degree of aging was on the rise. The demand for the elderly care service industry is constantly expanding, and the quality requirements for the elderly care service industry are also constantly improving. Developed countries such as Japan entered the aging society for decades before China, and their elderly care service industry has also experienced relatively long-term development and formed a relatively complete the elderly care service industry system.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experience of the elderly care service industry in developed countries such as Japan, Singapore, the United Kingdom and Germany, and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constructing the elderly care service industry system that meets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China.

(4) Path Selection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Expanding Cross-Border Use of RMB—A Case Study of Zimbabwe

Guo Jianmin, Sun Anqi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to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China's foreign trade and investment scale has continued to expand, and the demand for cross-border RMB settlement has grown rapidly. On the one h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provides an important path for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RMB and provides a good platform for the expansion of the RMB func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RMB has also provided strong suppor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Taking Zimbabwe as an example, an important fulcrum of Africa in the “the Belt and Road”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expanding the RMB's extensive use in Zimbabwe, and combines the reality of “The Belt and Road” between China and Zimbabwe to study the realistic path of expanding the use of RMB in Zimbabwe: First, short-term increments, increase monetary liquidity through secured RMB loans; second, medium-term increments, gradually expanding trade and investment to increase RMB supply, in order to form a relatively stable supply of RMB liquidity to Zimbabwe. The final study propose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which can expand the use of RMB in Zimbabwe.

(5) New Developments in the Global Software Market: Industry, Trade and Development Trends

Xie Lanlan, Wang Yingjie

The global software market has maintained steady growth for many years, and various market segments, especially those related to digital technology, have grown rapidly. The proces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is accelerated and the gradual maturity of consumer digital consumption habits have become the main driving force for the continued expansion of the global software market. Digital technology has also changed the global software trade pattern, the

informationization construc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has accelerated the release of demand for software products and services, the lack of digital trade rules and fragmentation, and new trade barriers are the most prominent feature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software market will be driven by the digital economy as a driving force for innovation, and the demand for high-end talent will be further expanded, and the intensity of information security and privacy protection will be unprecedented.

(6)The Development Trend and Experience Enlightenment of Global High-tech Industry

Zhao Chunzhe, Li Dan

Entering a new era, the importance of high-tech industries in China’s economic society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From the trend of high-tech industry, digit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begun to lea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lobal industrial system, Intelligent, integrated and deep-seated technologies have become the focus of high-tech industries in various countries. Emerging economies have also joined the competition in key core areas. In the background, the United States, Germany, France, Japan and Israel, as traditional technology giant and key small countries, continue to strengthen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high-tech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high-tech industries. It is of great enlightenment for China to sort out and refine the industrial policies of the five countries in the field of high-tech industries.

(7)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Strategy Choice of digital trade in China

Xia Youren

Whether transactions are realized through digital information exchange is the key to determining whether an economic activity is a digital trade.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trade, digital trade has prominent features such as virtualization, platformization, intensification and generalization. At present, cross-border e-commerce has occupied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China’s foreign trade. The revenue of digital publishing has grown steadily, and digital trade has become a new trend in China’s service trade. However, China’s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rade also faces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comprehensive competitiveness, lack of infrastructure and talents, inadequate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weak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rights. Based on the huge potential market, with the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of 5G and other technologies, the support of national series policie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relevant institutional rules, China’s digital trade is promising.

(8) Research on Institutional Barriers and Policy Suggestions for Deep Integration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Wang Jiayuan

The integration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nd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trends in the current glob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lso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nd industrial innovation. As the scope of integration of the two industries continues to expand and the degree is deepening, some issues that cannot be ignored are also exposed in terms of market access, information sharing, industry standards, and regulatory and policy design. In order to accelera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two industries,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compar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industry policies, discusses the institutional obstacles faced by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wo industries, and proposes a few recommend suggestions for building a two-industry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platform and optimizing relevant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Editor:Zhao Ze

欢迎订阅《全球化》杂志

《全球化》杂志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管/主办，是集研究性、学术性、政策性、应用性于一体，以国际经济、宏观经济、企业国际化经营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类理论月刊（国内统一刊号：CN11－6008/F；国际标准刊号：ISSN2095－0675）。刊物按照曾培炎理事长的办刊宗旨，依托“中国智库”平台优势，秉承“同享人类智慧，共谋全球发展”的核心理念，本着兼容并蓄、百花齐放的原则，着力打造“全球经济思想库”，构建一个智库交流的平台，成为广大读者观察国际问题的重要窗口和共享思想盛宴的便捷之门。刊物致力于探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积极反映国际社会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诉求，研究如何改善全球经济治理，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理论研究，关注宏观经济运行、产业发展、区域发展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提高经济形势分析预测的科学性、及时性和权威性；积极推动中国经济对外开放进程，关注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与发展中的趋势与问题，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政策和资讯服务，同时为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提供引领和支持。刊物力争具有全球视野，服务宏观决策，推动企业发展，集聚各类人才，成为政府、科研院所、企业从事国际经济研究、把握中国经济动向的重要平台。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国内邮发代号：82－572；也可填好“征订单回执”，直接汇款向我部订阅。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永定门内大街 5 号 232 室《全球化》编辑部；邮编：100050；电话：010－83362183/83366113。

本刊定价：每期人民币 35 元，美元 20 元，港币 50 元，每月 25 日出版（国内免费邮寄）。

2020 年《全球化》杂志（月刊）征订单回执

订阅单位			订阅人姓名、电话	
详细地址 (邮编)				
征订份数		420 元/年（12 期）	总计金额	